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1年 第3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面向新时代的中俄关系

- 3 乐玉成 / 青山一道同风雨 睦邻友好开
新局
- 13 伊戈尔·莫尔古洛夫 / 俄罗斯与中国：
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

建党百年与中国外交

- 23 章百家 / 从党史和外交史看国际问题的
处理
- 30 杨洁勉 / 中俄美欧战略互动特点和发展
趋势

苏联解体与俄罗斯国家建设

- 51 于 滨 / 苏联解体 30 年：回顾与思考
- 73 庞大鹏 / 论俄罗斯的宪法改革
- 106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 / 最后的帝国及其
邻居——俄罗斯周边安全与地区秩
序

新发展格局与国别区域研究

- 121 赵可金 / 国别区域研究的内涵、争论与
趋势
- 146 冯绍雷, 李中海, 张昕, 等 / 新发展格
局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范式创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 军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本期执编：王海燕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 年 6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1 年第 3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Лэ Юйчен

Новый вито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и дружбы..... (3)

Игорь Моргулов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 отношения, устремленные в будущее (13)

Чжан Байцзя

Реш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роблем по примеру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и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итая (23)

Ян Цземянь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Китая,
России, США и Европы (30)

Юй Бинь

30 лет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а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51)

Пан Дапэн

О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реформе России..... (73)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

Последняя империя и её соседи: Периферий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106)

Чжао Кэцзин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и тенден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121)

Фэн Шаолэй, Ли Чжунхай, Чжан Синь и др.

О метода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инновациях
парадигм в рамках новых моделей развития..... (146)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1 年第 3 期 (双月刊)

Contents

Le Yucheng

Sharing Common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 Beginning a New Chapter with a Friendly Neighbor (3)

Igor Morgulov

Russia and 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owards the Future (13)

Zhang Baijia

On Handling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Back to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a's Diplomacy (23)

Yang Jiemian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China,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30)

Yu Bin

Three Decade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eview and Reflection (51)

Pang Dapeng

On Russian Constitutional Reform (73)

Timofey Bordachev

The Last Empire and Its Neighbors: Russia's Peripheral Security and Regional Order (106)

Zhao Kejin

The Connotation, Debates and Trends of Country-specific and Regional Studies (121)

Feng Shaolei, Li Zhonghai, Zhang Xin et al.

Methodology and Paradigm Innovation for Regional and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146)

面向新时代的中俄关系**青山一道同风雨 睦邻友好开新局**

乐玉成*

【内容提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开辟了国际关系的新道路。“条约”肇始于顺应世纪之交的时代发展潮流。中俄两国从各自发展振兴和两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深入思考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深刻总结中苏关系数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建立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型国家关系。中俄两国人民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携手投身国际抗疫合作,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赋予“条约”新的时代内涵,谱写新时代两国睦邻友好的壮丽篇章。我们坚信,只要永葆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的初心,肩负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中俄合作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造福两国人民,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中俄关系 新时代中俄战略协作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3-0003(10)

2021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下简称“条约”)签署20周年。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两国关系还将迎来一系列“大事”“喜事”。2021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视频连线中下达的“开工”“启动”指令,实际上是对中俄新时代合作的“总动员”。2021年3月举行的中俄外长“桂林会晤”,唱响了“中俄关系甲天下”的时代强音,展现了中俄这对“贵邻”团结如山、笃定前行的坚毅与自信。两国外长高度评价“条约”对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重大意义和作用,进一步确认两国元首关于“条约”期

* 乐玉成,外交部副部长。

满后自动续约的共识，决心以此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在更深层次、更广维度、更高水平上取得更大发展。

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

历史照亮未来，征途未有穷期。《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开辟了国际关系的新道路。“条约”肇始于顺应世纪之交的时代发展潮流。当时的世界，两极格局进一步向多极格局演变，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全球经济蓄力增长，然而强权政治依旧横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国际社会必须做出重要抉择，只有增进相互信任，开展广泛合作，才能共享和平、共谋发展。

中俄两国从各自发展振兴和两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深入思考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深刻总结中苏关系数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建立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型国家关系。这种关系必须摒弃冷战思维，超越零和博弈，其本质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长期睦邻友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原则和方针指引下，中俄关系实现了 1992 年“相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 年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 年建立“平等信任、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三连跳”。

2001 年 7 月 16 日，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份里程碑式的文件集中反映了两国在双边合作和国际事务中的广泛共同利益，首次将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双边关系指导思想和世代友好理念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引领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条约”从诞生之时起，便肩负着重要历史使命。在“条约”精神指引下，中俄关系保持了 20 年高水平运转。双方于 2004 年和 2008 年先后签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补充叙述议定书，实现 4300 多公里边境线全部划定。2011 年“条约”签署 10 周年之际，双方建立起“平等信任、相互支

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年，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赋予两国关系“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普惠共赢”的新内涵。2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关系长远发展的根本遵循，是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基本方略。中俄合作从“政热经冷”“官热民冷”的旧面貌逐步发展成为“政经两热”“官民共举”的新局面，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条约”签署后，我国以“条约”精神为基础，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邻国分别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表明，“条约”精神合乎历史潮流，受到各方拥护，对我国同周边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和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

历久弥新 共创辉煌

时光流转，世事更替。世界步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同步交织，国际格局发生复杂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变革期。但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风险挑战如何严峻，“条约”精神跨越时空，薪火相传，历久弥新。中俄两国人民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携手投身国际抗疫合作，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赋予“条约”新的时代内涵，谱写新时代两国睦邻友好的壮丽篇章。

——高层交往掀开新篇章

在“条约”精神指引下，中俄在高层交往中互开多个“先河”，互创多个“之最”。中俄建立起元首年度互访、总理定期会晤、议会合作委员会以及涵盖各领域的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等全方位交往合作机制，为双方统筹协调部署两国各领域合作提供了重要机制保障。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俄总统办公厅主任磋商机制在两国对外交往中独一无二，体现了双方高水平的政治

互信。两国间高层交往达到年均 20 起，两国外交部间各类磋商平均每周 1 起，频率之高无与伦比。

疫情之下，中俄积极开展“云外交”，保持各机制顺畅运行。2020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 5 次通话并多次互致函电，共同向中俄科技创新年开幕式致贺信，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互致贺电，彰显了两国继续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2021 年 5 月，两国元首以视频连线方式共同见证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李克强总理与米舒斯京总理以视频形式举行两国总理第二十五次定期会晤，栗战书委员长与俄议会领导人线上举行两国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均取得丰硕成果。同时，线下高层交往从未中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赴俄参加中俄第十六轮战略安全磋商，进一步密切两国战略协调与配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两次赴俄分别出席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 75 周年阅兵活动和系列多边防长会议，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俄并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中俄外长举行“桂林会晤”，就一系列问题深入“对表”。俄罗斯成为疫情以来我高级别团组出访最多的国家。

——抗疫合作拓展新领域

中俄两国在抗疫斗争中守望相助、风雨同舟，于患难中见真情，为睦邻友好精神增加了生动注脚，开启了两国合作的新领域。在我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俄方率先派医疗专家组来华协助抗疫并提供了急需的防疫物资。俄方只做不说、“铁憨憨”的硬核作风在华圈粉无数，在我国数次登上热搜。俄疫情发生后，我国政府、民间组织、企业等向俄方提供大量抗疫物资，成为予俄抗疫物资支持最有力的国家，引发俄社会各界热烈反响。俄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俄 75% 受访者视中国为友好国家，创近 5 年来新高。两国还就疫苗和特效药研发展开密切合作，共同推动疫苗成为普惠可及的公共卫生产品，以实际行动携手共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两国媒体广泛报道对方抗疫举措和成就，两国民众以拍摄短视频等方式相互鼓劲打气。“隔离病毒，不隔离爱”“俄罗斯加油！中国加油！”“加油，达瓦里希^①”，

① 达瓦里希：俄文 товарищ 的音译，意为“同志”。

声声真情，跨越欧亚大陆，暖入心田，打通了两国民相亲、心相通的“最后一公里”。

——维护公平正义创造新业绩

中俄两国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外部干涉破坏，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仗义执言，有效抵制了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共同维护了各自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双方携手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普京总统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时明确表示，“中国在抗疫方面为其他国家树立了良好榜样”。两国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开展密切有力的战略协作，维护了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在2021年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俄罗斯再度仗义执言，与其他国家一道就涉港、涉疆问题作挺华共同发言，以压倒性优势挫败了个别国家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拉夫罗夫外长日前接受采访时，谴责美国在涉疆、涉藏、香港“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表示“俄中不能容忍任何国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我们指手画脚”。双方还共同反对将体育政治化，俄方支持中方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事。

在俄修宪全民投票问题上，中方坚定支持俄罗斯人民自主选择的国家治理模式，明确反对西方国家借“纳瓦尔内事件”干涉俄内政。面对美西方对俄出台大规模制裁并驱逐俄外交官，中方旗帜鲜明地反对动辄使用单边制裁的行径，支持俄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20年12月，双方续签了《关于相互通报发射弹道导弹和航天运载火箭的协定》，成功举行第二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再次体现了高水平的战略互信和战略协作，也向外界展示了两国维护共同安全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的能力与决心。

——务实合作展现新气象

疫情大流行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寒冬，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贸易投资活动持续低迷。尽管外部环境逆风逆水，但中俄务实合作互补性强、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未曾改变。“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稳步推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顺利实施，《中俄关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谅解备忘录》顺利签署。中俄双边贸易额已连续三年突

破千亿美元大关，2021年前5个月两国贸易额同比增长23.6%，达506亿美元，我国连续11年稳居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两国能源合作态势良好，天然气贸易快速增长，原油贸易再创新高。农产品贸易逆势上扬，成为双边贸易的新增长点和亮点。俄产牛肉实现对华出口，我国已成为俄农产品和肉类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中国制造”越来越得到俄民众青睐，2020年中国手机占据俄55%市场份额，长城汽车在俄销量达17381辆，同比增长41%。互联网经济正打造中俄合作新业态，“滴滴打车”成功进入俄喀山市场，跨境电商发展迅速，2020年“双十一”速卖通俄罗斯站的营业额达2.6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12%。俄产紫皮糖、巧克力、冰淇淋等产品日益受到中国消费者喜爱。

2020年8月，中俄科技创新年如期启动，两国科创领域对话合作全面激活，逾千个项目构成两国国家级主题年的最长合作清单。双方在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领域合作不断增强，“轻资产”合作优势突出，科技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步拓展，成为中俄务实合作的最活跃板块之一。

面向未来 共绘蓝图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随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时刻的临近，中俄也已步入各自发展的新阶段。“十四五”规划擘画蓝图，我国进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俄罗斯提出《至2030年国家发展目标》，将朝着实现突破性发展、增加人口数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向加快前行。

为实现上述目标，双方要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弘扬“条约”精神，抓住关键机遇，推动中俄关系在后疫情时期实现更大发展，继续为大国睦邻友好树立典范，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能，为全球战略稳定提供坚强支撑。双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深化合作。

——发挥好元首外交引领作用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亲自为两国关系领航掌舵，是中俄关系发展独一

无二的政治优势。双方要继续以元首交往为核心，充分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引领和推动效能。受疫情影响，2020年以来两国元首未能实现线下交往，我们期待在疫情形势允许的条件下，两国元首尽早举行面对面会晤。在此之前，两国元首将继续以灵活多样的“云外交”形式保持密切交流。同时，结合线上线下各种形式，统筹安排好既有机制化高层交往，为两国各领域合作设目标、定方向、划重点，推动解决双方合作中的难点问题。

——办好“条约”庆祝活动

两国元首在互致新年贺电时强调，双方将围绕庆祝“条约”签署20周年这一主线，大力弘扬两国世代友好理念，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擘画新愿景，增添新内涵。我们要按照两国元首的指示，高举世代友好旗帜，围绕庆祝“条约”签署举办形式隆重、内容丰富的活动，以“条约”签署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向国际社会释放团结协作信号。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中俄友好的未来。双方将为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讲好丰富多彩的中俄友好故事，引领更多澎湃“后浪”投身中俄友好事业，让友谊之种在年轻人心中开花结果，让中俄友好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践行多边主义

中国人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俄罗斯谚语云“一燕不成春”，同住地球村的你我命运休戚与共。面对公共卫生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只掌遮天”式的单打独斗已无法解决问题，践行多边主义的广泛国际合作才是正道。而在国际上搞“小圈子”，动辄脱钩制裁，将多边主义意识形态化，打造针对特定国家的价值观同盟，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始终做多边主义的维护者和践行者，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深化战略协作

中俄战略协作没有止境，不设禁区，上不封顶。面对暗流涌动的国际形势，我们将保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战略定力，坚持不

懈加大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支持力度，发挥好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等平台作用，密切在政治、立法、执法、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反干涉合作。中俄要进一步发挥“中俄组合”效能，深化两国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坚决站在历史正确和公平正义一边，不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要提出更多“中俄方案”，贡献更多“中俄智慧”，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推进复工复产

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危和机总是共生并存，应对危机的过程自然蕴藏新的机遇。中俄要努力在世纪灾疫的危机中孕育合作共赢的先机，于百年变局中开创两国关系的新局。双方不仅要严守疫情防控“国门关”，全力服务各自国内抗疫和复工复产，也要共筑国际抗疫“防火墙”，继续加强在疫苗和特效药研发领域的合作，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中俄贡献。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双方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为两国经贸往来创造便利，保障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按计划推进实施两国能源、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战略性大项目，向两国元首共同确定的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2000亿美元的目标加速迈进。要继续以中俄科技创新年为契机，激发双方在科技前沿领域的合作潜力，提高关键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打造更多经济增长点，为两国经济振兴服务。

二十年风雨同舟，二十年披荆斩棘，二十年砥砺奋进，中俄一同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新型大国关系画卷。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永葆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的初心，肩负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中俄合作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造福两国人民，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Abstract】 *The Treaty of Good 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s opened a new pat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treaty reflects key tendencies in the countrie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In aiming to promote*

each country's optim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o promote their long-term mutual interests, China and Russia have decided to establish a new kind of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at moves beyond categories bequeathed by the Cold War. The treaty does so by reflecting on the complex and often turbulent Sino-Soviet relationship (1949-1991) and incorporating lessons from early 21st century world politics, so as to frame a relationship that is both realistic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across the widest possible range of interests. Often finding themselves to be "in the same boat",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peoples are committed to continuing their ongoing cooperation in combatting epidemics and pandemics, in maintaining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in general to provide new energies and synergies to good-neighborly Sino-Russian relations. We firmly believe that, so long as each country maintains the treaty's foundational premises of perpetual friendship, of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win-win", and of shouldering joint responsibility in maintaining a mutual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Sino-Russian collaboration will continue to benefit the two peoples and contribute ever more to the building of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Treaty of Good-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ino-Russian Relations, Sino-Russian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a New Era*

【Аннотация】 «Договор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открыл новый путь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Договор» зародился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тенденцией времени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исходя из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а также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двух народов, глубоко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ли нов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и нов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развит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чётко обобщил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и уроки взлётов и падений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и приняли

решение установить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ой и отличный от времён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новый тип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йский 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ы оказывают помощь друг другу, как люди, плывущие на одной джонке, объединяют усил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ротивозидемиче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овместно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глобальную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ридают «Договору» коннотации новой эры и пишут великолепную главу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и дружбе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Мы твёрдо верим, что пока мы сохраняем изначальное намерение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передаваемую из поколения в поколение дружбу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а также несём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времени и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миссию,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будет и дальше приносить пользу двум народам и вносить большой вклад в содействие построению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Договор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责任编辑 刘 军)

俄罗斯与中国：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

伊戈尔·莫尔古洛夫*

【内容提要】《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两国关系的基调：世代友好，永不为敌。这份极为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得以签署，无疑是 20 世纪 90 年代俄中双边关系迅猛发展的结果。然而，《条约》签署的意义不仅在于俄罗斯联邦有史以来首次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原则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且确定了一些对进一步发展俄中两国合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全新理念。此后，依据《条约》起草的数百份双边文件，对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发挥了调节作用。《条约》依然是俄罗斯同中国发展全方面伙伴关系的有效工具，俄罗斯愿意继续挖掘《条约》的潜能。我相信，俄罗斯和中国将会继续按照《条约》的精神和主旨，采取和平与协商的方式巩固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以造福两国人民和在世界上实现公平正义。

【关键词】《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俄中关系 大欧亚伙伴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3-0013(10)

2021 年 7 月 16 日是一件大事的纪念日，这件大事对俄中关系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20 年前，俄罗斯联邦总统弗·弗·普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签署了《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调：世代友好，永不为敌。

这份极为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得以签署，无疑是 20 世纪 90 年代俄中双边

* 伊戈尔·莫尔古洛夫 (И. В. Моргулов)，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关系迅猛发展的结果。然而，《条约》签署的意义不仅在于俄罗斯联邦有史以来首次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原则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且确定了一些对进一步发展俄中两国合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全新理念。此后，依据《条约》起草的数百份双边文件，对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发挥了调节作用。

这份文件从法律上确认了两国在政治层面对俄中关系的定义：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定义一直沿用至今，并且其内涵不断扩展。《条约》确立了以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为基础的俄中关系基本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互不使用武力。考虑到两国发展的国内现实和国际环境，这些原则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例如，《条约》中写明了双方达成的关于相互支持对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导弹瞄准对方的约定。《条约》还确定了“相互尊重对方所选择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的原则。在当今世界上那些想方设法将本国信念和价值观强加给他人的破坏势力仍在频频活动的背景下，这一原则显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条约》规定，在出现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下，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实际上《条约》提出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新模式：不谋求建立正式同盟，不针对第三国，然而这种模式规定，双方在对两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上进行十分紧密的协调。

《条约》已经写明，俄罗斯和中国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双方决心使两国边界成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这一条款十分重要。《条约》确保两国解决极为复杂和敏感的边界问题，也使两国有效的边界合作机制得以建立。这些机制涉及保证边境制度的稳定，保护两国毗邻地区的生态系统并防止发生自然灾害和技术造成的紧急情况，监测边境地区水质并合理利用跨界水资源，协商解决界河航行问题，协调边境地区的发展和跨境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方面。

所以说，《条约》为俄中两国各方面关系在今后长时期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份文件（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其所处时代）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双边关系范围。今天，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条约》的条款没有过时，

依然是今后长远时期我们同中国之间关系的可靠基础。

如今两国间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多层次国家间协作架构，其中发挥最关键作用的是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每年中俄两国安排四到五次“最高层”会晤。201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确认，俄中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这首先是指我们同中国的合作将会在世界发生种种深刻变化的情况下继续发展。2020年，在因新冠肺炎疫情流行而受到种种限制的背景下，两国元首仍然通过远程方式继续保持密切交往。

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协作机制对两国领导人的对话起着有效的补充作用。首先是两国政府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在这一机制框架内，由两国政府副总理领导的五个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以及数十个部门间分委会、工作小组高效率地运转。

俄罗斯联邦议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会间合作委员会定期开展工作。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保持密切接触。两国战略安全问题高级代表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会议主席每年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

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而形成的政治互信气氛，我们两国在军事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两国国防部领导人一直保持密切接触。两国联合举行的海上军事演习、反恐演习和指挥部门演习的成果显著。两国在其他一些重要领域（例如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活动和非法移民）的协作也在不断扩大。

双方决心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世代相传，这是《条约》的重要基础。我们两国曾经是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的盟友，都经历了艰难困苦，遭受了最大的人员伤亡。苏联军队击溃了日本帝国的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解放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今天，我们和中国朋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过程和后果持有相同的看法，并肩反对篡改历史、美化战争罪犯及其帮凶、歪曲战争结果的种种企图。

俄中已经就对于彼此十分重要的军事历史纪念问题建立了密切的协作。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维护那些为中国解放和独立事业献出生命的苏军战士的

陵园和纪念碑。

俄中关系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两国的经贸往来。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最近几年双边贸易额快速增长，2018年已超过1000亿美元。2020年，两国的贸易发展受到了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不利影响，不过，这种负面影响有限。我们期待疫情解除后双方的经济合作继续扩大，俄中两国拥有发展贸易协作和投资协作的巨大潜力。我们已经观察到贸易质量的数据逐渐趋好，农产品、化学产品、机械技术产品在俄罗斯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服务贸易稳步增长。双方的投资合作目前总共有70个主要项目，总价值为1200亿美元。俄罗斯和中国正在有步骤地进行用本国货币实现双边贸易结算的工作，这将使两国摆脱第三国金融政策的影响，并保证各项交易的银行服务顺畅。

互利共赢的广泛合作对于两国来说均具有战略意义，合作共赢的代表性案例是能源合作。最近10年，俄罗斯公司向中国出口了超过3.5亿吨石油和石油产品，1.5亿吨煤炭和200亿千瓦时电力。俄罗斯-中国石油输送管道运营顺利，2019年“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投入使用，双方还在继续商讨其他管道输送项目。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厂已经建成，其中有中国投资者的股份。亚马尔的液化天然气已经开始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定期发运。作为这一有益经验的延续，规模更大的“北极液化天然气-2”项目相关工作已经启动，该项目也有中国投资者参与。

为了顺应世界发展趋势，高科技合作开始在俄中两国务实合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俄中延续此前效果良好的主题年实践，宣布2020年和2021年为俄中科技创新年。俄中联合科技创新基金正在建立，科教交流日益扩大。在标志性工业项目——联合制造远程宽体客机和民用先进重型直升机——方面的协作持续推进。俄中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合作愈加广泛。

我们两国在核能等知识密集型领域积累了多年成功合作的经验。通过俄罗斯的协助，中国建成了天然气处理厂、第一座快中子实验反应堆。田湾核电站中四个由俄罗斯设计的核电机组运行安全可靠。目前，实施一揽子协议的工作已经展开，其中包括在建造中国核电站新机组、建造更强大的“快速”反应堆方面的合作，以及在其他前景看好的领域的合作。

航天领域的协作不断扩大，涉及的方面有：运载火箭和火箭发动机、月球和深空探测、地球遥感探测、航天电子元器件、低轨道卫星通信系统、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使用，等等。

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共同发展国际运输走廊，这些运输走廊能够成为将东北亚、东亚、东南亚与欧洲连接起来的、有竞争力的线路。俄中两国的经济也会因此在交通运输和物流领域获得新的增长点。现有的几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干线（例如跨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和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的潜力将会发挥出来。此外，包括西欧-中国西部公路在内的一些新的交通线路也在建设中。

在完善俄中两国跨境基础设施方面，横跨阿穆尔河的布拉戈维申斯克-黑河公路大桥的建成开通将是一件大事。下列宁斯科耶-同江跨境铁路大桥的建设也处于收尾阶段。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完成，将为全面发展两国毗邻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创造良好条件。

欧亚经济联盟发展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必将为我们同中国的经济合作提供强劲动力。《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贸合作协定》已经生效，负责落实协定的联合委员会已于 2020 年 10 月开始工作。换言之，推动俄中两国的一体化、加强彼此间的交通运输和物流联系、发展贸易投资合作等方面的工作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因此，两国最高层达成的关于推进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并行不悖、协调发展的一致看法具有特殊意义，这两个倡议以两国相同的原则和价值观为基础，贯通一切，无所不包，追求的是建立欧亚共同经济空间的一致目标。

我们同中国在人文方面的交往逐年迅速发展，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新内容。这方面的活动多种多样，遍及各地，受众广泛，这有助于保持我们两国人民之间传统的睦邻友好关系，巩固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

近年来，我们高质量地扩大了两国教育交流，如今交流人数已达 10 万人。位于深圳的中俄联合高等教育项目（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实施顺利，该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人数计划增加到 5000 人。每年举办的文化节、电影节、博物馆展览以及国家艺术团体巡演，使文化大事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吸引越

来越多新的参与者走上俄中关系的交流之中。媒体界交往十分频繁，各种各样的活动连续不断，每年都会举办媒体论坛和电视周。

我们高兴地看到，两国旅游交流高速发展，这表明两国人民对伙伴国的文化和传统一直相互感兴趣。2019 年全年，到俄罗斯旅游的中国人数量为 190 万人，从俄罗斯到中国去的人数为 230 万人。

令人遗憾的是，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两国的交往暂时受到了限制。然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如此困难的时刻我们两国立即彼此伸出援助之手，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派遣医疗专家，密切沟通协调各自的防疫步骤。

两国地区间协作已经形成扎实的基础。近 400 个俄罗斯联邦主体和城市以及相对应的中国的省、市、自治区签订了友好省市合作协议。两国成立了俄罗斯远东与贝加尔地区和中国东北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与长江中上游各省之间的“伏尔加河-长江”模式，是在地方合作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工作的范例。

在《条约》签署后的 20 年间，被我们双方视为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基本要素之一的外交协作得到大大加强。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年来，我们两国在全球和地区紧迫的具体问题上的立场一直不断地相互接近。于是，俄中团结一致、共同发声的问题范围越来越广。这一点体现在两国领导人和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包括就专门问题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体现在采取的实际措施内（在主要多边平台上），体现在围绕着全球热点问题协调一致的行动里。

俄中对于形成多中心世界秩序的必然性和极端重要性，拥有高度共识，这促使我们同中国伙伴联合在一起。“特权俱乐部”时代不仅渐行渐远，而且已经一去不复返。世界正在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种多极化保证各方力量的持久平衡，从而更多地照顾国际社会各个成员的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和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是我们极为重要的共同目标。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也已在《条约》中得到确定。俄罗斯和中国都清楚地记得，这个世界性组织在 75 年前是如何成立、又是为何成立的。在那个不太遥远的年代，各国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的总结中得出结论：必须设置一个各国之间对话与合作的通用平台，必须建立一种共同有效应对和平

与安全所遭遇威胁的专门机制（这就是后来的联合国安理会），还必须制定统一的国家间关系准则（这些准则已汇集为联合国宪章）。我们坚信，在当今时代，仍然需要联合国这样一个最有代表性、最具权威性、并且拥有一系列分支机构和专门机构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可以改革，甚至也必须进行改革，以提高工作效率，但前提是不能破坏它的基础和削弱它的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和中国以及其他志同道合者正共同致力于加强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尤其是联合国的组织和会议，反对将其政治化和“混淆”联合国的权力。而且，两国还在联合国的平台上共同推进非对抗的、凝聚共识的议程。

《条约》确定俄罗斯和中国另外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捍卫国际法。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模糊理念相反，我们一贯认为，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遵守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他通行的公约和条约。我们认为这是国际社会所有成员行事负责的保证，也是世界各国团结的基础，这在当代种种挑战和威胁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我们一如既往地主张，国家间关系的建立应当严格遵循如下原则：相互尊重，照顾彼此利益，公平正义，互利合作，互不干涉内政，不对抗、不冲突、不采用单边制裁政策。

我们两国都主张加强全球战略稳定，体现在两国领导人于2016年6月和2019年6月签署的专项联合声明中。这两份声明都表明了双方加深互信、加强战略协作的意愿，均强调保持大国之间良好关系对于解决全球战略问题的重要性。

我们感谢中国伙伴对于围绕《俄美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出现的局势做出与我们一致的评价。目前我们正在就各方面的“核武器”问题同中国伙伴保持非常密切的接触。有人想方设法让我们向中国伙伴施加压力，敦促中国参加俄美之间的专门问题谈判，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俄中外交协作的议事日程中，国际信息安全问题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一致。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防止信息技术被用作“合法工具”干涉别国内政，不能允许把网络空间变成战场。我们希望，我们理性的、建设性的意愿最终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

的理解和支持。

在世界经济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极不寻常情况的背景下，我们继续扩大同中国在各个主要经济平台的合作，如在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我们特别注重团结国际社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制裁，主张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架构。

我们和中国共同付诸努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继续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发展前景广阔的多边合作模式。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的威望不断提升，许多国家希望与它们合作。上海合作组织逐渐成为欧亚空间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机构。而“金砖国家”则不断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这表明，此种跨地区平台拥有美好前景，它代表数十个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一些三边对话机制（例如俄罗斯-印度-中国对话机制和俄罗斯-蒙古-中国对话机制）的工作对于加强地区稳定、深化地区合作起着推动作用。其中每一种机制都是独立的，均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同时我们认为，这些机制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一样，都是一块块“砖”，大欧亚伙伴关系正在由这些“砖”堆砌起来。俄罗斯的这一倡议不同于所谓的“印太”概念，它完全是非对抗性的、建设性的能量。如果东南亚国家联盟及其他主要的多边机制和多边模式加入这一倡议，则有可能在欧亚大陆真正建立起一个多样的、多中心的、和平、稳定、安全、共同发展繁荣的空间。

当然，我们和中国共同关注点还包括许多紧迫的地区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仅持有一致的立场，而且正在着手采取一些有效的共同措施。例如，俄中共同制定了朝鲜半岛局势调解路线图，总体上看，路线图已经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并且我们希望路线图在相关各方的努力下得以实现。尽管受到美国的恶意反对，俄罗斯和中国仍在继续为维持伊朗“核协议”而付出努力，更广义地说，是为建立保证波斯湾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可靠机制而努力。我们两国在为阿富汗和平进程提供国际援助的问题上密切协作，同时，我们表明必须继续打击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团伙。我们就中东和北非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就叙利亚事务，同中国保持密切接触。我们就白俄罗斯和

吉尔吉斯斯坦的事件交换意见，而且我们对那里所发生事情的评价完全一致。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俄罗斯和中国将继续实时“对表”，持续不断地加强外交上的协调。

《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依然是俄罗斯同中国发展全方面伙伴关系的有效工具，俄罗斯愿意继续挖掘《条约》的潜能。我相信，俄罗斯和中国将会继续按照《条约》的精神和主旨，采取和平与协商的方式巩固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以造福两国人民和在世界上实现公平正义。

【Abstract】 *The Treaty of Good-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laid down both countries' aspiration for peace in legal form so that they will remain friends forever and never become enemies. The signing of this extremely important docu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s undoubtedly the resul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ssia-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1990s. Howev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lies not only in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at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et out the principle in dealing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also in determining brand-new concepts that have in-depth impacts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ussia-China cooperation. Since then, hundreds of bilateral documents, draf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eaty, have played a regulatory role in various fields for their bilateral cooperation. The Treaty is still an effective tool for Russia to develop all-round partnership with China, and Russia is willing to continue to tap potentials of the Treaty. Through peaceful and consultative approach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eaty, I believe that Russia and China will continue to consolidate our good-neighborly,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so as to both benefit our peoples and achieve fairness and justice globally.

【Key Words】 *Treaty of Good-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ussia-China Relationship, Greater Eurasian Partnership

【 Аннотация 】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задал тон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в юридической форме: «Дружить поколениями и никогда не становиться врагами». Подписание этого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важн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несомненно,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в 1990-е годы. Однако значение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впервые в истории в юридической форме закрепила принцип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с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но и в определении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новых концепций, имеющих акту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и оказывающих важ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дальнейшее развит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С тех пор сотн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Договором», сыграли регулирующую роль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двух стран в различ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Договор по-прежнему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эффективным инструментом развития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и Россия готова и дальше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потенциал «Договора». Я верю, что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будут и дальше укреплять добрососедские, 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мира и консультаций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духом «Договора» с целью принести пользу народам двух стран и добитьс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в мир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больш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

(责任编辑 贝文力)

建党百年与中国外交**从党史和外交史看国际问题的处理***

章百家**

【内容摘要】从中共党史和外交史的角度，来回顾、思考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历程和经验，对于当前和未来的外交政策制定与实践都有重要意义。首先，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在国际博弈中知己知彼，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外交政策的三个要素。其次，在国际问题上获得主动权的基础，是与外交对象之间的良性互动，凡事多做预备、长期经营，以及将国际性和中国特色相结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经典案例，它既来源于普遍认同的国际准则，又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并以中印（度）、中缅总理联合声明的方式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发布。一经提出便迅速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甚至苏联官方呼吁美苏按照中印、中缅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相互关系。

【关键词】中共党史 中国外交史 中国外交 国际性与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829**【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3-0023(7)

我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外交史研究。根据会议的主题“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理论创新”，我主要从历史角度谈谈我们党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的一些经验，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 本刊根据章百家同志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理论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依托会议速记内容、经章百家同志确认和修改，形成此文。此次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世界政党研究所等单位主办（2021年5月29日，上海）。感谢章百家同志授权我们刊物发表此文。

** 章百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一、制定外交政策中的三个要素

20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编写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当时，领导党史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和主持党史编写的胡绳同志有一个共识，就是要把党史上的许多问题说清楚，必须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联系党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对外交问题的处理。所以，他们提出要在党史研究中加强对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的研究。我有幸参加了这项工作，研究领域也从原来比较单纯的外交史研究转向外交史研究与党史研究的结合。

我自己体会，我们党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有三个因素特别重要。

第一，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我这里想强调的是，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客观国际形势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两个问题。因为直接影响或决定政策制定的基础，实际上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国际形势，而是决策者对客观形势的判断。判断准确，主观合于客观，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外交的发展，当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比较客观、准确的时候，能够把握住国际主要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就比较成功。当判断出现偏差甚至失误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处境就会恶化。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

第二，正确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高层对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有不同的认识，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处理本国利益与支援其他国家革命的关系。究竟应把支援世界革命放在首位，还是应把为本国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放在首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问题基本已不存在。不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好的处理办法，而是二战以后世界革命的形势主要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到那个时候这个运动大体结束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泰国总理到中国访问，他与毛主席会面时提出，希望中国不要支持泰国共产党闹革命。毛主席的回答是，你们把人民生活搞得好一点，没有人要革命的。泰国总理听后就非常吃惊。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以后，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

境。这是中国外交特别大的变化。

第三，知己知彼，特别重要的是了解彼此力量的限度，学会换位思考。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要想占优，必须做到知己知彼。美国学者提出过一个概念：硬情报和软情报。硬情报是指及时准确地获知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件；但要做出准确的解释、有正确的预判，还需要一套软情报。一个经典案例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方自卫反击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印度非常担心中国军队会直捣新德里。印度不知如何判断，请求美国CIA帮助。CIA评估后的预测是，中国军队不仅不会进攻，而且会主动后撤。准确做出这个预测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中国领导人的思维和中国主要战略考虑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这就是软情报的作用。我们今天要更好地处理国际和外交问题，亟须加强软情报建设，在这方面我们的差距还很大。知己知彼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知道彼此力量的限度，这在博弈时非常重要。例如，在分析导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因素时，通常会讲到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双方共同的安全需求等；但往往忽略了一条，中美两国斗了20多年之后，双方都清楚地知道了对方力量的限度。新中国成立后，最担心的是美国会不会侵略我们。20世纪70年代初，看到美国连越南都打不赢，就知道它没有力量进攻中国。美国原来最担心的是中国向东南亚输出革命，搞“共产主义扩张”。这时，它看到中国因“文革”而内部问题成堆，也不再担心。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了解对手力量的限度非常重要，它是20世纪80年代后中美得以建立互信的重要条件。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中美之间的博弈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两国关系才可能转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还不确知彼此目前力量的限度。要做到知己知彼，还必须学会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替他人着想，有这种成分在内，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我们提出的政策的有效性。只有学会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思考，才能预知我们提出的政策或方案中，有哪些是对方可以或可能接受的，有哪些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是不可能接受的。这样，我们提出的政策才能够真正有的放矢，真正解决问题。

以上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制定外交政策中的三个要素。

二、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获取主动权

首先，争取与外交对象之间的良性互动。处理外交、国际问题和处理国内事务有一个最基本的差别，这就是在外交事务中面对的是大量不可直接控制的因素、不是单方面的行动，而是互动，这与制定和实施国内政策很不一样。国内政策的实施有一套行政系统，可以去贯彻执行；但是外交问题一定是互动，一定有双方、多方的博弈。怎么使这种互动成为良性的，而避免恶性循环，值得高度重视。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曾经历过安全环境的恶化，这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胡乔木在总结这段党史时曾说，我们当时高估了外部的威胁，因而做出了过火反应；这使得外部压力进一步增大，我们的反应也更加激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今天，在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时，一定要在顶住压力的同时，重点考虑怎么避免恶性循环，争取比较良性的互动。这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十分关键。

要在国际博弈中实现良性互动、获取相对优势，离不开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这里要注意传统与变化。我们党的外交工作起源于国际统一战线，新中国外交是从国际统一战线中逐步分离出来的。1944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第一份专门文件就提出，统一战线的原则一般也适用于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总理说外交工作首先是分清敌友。但要注意，我们对国际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前后有所变化。改革开放后，我们看待国际问题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认识到世界是多样化的，国家之间会有矛盾，但也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大国之间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可以合作的一面。当我们以世界眼光观察国际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国家间关系有很多灰色地带，在非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关系并非是简单的或敌或友关系。当然，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统一战线作为重要的策略原则依然有效，但也必须牢记，我们的认识已前进了一步，对于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也要有新的创造，以符合国际形势发展的要求。

其次，外交政策要目标明确，有长期准备和具体可行的方案，其实际的实施过程则充满艺术性和智慧。外交政策目标的达成、重大战略的实现、国际主动权的获得，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例如，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国

外交的基本目标就是逐步同世界各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从 1949 年中苏建交到 1979 年中美建交，这一过程整整经过 30 年。仅有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还不够，邓小平同志强调，有了外交目标、外交政策以后，一定要细化，要有步骤，成龙配套。如果只有目标和政策，但不能把它细化，不能很好地解释准备怎么实现它，这个目标往往会被认为是宣传，而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外交政策。这是我们外交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周总理强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一条古训，在外交工作中非常重要。要预之事，既包括要做之事，也包括要预防的风险。当一个外交主张或政策付之实行时，周总理还强调要“善观风向，善择时机，见机而做”。提出一项外交主张，不仅要看未来，还要看目前的时机。一项好的主张，如果提得过早，别人不认可；等时机到来时，别人也可能就不接受了。有时认为这个时机不够好，再等等，过一阵子这样的时机也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讲，外交博弈很大程度是个带有艺术性的过程，而不是死板、机械的教条。我们学党史，不仅要注意上了党史书的东西，还要注意那些没上书的东西。我们在党史书上看到的，往往是付诸实施且取得成果的内容。而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无往而不胜的真正原因，在于面对复杂情况有多手准备、多种方案。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实施的可能只是其中一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准备无用。这样的成功事例在党史上很多。反之，仅有一手准备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导致挫折。这个经验是我们需要谨记的。

最后，实现国际性与中国特色相结合。处理国际问题、外交问题，一定要把握好外交话语的国际性和中国特色的相互关系，不可偏废。外交是有着不同历史、文化、制度背景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因此话语一定要具有国际性，否则就会变成各说各话，难以沟通，无法形成共识；同时，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外交也必然会带有自己的特色，提出自己的主张。要将这二者结合起来需要智慧。在这个方面，经典的案例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事实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具有国际性，都取自公认的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没有一条是中国首创。那么，它的中国特色表现在哪里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五条是处理好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核心，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恩来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新

型外交关系与旧式外交关系的区别。他从诸多国际关系准则中提炼出这五条，认为这五条最集中地体现了新型国家关系，并具有普适性，能为各国所接受。第二，这五项原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道德和法律相结合的特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并举，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并重。值得注意的还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方式和时机。这五项原则虽然是 1953 年周恩来在中印（度）关于西藏问题谈判的时候率先提出，但真正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并产生重大国际影响，是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通过中印总理联合声明、中缅总理联合声明共同提出。选择这个时机和这种提出方式，使五项原则在冷战时代引发了空前反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如果美苏能够按照中印、中缅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相互关系，那么双方关系就可以得到改善，世界和平也能够得到保障。苏联人高度肯定他国的外交政策，这是极其罕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案例可以引起我们很多的思考，在今天也能够给我们以新的启迪。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rrent and future foreig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practice to review and reflect upon our history and experience in handling international issues. First, three elements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accurately formulate diplomacy are precise judg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proper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ffairs and diplomacy, and knowing ourselves and the competitors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game. Second, the basis for gaining the initiative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is to benignly interact with diplomatic partners, making more preparations and being ready for long-term goals, and a combination of internationality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is a classic case. It not only originates from universally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 norms, but also has obviou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t was issued during the Geneva meeting in the form of China-India and China-Myanmar joint statements. Once proposed, it quickly had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impacts. Even the Soviet Union officially called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handle their mutual rel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of China’s Diplomacy, China’s Diplomacy, Internationality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Аннотация】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и 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б истории и опыте реш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вопросов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мею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формулирования и практики нынешней и будуще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точ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правиль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ежду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делами и дипломатией, а также знание себя и соперника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гре — это три элемента правильн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КПК. Во-вторых, основой для получения инициативы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вопросах является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с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нёрами, тщательн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ко всему,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операции и сочетани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и китайски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Пять принципов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 классический случай. Он не только исходит из общепризнан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норм, но и имеет очевид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Он был озвучен в период проведения Женев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 форме совместных заявлений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в Китая и Индии, а также Китая и Мьянмы. Как только он был выдвинут, он быстро приобрё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влияние. Даже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официально призвал США регулировать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Пятью принципами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предложенными Китаем и Индией, а также Китаем и Мьянмо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ита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и китай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责任编辑 刘 军)

中俄美欧战略互动特点和发展趋势

杨洁勉*

【内容提要】中俄美欧互动关系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有助于弥补现有四方关系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战略关系总体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四方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变化。中俄美欧战略互动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四方在发展主题和命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代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互动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意义。中俄美欧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

【关键词】中俄美欧关系 大国战略互动 百年大变局 国际多极化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3-0030(21)

一、引言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主要力量不断调整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争取在当前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的有利地位和赢得未来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先机。其中，“美俄欧中是世界上四大主要力量，其互动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未来。”^①“中俄美欧四方构成的

*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

① 张健：“美俄欧中互动：欧盟角色及其政策取向”，《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2期，第10页。

全球秩序的锥体结构，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性质，也决定了这一锥体的容量，世界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圆的，而是一个容量可变的锥体。”^①显而易见，中俄美欧四方关系变化已经成为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对其进行整体建构性研究和分体解构性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四方战略关系总体相对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特别是议题性的排列组合增加了某些具有质变因子的量变。中俄既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也是美国认定的主要战略竞争者或主要威胁，但中俄仍在与美国斗争的同时争取可能的合作。美欧虽是长期的盟友，但对待中国和俄罗斯的基本立场又有很大的差别，反之亦然。例如，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高级主管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指出：“即使是在（中俄）两国都持续受到美国压力的情况下，美国决策者也怀疑中俄战略合作的持久性。”^②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也坦言，“出于对主权的神圣渴望，俄罗斯无法接受任何对外部中心的依赖，不会成为他国的‘小兄弟’……俄罗斯可扮演中美两个潜在霸主的平衡力量并成为‘新不结盟运动’的保障”。^③又如，中国学者关贵海认为：“中国不能也不应该指望俄罗斯会彻底站在中国一边与美国对抗，不必过于担忧会形成所谓‘基辛格三角’，即美俄联手遏制中国的局面。”^④

特朗普败选和拜登上台，正在深化四方的互动关系。美国正在进行重新战略思考和部署。这为四方根据世情国情变化而重新调整其相互关系并制定指导性的新战略提供了契机。如果美国能够在错误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国际社会能够在变局中开创新局，那么世界就能够超越陈旧思维的束缚，拒绝集团对抗的老路，形成共同议题的合作，走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路。但是，战略上的弃旧迎新并不总能符合人们良好和理性的期待，四方和国际

① 孙兴杰：“战略三角关系与中美欧俄的未来”，《中国经营报》，2019年6月3日。

② [美]托马斯·格雷厄姆：“中美俄关系与‘战略三角’”，《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6期，第22页。

③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Будущее Большого Треугольник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8 июня 2020 г.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budushhee-bolshogo-treugolnika/>

④ 关贵海：“中国该如何在变化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中自处”，《世界知识》，2020年第12期，第24页。

社会能否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作为，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很多的困难。

深刻理解和把握四方关系的本质，才能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超越过去和建构未来。当前国际上关于四方关系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不足，注意力往往受制于集团政治和对抗战略的习惯思维和已有路径，对于（多对）双边关系的讨论要远远多于三边或四边关系，而且对于中俄美欧四方关系的现状和前景研究，大都缺少战略和政策的备选方案。

有鉴于此，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等特长，能够对此进行弥补。为了把握四方关系的实质和规律，为了研究其对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影响，为了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我们需要在新形势下深入研究四边关系的发展轨迹，比较它们的理论框架和战略思维，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尽量做到顺势而为与主动塑造并举。

二、中俄美欧内外环境的变化

中俄美欧既是内外环境的产物也是其塑造者。四方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为重大的环境变化和最为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挑战，对此需要进行客观和深刻的认识。

（一）国际多极化进程的新发展

国际社会进入 21 世纪以来，东升西降和南上北下的态势时高时低，但总体上已经成为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1. 世界主要力量对比逐步朝着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在经济上，新兴经济体和西方七国集团的力量平衡格局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GDP数据，2000–2019 年期间，西方七国集团GDP总量从 21.9892 万亿美元上升至 39.6607 万亿美元。同期，金砖五国GDP总量从 2.7312 万亿美元上升至 21.0399 万亿美元，所占七国集团GDP比重从 12.42%上升至 53.05%。^①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一方面表现为两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相对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国经济体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尤以中国与美欧之间的相对经济实力变化为典型。若考虑到疫情对世界

① 参考世界银行 GDP 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

经济的非对称冲击，在 2020 年美欧经济出现大幅负增长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 GDP 总量占比从 2019 年的 66.62% 增长至 2020 年的 70.74%。^①同时，自英国退出欧盟后，其 GDP 已不再纳入欧盟统计构成，2020 年中欧 GDP 水平已十分接近，2021 年中国 GDP 超过欧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在政治上，美国 20 年来经历了从唯一超级大国到重新回归正常世界地位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欧盟虽然继续留在美西方阵营但明确提出“战略自主”，推动欧盟战略自主的讨论，从安全和防务政策扩展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自主，还增加了寻求独立于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②欧盟成为美国跨越红线时的“抗衡性力量”（counterweight）^③，在维护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也约束美国。^④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则不断上升。有观点提出，根植于制度和规范力量的自由世界秩序已经结束，曾经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和政治标准模范将不复存在。^⑤

在军事和科技实力上，世界排名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美国网站“全球火力”（Global Fire Power）发布的全球军事力量排行榜显示，2020 年世界军事排名前 10 位国家依次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法国、日本、韩国、英国、土耳其、德国。在科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方面的实力也在快速提升，俄罗斯同样具有独特的科技优势，美国在自信不足时试图以脱钩和集团对抗挽救其科技优势和领先地位。

2. 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积极作用和美国的负面作用恰成鲜明对比。疫情挑战了美国例外论的叙事，危机充当了“历

① 2020 年以美元计价的中美欧 GDP 数据参考 Statista 网站，美国 GDP 为 20.81 万亿美元，中国为 14.72 万亿美元，欧盟为 14.93 万亿美元。

② 金玲：“‘主权欧洲’：欧盟向‘硬实力’转型？”《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78 页。

③ Moritz Luetgerath, “Why the Vision of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Remains a Mirage”, *World Economic Forum*, March 30,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3/why-the-vision-of-european-strategic-autonomy-remains-a-mirage/>

④ Sven Biscop, “The EU and Multilateralism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s”, Egmont,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ly 2, 2018, http://www.egmontinstitute.be/content/uploads/2018/07/The-EU-and-Multilateralism-in-an-age-of-greatpowers-Sven_Biscop.pdf

⑤ Fyodor A. Lukyanov,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s Dead, But Fallout from Ill-Fated Visit of EU’s Borrell to Moscow Proves Much of West Still in Denial”,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Feb. 10, 2021,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liberal-order-is-dead/>

史的加速器，加快了美国和欧洲影响力的衰落”。^①为此，美国正在试图以中俄威胁为由巩固其战略阵营和阵脚。在地区安全格局方面，北约欧盟双东扩的势头趋缓，俄罗斯的局部反击取得一定效果；美国拼凑美日印澳“四国集团”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企图难以奏效。

3. 国际议程设置的方向性选择。尽管世界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激进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其与外部力量和内部替代者的互动中设置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架。^②因此，美欧摆脱不了“西方中心”和“结盟寻敌”的陈旧思想，把“西方优势”“西式制度”和“美欧意识形态”置于国际议程的前位而成为合作共赢和民生福祉的阻力。相反，中国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通过“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国际共商共建共享，积极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努力推动国际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际议程设置的发展方向。

（二）多重叠加难题的新挑战

当前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科技安全化等，导致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难题层出不穷和交织叠加，使中俄美欧的战略互动面对变化不定、非常复杂、日趋严峻的挑战。

1. 国内经济政治发展议程的挑战。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中俄美欧都有着各自但又同样艰巨的内部发展议程。中国在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开始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需要在 30 年的时间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俄罗斯需要在延续现有的政治架构下完成经济的升级换代，较大幅度地增加经济总量和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成为军事、政治、经济较为平衡的综合性大国。美国面对许多国内难题：一是尽早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并使社会恢复正常运转；二是努力缩小内部政治对立和弥合政治分裂的创伤；三是加快经济恢复速度和质量，加快高科技的发展。美国的很多国内问题由来已久且积重难返，可谓任重道远。欧洲（欧盟）面临的问题既有西方世界的普遍性，如选举政治制

^① Katrin Bennhold, “‘Sadness’ and Disbelief from a World Missing American Leadership”,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2020.

^② Philip Cunliffe, *The New Twenty Years’ Crisis: A Critiqu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9-2019*,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20.

度的约束和成熟经济的动力不足等，也有自身的特殊困难，即国家集团内部一体化步履维艰等。

2. 双边关系的症结加重。中俄美欧四方关系又可分为多对双边关系，相互之间的一些难题和症结在新形势下正在变难和加深。美中矛盾最为重要和突出，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消长正在加速进行，双边关系软着陆的难度显著增加。美俄矛盾部分继承了美苏对抗，在新形势下持续开展军事安全竞赛。美对外战略始终围绕着俄罗斯这一“敌人”展开，其间尽管有合作、重启与蜜月期，但终究是短暂的昙花一现。^①情绪化思维促使俄扩大与美对抗，甚至将与美全球霸权的斗争转变为外交和部分国内政策的指导思想，以曾经的美苏缓和、平等互利精神来考量美俄关系已然过时。^②俄欧矛盾具有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的性质，过去 30 年间逐步形成的俄欧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双方近乎处于“断交”边缘。^③欧洲大国逐渐认为，中俄亲密关系从侧面导致了中欧、俄欧关系恶化。^④而中欧关系则面临东西方矛盾下的政治分歧等。

3. 四方难以形成共同的议题。世纪交替之际，中俄美欧在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挑战议题上具有一定的共识思想和共同行动，但在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冲击下，特朗普“美国优先”口号风靡一时，搅乱了国际社会的思想共识。现在特朗普虽然下台了，但特朗普主义仍旧存在。而且，美欧增强了对中俄的战略警惕和战略施压，拜登政府已明确将中俄视为对手，希望以“双重遏制”战略应对中国在经济技术领域和俄在军事政治领域的挑战，重新确立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包括继续巩固、扩大美在亚洲及欧洲地区的联盟，提高对中俄经济和技术制裁的有效

① 刘军：“中俄美需建立大国良性互动”，《环球时报》，2021年3月20日第7版。

②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Без эмоций и иллюзий. Как России дальше вести дела с СШ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19 марта 2021 г.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4120>

③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ев. Какими будут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Европ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Валдай. 12 марта 2021 г.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kakimi-budut-otnosheniya-rossii-i-evropy/>

④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ельзя терпеть: Европа 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ближение//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19 марта 2021 г. <https://carnegie.ru/2021/03/19/ru-pub-84128>

性，并利用民主、人权、民族问题和日渐抬头的民族主义向中俄施压。^①四方共议全球大计的气氛和条件受到极大的破坏，因而造成四方乃至全球难以在重大议题上达成共识，并进行共同和有效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伊朗核问题都是国际合作乏力的典型案例。

（三）四方机制的解构和重构

中俄美欧四方虽然没有专门的互动机制，但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重合或交叉的机制性互动。随着时代变迁和实力消长，有的试图维护现有的机制，有的起着解构性作用，有的则试图建构新的机制。

1. 维护现有的机制。联合国安理会是中俄美欧最重要的互动机制。它们在维护现有“五常”体制上立场基本一致。但也因时因事因地而异，如美国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分别在科索沃和伊拉克问题上绕过安理会，又如美俄英法都已公开支持印度“入常”。在俄罗斯看来，美欧虽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这并不等同于严格遵循国际法，而国际法的行使权仍属于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②在当前形势下，中俄美欧很难在战略政治等问题上进行实质性的协商协调。此外，美欧俄也曾一度在“八国集团”框架下进行战略和政策沟通，然而这一机制因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而遭到破坏。

2. 解构现有的机制。四方在此问题上的具体战略和政策很不一样。美欧在冷战后维持了北约组织的存在，并不断实施东扩。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美欧具有强化大西洋关系的意愿。拜登政府上台后渲染与中俄的意识形态分歧，企图借此巩固与欧洲国家的同盟关系，开展针对中俄的施压和对抗。中俄强烈批评西方的军事盟国机制，反对以意识形态画线搞集团政治和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中俄推动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在欧亚地区和世界事务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欧对上海合作组织一直耿耿于怀，将其视为中俄在

^① Dmitri Trenin, “US’ dual China, Russia containment won’t work; governance is key, not ideology”, *Global Times*, Mar. 28, 2021,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3/1219627.shtml>

^②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s Remarks and Answers to Questions During the Online Session ‘Russia and the Post-Covid World’, Held as Part of the Primakov Readings International Forum”, Moscow, July 10, 2020, https://www.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217691

国际和地区事务上施加影响力的平台。^①

3. 建构新的机制。作为国际重要力量，中俄美欧在很多全球事务上具有共同利益。四方通过二十国集团在经济议题上开展合作。在安全领域，召开联合国“五常峰会”（P5）的倡议或为制定全球战略稳定的新原则以及提升安理会化解区域性冲突的能力提供重要动力。^②2015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德国（P5+1）共同构建的伊核协议谈判模式也可成为重要的多方互动平台。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中美欧开展了实质性协调，促成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中俄欧坚持多边主义，抵制了疫情“污名化”和民族主义。同时，四方在竞争性和对立面突出的问题上也在进行着新机制的构建。例如，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加强政策协调和机制建设，共同应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压力。^③美欧则试图组建所谓的“民主十国”等机制加强西方国家的联盟。

三、中俄美欧四方战略互动的时代特点

中俄美欧作为大国或国家集团，自然具有其相互关系的一般属性，诸如地缘战略博弈和国际主导权争夺等，然而四方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行为体，它们在时代的主题和命题上的互动具有重大而又深刻的战略意义。

（一）围绕发展主题和命题的战略互动的时代意义

发展问题在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与合作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俄美欧需要在三大发展问题上有所突破和贡献：

第一，经济关系的公平性严重不足。一是国内经济差距和鸿沟持续扩大。

① Will Green, Sierra Janik,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 Testbed for Chinese Power Projection”,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November 12, 2020, <https://www.uscc.gov/research/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testbed-chinese-power-projection>

② Andrey Kortunov, “Russia’s Foreign Policy in 2021: Fourteen Practical Tasks”,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December 21, 2020,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russia-s-foreign-policy-in-2021-fourteen-practical-tasks/?sphrase_id=75611820

③ Oliver Stuenkel, *The BRICS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Order*, London and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5; Oliver Stuenkel, *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2016.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20 年世界社会报告》强调，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平等水平都处于历史性高位，超过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不平等加剧的国家。严重的不平等侵蚀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阻碍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①二是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的不公平性问题突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合法利益难以得到维护。美国力图垄断世界经济的规制权、话语权和否决权，特朗普政府利用这一优势地位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三是世界经济成果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公平性有增无减，少数国家和少数人口拥有大多数资源。由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及国家治理缺陷，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突出，经济成果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这些都激起国际社会对新型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呼声。

第二，经济增长和生态环保的失衡严重。现代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繁荣，但也造成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气候变化的挑战进一步表明，人类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发展已达极限。为此，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绿色发展之路，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各国均需要建立新的发展观，既致力于保护自然资源及其多样性，又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的环境。2013 年以来，中国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应当成为全球发展的共识。

第三，超越经济增长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虽然都追求个人所得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因此，中俄美欧都需要为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贡献。

第四，科技发展的政治安全因素干扰严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美欧

^① “World Social Report 2020”,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January 21, 2020, <https://www.un.org/zh/desa/world-social-report-2020>

近些年来在科技优势下降和中国赶超势头日盛的背景下，无限扩大科技的政治化和安全化，并以此打造美欧和中俄对立的科技阵营。如此的发展趋势正在影响到人工智能、网络数字、生物工程乃至合作抗疫的公共卫生领域。科技民族主义的蔓延将阻碍国家间正常的科技合作、人文交流，减缓科技全球化步伐，弱化科技领域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构建完整产业链和基础创新体系能力，尤其处于不利境地。^①

（二）时代安全的问题

在新时期，和平不仅与战争相对应而存在，而且还与安全问题紧密相关。中俄美欧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问题上新的认同和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维护和平的机制。在全球层面上，中国、俄罗斯和欧洲大国都认为需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如安理会的合法作用、维和的作用等。中国正将维护联合国独立地位和全球化进程的公平正义作为捍卫国际体系的具体方式。^②在地区层面上，中国和俄罗斯重视上合组织和亚信会议的作用，美欧重视北约的作用，美国近年来还推出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在双边层面上，中俄和中美分别开展战略对话。由此可见，四方在和平机制上有同有异，但往往异多同少。

第二，裁军军控机制。中俄美欧、特别是美俄之间达成了一系列多层次的军备控制机制，然而很多机制正面临多重挑战和变动。一是正式的裁军和军控条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例如，奥巴马任期内，美俄就进一步削减核武器达成《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而特朗普政府则拒绝无条件延长这一条约，还退出了冷战时期美苏达成的《中导条约》以及多边的《开放天空条约》等。尽管拜登政府的军控政策与特朗普有较大区别，但其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二是核不扩散和军控特别机制遭受破坏。如伊朗核协议、朝核六方会谈及奥巴马任期内召开的全球“核安全峰会”等。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不仅退出伊核协议，而且大量拨款进行核武器研发部署，发展所谓可以威慑常规

① 李峥：“全球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3期，第37-39页。

② Lee Hsien Loong,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0, Vol.99, No.4, pp.52-64.

战争的“低当量”核弹头，部署打破战略稳定的导弹防御系统等，恶化了国际军控裁军形势。^①三是新设机制前景仍不明朗。例如在太空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反对限制太空军备的国际条约，拒绝联合国主导的太空透明与信任机制及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等倡议。这种发展太空武器和组建太空军的做法，使国际社会阻止太空军备竞赛的努力遭遇巨大挫折。^②对此，中国和俄罗斯则明确表示不与美国进行太空军备竞赛。

第三，热点问题应对机制。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是四方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领域，也可成为维持四方总体关系稳定的重要抓手。例如，2002年4月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及联合国建立了中东问题四方会谈机制，尽管有关方面的分歧依然明显，但这一沟通机制也促成了一些共识，成为实现中东和平进程的有效机制。中俄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着密切沟通协调。中法、中德也积极推进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经常性沟通，在联合国等框架内共同推动解决包括中东、非洲、朝鲜半岛及防扩散问题在内的热点问题。在美国对中俄实施围堵打压、“新冷战”氛围日渐浓厚的背景下，协调磋商机制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指出：“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几乎所有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离不开中美以及世界各国的协调应对。”^③

（三）时代思想意识问题

国际关系的紧迫性和应急性往往会导致惯性和惰性、甚至路径依赖。但是，新形势新变化呼唤着新思想新理论，四方在固守陈旧思维还是思想进步上存在很大的分歧。

1. 陈旧思维的束缚和局限。一是传统的国家间政治基本理念和战略思维难以适应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王毅指出：“近年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今天的世界，崇尚实力、零和博弈等观点也越来越不符合时

① 姚云竹：“2021年国际军控裁军形式的发展趋势”，《世界知识》，2021年第1期，第72页。

② 何奇松：“特朗普政府的外空军控政策分析”，《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0期，第58-69页。

③ “王毅就当前中美关系接受新华社专访”，外交部网站，2020年8月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zd/t1804247.shtml>

代前进的方向。”^①二是冷战思维在新形势下变异为所谓“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对立。美欧还借助“民主”攻击中俄的政治制度，将新斗争界定为“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为霸权对抗提供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②

2. 结盟结伴和旧轨老路的抉择。四方在定位相互关系时具有明显不同的理念和方式。中国和俄罗斯根据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如先后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年）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年）。中国还努力逐步提升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如中欧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8年）、中欧全面伙伴关系（2001年）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反观美欧，则继承了冷战以来的基本态度，还是继续寻找外部挑战或威胁，推行针对俄罗斯的欧盟和北约“双东扩”。有分析指出，自由国际秩序的军事扩张加深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疏离，虽然跨大西洋伙伴有充分理由辩称无意将俄罗斯排除在外，但是其中仍然“没有俄罗斯的位置”。^③近年来，美欧强调对华开展战略竞争，以此维系和巩固跨大西洋的同盟体系。

3. 应急权宜和标本兼治的矛盾。中俄美欧作为世界主要力量，不仅需要思想认识上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且需要不断进行思想理论创新。然而，四方在国际关系思想理论方面的差异明显。中国倡导与时代进步相适应的体系观、义利观和发展观等。俄罗斯试图用“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填补全球思想的“真空”，完善其“大国主义”和“强硬外交”理论。^④美国则依旧绕着“领导世界”和“美式民主”打转，欧洲也难以跳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四方的思想理论在未来一二十年里的差距可能还会扩大，至多在某些方面达成有限共识，思想理论的整合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① 王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讲话”，2020年7月20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zd/t1798986.shtml>

② Samir Puri, “Today’s Imperial Rivals”, *The World Today*, June 1, 2020, <https://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s/twt/today-s-imperial-rivals>

③ William H. Hill, *No Place for Russia: European Security Institutions since 198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④ Караганов С, Суслов Д, и др. Защита мира, земли, свободы выбора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Доклад НИУ ВШЭ. Москва, 2020.

四、中俄美欧四边战略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俄美欧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事务和四方关系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一）总体上以多极格局为主

当前国内国际对于世界力量对比的格局有多种预测，除多极格局外，还有新两极格局观和无极格局观等。

1. 政治上的多极格局观。中俄欧的多极格局观具有连续性。例如，习近平强调：“中国和欧洲是国际上两大重要力量，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拥有广泛共同利益。”^①又如，普京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因素。”^②再如，欧盟致力于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有意识地保持对美战略独立性。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出，欧美双方拥有不同的地理条件、社会政策和理念，欧洲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拥有自己的政策，而不仅仅是跨大西洋政策。^③但是，中俄欧对多极的阐述多有差异，欧洲和俄罗斯都抱有成为单独和自主一极的愿望。有俄方学者提出，俄罗斯应推动不同于中美两极化趋势的进程。^④还有学者认为，俄罗斯“背离西方”并不意味着自动“转向东方”，俄可能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孤独者”，主要依靠自有资源追求自身利益。^⑤此外，美国的单极观仍根深蒂固，不时会抬头挑战多极格局观。

① 习近平2019年3月26日在巴黎同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举行会晤。

② “普京说俄中合作是推动世界多极化重要因素”，新华网，2019年12月20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2019-12/20/c_1125367088.htm

③ 金玲：“欧美关系重塑：构建从盟友到伙伴的新平衡”，《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56-57页。

④ Андрей Коргунов. О мудрой обезьяне, спускающейся с горы// РСМД. 4 мая 2020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o-mudroy-obezyane-spuskayushchey-sya-s-gory/>

⑤ Fyodor A. Lukyanov, “The time to be by yourself”,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21, No.1, pp.5-10.

2. 经济上以多重结合为主。经济发展是国际格局演变的首要因素，中美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但中俄美欧的经济关系的结合和分离则可能受到各种重大因素或事件的影响，而且还会发生相互间的重大影响，如特朗普时期中美经济关系对世界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因此，四方经济力量对比将呈复合式组合，可能出现三个方阵：引领的是中美日益相对平衡的双重组合，居中的是进入英国脱欧整合期的欧盟，殿后的是经济弱化趋势严重的俄罗斯。此外，高新科技将迎来新的重大突破，中俄美欧四方竞争的烈度、广度和深度都会加强，甚至出现两大对立群体而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动力和可持续性。

3. 政治外交上以两两相对为主。中俄美欧四方的政治关系仍将带有强烈的“西方和非西方”色彩。中俄都将坚持符合国情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发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的能量和作用，而且中国还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区别于西方的别样选择。美欧在西方内部矛盾增加和外部影响减弱的形势下，将主要突出西方价值观，翻新“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理念，并继续坚持“西方”对“非西方”的基本政治外交立场，并以此固群和组群。四方虽然在“高政治”和“硬外交”上的斗争面增多趋强，但在“低政治”和“软外交”上可能实现较多的务实合作。随着特朗普下台和拜登执政，四方在气候变化、共同抗疫、恢复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进行沟通 and 协调，并在“多边主义”的名义下进行机制性合作，并为未来更多的合作进行铺垫。

4. 安全军事上的复杂关系。中俄美欧之间将呈现“双边竞争、三边博弈、四边联动”的安全军事格局，即中国和美国的 bilateral 安全军事竞争、俄美欧的双方三边安全军事博弈、中俄美欧的四边军事安全联动。相关的主要议题和领域包括：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军备裁减问题，特别是拥核国家因高度缺乏互信而导致的对话机制不畅或缺少对话，在网络空间、外太空等新的作战环境中行为准则的缺失^①，以及俄欧美在欧洲、美中国在亚太/印太的安全军事双边、多边对抗等。此外，还需要警惕一系列原有或新增的直接安全军事

^① Караганов С, Суслов Д, и др. Защита мира, земли, свободы выбора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冲突，例如俄罗斯同美欧在克里米亚的后续冲突，中国同美国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的冲突，以及网络战、无人机战和机器人战等高科技衍生的军事冲突。

（二）多层多种的机制互动

中俄美欧四方未来不太可能建立专门的四方机制，仍将主要依托现有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机制和架构开展互动。

1. 全球性机制互动。未来四方互动的主要机制性平台仍是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四方在这些全球性平台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且围绕不同思想理念及话语权的竞争面可能会上升。此外，美欧将会强化针对中俄的排他性机制，如七国集团、“观点相同国家联盟”“民主十国联盟”“科技民主十二国”^①等。这种建立在“小圈子”之上的合作机制是对多边主义的背离，将加剧世界的分裂。同时，考虑到中国坚持走开放发展道路和美欧内部分歧难以弥合，这种建设排他性机制的企图最终将落空。

2. 地区性机制互动。中俄美欧四方在地区层面的机制性互动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以中俄为主的机制，例如中俄共同参与和发挥重要作用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一带一路”，以及由俄罗斯领导并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欧亚经济联盟等。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拓展与欧洲的机制性合作，打造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格局。英、德、法、意等欧洲主要大国共同参与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20年底中国和欧洲签订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二是以美欧为主的机制。为了推进其印太战略、加大对中国的围堵，美国2017年以来主导激活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试图建立印太地区多边安保框架。这一机制在美国的推动下可能会更趋活跃、更具同盟性质。三是以地区为中心的交叉机制。四方在开展对非洲等地区的外交中存在着机制上的交叉和竞争。中非自2000年以来定期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双方注重“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2063年议程》等发展议程

^① 美国国务院前官员杰瑞德·科恩和理查德·冯塔内提出了“科技民主十二国”的概念，即：美国和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韩国、瑞典。Jared Cohen, Richard Fontaine, “Uniting the Techno-Democracies: How to Build Digital Cooperatio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20, No.6, pp.112-122.

的对接。美国对中非关系发展持警惕态度，2014 年召开了首届美非领导人峰会，目前美国保持对非最大官方援助国地位，并在非洲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①欧非峰会自 2000 年启动以来已经举办五届，会议主题涉及经济合作、非洲发展、对非援助及安全合作等。^②这些机制之间既存在合作的空间，也具有争夺对非影响力的色彩。

3. 地区内部的互动机制。中美同属于亚太地区，然而近年来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却展现出保守和开放两种不同的路径。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在面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日本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推动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极力抨击 1994 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经过强力施压最终通过新的《美墨加协定》。新协定中极具排他性的“毒丸条款”可能成为美国重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工具之一。^③特朗普 2017 年上任后还退出了奥巴马时期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经过 8 年谈判，2020 年 11 月，中、日、韩、澳、新西兰及东盟共 15 个国家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一协定是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是东亚区域合作和自由贸易的标志性成果。不仅如此，中国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展现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的决心。中美之间的竞合将是亚太地区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三) 战略思维和思想理论的创新

如同其他行为体一样，四方的战略思想主要来源于过去和当前的内外环境和互动实践，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出新的战略和理论。同时，后者是否正确有效，则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只有准确把握历史发展方向，才能保持战略思维和思想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和与时俱进。

1. 国际格局观守旧和创新。国际格局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在关键时期会发生嬗变。中国的多极格局观已经行之有年，也会根据形势发展而有所调整。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表述为“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

① 何迪：“美非合作现状分析及启示”，《开发性金融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66 页。

② 王涛、鲍家政：“‘多边-多边’机制视域下的欧非峰会探析”，《西亚非洲》，2018 年第 4 期，第 142-144 页。

③ 刘卫平：“大国竞合下的美墨加协定”，《人民论坛》，2020 年第 27 期，第 126-129 页。

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则为“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俄罗斯和欧洲大国都认同多极格局观，但具体表述也各有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2021 年 1 月 27 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指出：“试图建立集中的、单极的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样的垄断违背了我们文明的文化和历史多样性。”^①欧盟和欧洲大国认同多极化并希望在多极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报告都回避世界多极化进程，重点强调要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例如，拜登政府的《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和导致新的威胁。……尽管变化如此巨大，但美国在所有形态和领域的力量所拥有的持久优势，使我们得以塑造国际政治的未来，从而推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并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安全和繁荣的世界。”^②

2. 多极化进程中的多边主义。在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多边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从原来主要是外交手段和方法朝着外交原则和架构的方向发展，并使美国的单边主义更加不得人心。

中国历来强调世界事务应当共商共议而不能一家说了算。尤其是在单边主义和霸凌蛮横行径抬头之时，中国针锋相对地把多边外交提升到多边主义的高度，即从外交的行为方式上升到外交的原则理论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指出：“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边主义。”^③王毅指出：“当前要做的是，各国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国际贸易规则，共同推动以对话协商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与挑战。”^④

普京上台后，表示要在独立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为此

① “普京：试图建立单极世界的时代已结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1 年 1 月 27 日，<http://sputniknews.cn/russia/202101271032976857/>

② *Renewing America's Advantages -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21, pp.7-8.

③ 转引自杨洁篪：“倡导国际合作，维护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 55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主旨演讲”，2019 年 2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638506.shtml>

④ 王毅：“新时代应坚持多边主义”，新华社，2018 年 7 月 3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7/03/c_1123074284.htm

把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作为恢复和推进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理念和手段。2020年9月21日，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的视频发言中提出，当今世界已经厌倦被分裂，需要更多的多边协助与合作。^①在俄罗斯精英界看来，源于20世纪下半叶的多边主义已经过时，其替代方案并非重返两极、单极或曾经的多极秩序，而是以各类行为体参与的具体项目为依托，以共享价值为“目标”而非“前提”，维系基于一定规则、程序和权力的全球范围内的无序状态。^②

美国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强调美同盟体系和在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拜登的多边主义否定了特朗普大肆宣扬的“美国优先”以及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主权主义等。但是，拜登的多边主义具有强烈的针对中国的一面。例如，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国务院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说，正式将其外交核心定位在以美国“领导”的多边主义，美国要领导其盟友形塑国际新秩序，以及应对作为美国竞争者的中国。^③

欧洲的多边主义强调规范和价值观。2021年2月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对欧洲版的多边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多边主义绝不仅仅是另一种外交手段。它能够塑造世界秩序，是一种基于合作、法治、集体行动和共同原则以组织国际关系的非常途径。我们必须建设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尊重我们的分歧和载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共同价值观，而不是挑动不同文明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争斗。”^④

①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s video statement on behalf of the CSTO member states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high-level meeting to commemorate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U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eptember 21, 2020.

② Andrey Kortunov, “Multilateralism Needs Reinventing, Not Resurrecting”,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December 9, 2020.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④ Emmanuel Macron et 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for Global Recovery”, Project Syndicate, February 3, 2021,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multilateralism-for-the-masses-by-emmanuel-macron-et-al-2020-02>

3. 塑造时代性正义和综合性公平的道义论。新冠疫情暴露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些结构性弱点：首要的是自由主义本身的矛盾，以及主要成员长期以来过度发展军事力量，使其社会、治理和基础设施走向衰败。^①在此背景下，中俄美欧都需要在举何种道义之旗和推出何种政治诉求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新思考和新互动。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和文化进步的同时，需要重新审视和深化人的全面安全、国家本职和国际责任等方面的道义道德问题，大国要在延续各自基本道义的基础上进行新的道义交流交汇交锋。在全球抗疫进程中，“以人为本”和“生命第一”的思想为国际关系增加了新内涵和新方向。加强环境保护和提高生命保障或许能够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最大公约数。道义道德的塑造和融合是个长期和艰巨的系统工程，在特殊情况下，如《联合国宣言》提纲挈领地提出宏大目标，但更多的是通过由个别到全面的逐步累积。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途径，但美国却仍旧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打转。

五、结语

中俄美欧四方战略互动已经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是朝着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方向前进，还是重回集团对抗的老路？后者就是时下国际社会正在热议的“新冷战”问题，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与冷战时期西方和苏东集团两大阵营的对抗相比，当前美欧与中俄之间的阵营性对抗更为弱化。美欧在世界政治经济以及中俄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但很难在推进“新冷战”问题上形成共识与合力。中俄加强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而不是发动“新冷战”。

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需要在反对“新冷战”和建设相对稳定和基本平衡的大国关系方面做出以下的努力。

^① [英]理查德·萨克瓦：“拧紧螺栓：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5期，第32页。

首先，从当前国际社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着手，不断以“早期收获”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以下是中国和国际社会近期共同努力的主要议程：加强国际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世界经济的早日复苏，提高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管控重大热点和大国间的分歧。

其次，加大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建设力度。要在确定基本原则和建设方向的基础上，提出具体和可行的方案。其一，总体机制框架要体现当前和未来国际力量对比的态势，同时还要推进地区和跨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其二，机制运作要兼顾公平与有效，发挥相关国际体制和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其三，议题设置要有服务世界的“议题意识”和“民生意识”，坚决反对西方的“自我中心”和“唯我独尊”。

最后，尊重广大中小国家的权益和作用。当前，广大中小国家具有强烈的联合自强意识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展望未来，中小国家的新能力、新意识和新作用还会继续上升，成为全球性大国尊重和争取的对象。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among China,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nce-in-a-century changes.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holism could help make up for existing researches on the four-party relationship.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hina-Russia-U.S.-Europe strategic relations have been generally stable, but they have also undergone dynamic adjustments due to changes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After Biden came into power, the four-party relationship is encountering new and important changes.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four parties is at a crossroads of history.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four parties on development and setting agendas,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n addition to seeking ideology of the times is of great and profou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Neither China,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nor Europe alone could dominate curr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affairs, but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greater development and gain a more active position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not only avoid the "new cold war" reactively,

but also create actively a new environment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 new typ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 China-Russia-U.S.-Europe Relations,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Once-in-a-century Changes, the Global Multi-polariz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Интерактив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Россией, США и Европой — важн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часть века перемен.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и холизм Китая могут обогатить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четырьмя сторонами.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Россией, США и Европой в целом были стабильными, но они претерпели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из-за изменений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среды. После прихода к власт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Байдена в СШ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четырьмя странами вновь претерпевают новые важ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Россией, США и Европой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перекрёстке истор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четырёх сторон по темам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 развит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мир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идеологии времени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и глубок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Ни Китай, ни Россия, ни США, ни Европа в одиночку не могут доминировать в текущих и будущ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мировых делах, но в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возможно добиться боль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занять более активную позици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должно не только реактивно избегать «ново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но и активно создавать новую среду д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выстраивать новые тип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Россией, США и Европо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век серьёзных перемен,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

(责任编辑 崔 珩)

苏联解体与俄罗斯国家建设**苏联解体 30 年：回顾与思考***

于 滨**

【内容提要】30年前的苏联解体，至今仍在以各种方式，或多或少、间接直接撬动欧亚大陆敏感的地缘政治神经。本文力图从个人（戈尔巴乔夫）、国家（苏联）和国际体制三个维度，审视那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的偶然与必然，评判政治精英的沉浮，以及国际体制转型的震荡。作为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冷战体系终结和帝国解体中负有主要责任，直接导致了苏联体制的瘫痪和瓦解，尽管这并非戈氏本意，也完全超出西方预想。相对于戈氏面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采取的激进和天真的改革举措，中国一直在探索和优化执政党、国家机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机制和不同的排列组合；以开放姿态，渐进改革，灵活务实，使体制“立新”的速度和质量，远超改造、破除旧机制的进程。在国际层面，苏联解体而导致的单极世界并未“终结”历史，而是开启了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盛极而衰的过程。面对中国历史性的崛起，新一轮大国博弈已见端倪。

【关键词】苏联解体 国际秩序 俄美关系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中图分类号】D7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3-0051(22)

苏联解体 20 周年时，普京有言：“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21世纪的国际格局与中俄关系：传统、现代与未来”（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2）的研究成果。

** 于滨，美国威登堡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基地重大项目承担人。

心。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①又过了 10 年，苏联作为一个曾经的理想和意识形态，一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品，一个几乎支配了整个 20 世纪国际风云的庞大国家，她的苦难与辉煌、希望与失望、欢乐与悲哀，如今不过是一些特定的历史符号，且渐行渐远。

往事不可追，未来不可及。21 世纪西方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普京所说的“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Крупнейш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XX века），而是主导世界四分之三个世纪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LIO）能否存续的问题。“历史终结论”本身已经终结，未来却充满极大变数。

本文力图从个人（戈尔巴乔夫）、国家（苏联）和国际体制三个层面，审视戈氏短暂但却足以改变世界的政治生涯，苏联解体的偶然与必然，以及伴随苏联崛起和败落的两极体制本身的利害得失。

一、戈尔巴乔夫：“未盖棺，已定论”？

2021 年 3 月初，世界仍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之中，对 30 年前的苏联解体之追忆却不期而至。原因很简单，2021 年 3 月 2 日是戈尔巴乔夫 90 寿辰。戈氏作为苏联最后一任国家领导人，在任期间亲历了苏联超级强国的历史性改革和解体。如今，苏联解体余波尚存，不仅欧亚大陆碎片化仍在继续，戈氏和当年众多政治人物所憧憬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也已危机四伏，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前就难以为继。唯一不变的，却是人们对戈氏改革和苏联解体看法的巨大反差。

一方面，西方仍高度评价戈氏及其改革。美国总统拜登在给戈尔巴乔夫的生日贺电中，称赞他“对自由的承诺和勇敢做出了艰难而又必要的决定，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并继续成为激情的源泉”^②。戈尔巴乔夫在任期间，其政策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 1990 年的两德统一。德国总理默克尔为此

① Пути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распад СССР стал трагедией для миллионов. 5 мая 2005 г. <https://ria.ru/20050505/39937603.html>

② “Joe Biden congratulates Mikhail Gorbachev on his 90th birthday”, Mar.2, 2021, <https://tass.com/world/1292865>

再次感谢戈氏“为和平克服冷战和完成德国统一做出的奉献”^①。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看法仍以负面为主。戈氏90岁生日当天对塔斯社说，他当年的改革在俄罗斯仍是“众矢之的”。皮尤（Pew）近年来数次民调数据表明，大部分俄罗斯人（三分之二左右）都认为苏联解体是件坏事，而35岁以上年龄段的人对苏联垮台持负面看法的更占到78%。即便是在18-35岁对苏联没有直接经历的人群中，仍有半数人认为苏联解体是坏事。^②2018年的另一项民调显示，只有5%的俄罗斯人仍然赞同戈尔巴乔夫当年的改革。^③

30年易过，俄罗斯国内外对戈氏评价的反差依然巨大。一国最高领导人，在国外被高度赞扬，在国内却被人们摒弃，如此内外有别，且30年如一日，世界史上绝无仅有。

西方对戈尔巴乔夫的敬重，不仅仅是出于礼仪（戈氏是终结冷战一代领导人中唯一在世者），更是基于利益。其实，戈氏“新思维”的最初着力点是外交。他在1985年就任苏共总书记当年，就在11月与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会面。一年后两人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再度晤面，戈氏提出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建议，美方为之震惊。次年美苏达成历史性的中导协议，解除了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核威胁。^④此后，戈氏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自东欧、阿富汗撤军，促成两德统一，对东欧剧变网开一面。戈氏一系列外交大手笔，令人目不暇接，在西方形成一股强劲的“戈尔巴热”（Gorbamania），以至刚刚上任的美国老布什总统相形见绌。布什身边的人透露，戈尔巴乔夫的头像天天上头版头条，布什为此火冒三丈。为了给席卷西方的“戈尔巴热”降温，老布什政府甚至以种种方式，包括发布假新闻，以迟滞和干扰其前任

① “Former Soviet leader Mikhail Gorbachev celebrates his 90th birthday”, Mar.2, 2021, <https://www.dw.com/en/former-soviet-leader-mikhail-gorbachev-celebrates-his-90th-birthday/a-56751812>

② “Views on role of Russia in the region, and the Soviet Union”, May 10, 2017, <https://www.pewforum.org/2017/05/10/views-on-role-of-russia-in-the-region-and-the-soviet-union/>

③ Andrei Kolesnikov, “A Russian View on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30 Years On”, *Moscow Times*, Nov.7, 2019,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11/07/a-russian-view-on-the-fall-of-the-berlin-wall-30-years-on-a68075>

④ “Gorbachev and New Thinking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87-8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1-2009.state.gov/r/pa/ho/time/rd/108225.htm>

（里根）与苏方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执行。^①

由此可见，戈氏改革节奏和力度大大出乎西方意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方让利，不求对等。然而惊喜之余，美国和西方对戈氏的善意和天真，充其量是积极推导、适当规范，但不会允许苏方喧宾夺主。苏联领导人在西方走红后，戈氏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

30年后，戈尔巴乔夫承认其当年的政策“有误”，也意识到有人批评自己“过于相信”他人。^②当年西方政要私下对戈氏多次表示，北约不会东扩，后来都不认账。^③戈氏后来意识到西方口惠而实不至，然而为时晚矣。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误判，韩克敌在苏联解体20周年的一段论述非常到位：

美国的利益和苏联的利益有交集的地方，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这是他比其他苏联领导人高明的地方。但是，美国利益和苏联利益根本不一致的地方，戈尔巴乔夫没有看到，或者说是看到了但天真地不愿意承认。而这种根本利益的不一致，不会因为苏联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因为苏联领导人世界观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因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④

内政方面，苏联解体后，戈氏对其政绩的反思相当矛盾。一方面，他仍坚持认为尽管有些举措失当，但改革的大方向正确，而且政治改革必须先于经济改革。与此同时，他又多次表示联盟应该保留。^⑤对此，笔者不怀疑戈氏保留联盟的意愿。苏联解体10年后戈氏访问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演讲中，与主办方的意愿相反，他坚持认为苏联解体是一个错误，当时的场面相当尴尬。^⑥尽管如此，戈氏政策实施的结果，却是打压维护联盟的爱国

① Jim Hoagl, “Needling Gorbachev”, *The Washington Post*, Apr.13, 1989.

② “Mikhail Gorbachev: I’m bashed for Glasnost, but it was key for change”, Mar.2, 2021, <https://tass.com/politics/1261489>

③ Joshua Shiffrin, “Deal or No Deal?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U.S. Offer to Limit NATO Expan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6, Vol.40, No.4, pp.7-44.

④ 韩克敌：《美国与苏联解体》，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⑤ “Soviet Collapse Violated the People’s Will, Gorbachev Says”, *Moscow Times*, Mar.17, 2021,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1/03/17/soviet-collapse-violated-the-peoples-will-gorbachev-says-a73267>; “Mikhail Gorbachev: I’m bashed for Glasnost, but it was key for change”, Mar.2, 2021.

⑥ Larissa Kosel, “Ex-Soviet Faces Next Century”, *The Lantern*, Nov.12, 2002, <https://www.thelantern.com/2002/11/ex-soviet-faces-next-century/>

派，纵容亲西方的自由派，而最终两方面都不待见。当时的苏联政坛党派林立，乱作一团，而人们的共识则是，“我们需要先摆脱戈尔巴乔夫，然后再重新洗牌”^①。

作为苏联帝国和冷战体系的终结者，戈氏内外政策引发的剧烈震荡，最终吞噬了戈氏本人。“当一个国家关注外来的评价胜过自己人民的感受；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总是挟洋自重，希冀来自异域的声援和支持；当政治领导人考虑个人利益甚于国家利益……这个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了”^②，韩克敌如是说。

普京时代，戈普二人的关系尚属“正常”。普京治国，连选连任；戈氏退而不休，时而论政。苏联解体 20 周年时，普京称苏联解体为“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戈尔巴乔夫则奉劝普京不要再度出山，“普京已经担任两届总统和一任总理。如果我身处其位，不会再度参选总统”^③，戈尔巴乔夫告诫说。

尽管两人理念南辕北辙，普京对这位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仍不失礼仪，甚至德俄首脑会谈时，戈氏也应邀出席。毕竟，戈尔巴乔夫在德国被称为三位“德国统一之父”^④之一。统一后的德国，一直是俄罗斯欧洲政策的基石，普京期待戈尔巴乔夫发挥余热，也是俄罗斯的利益所在。^⑤

2020 年底，耄耋之年的戈尔巴乔夫在新著《何去何从：呼唤和平与自由》^⑥中强烈批评北约东扩：“北约东扩的决定是西方最大的战略错误。它导致欧洲以至欧洲以外地区军事政治形势的动荡。”^⑦而书中对普京的评价也似更为接近现实：

当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总统时，俄罗斯一片混乱……在这一灾难

① Sergei Baburin, “Who Killed the Soviet Union?” *Moscow Times*, Dec.26, 2011.

② 韩克敌：《美国与苏联解体》，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年，第 6 页。

③ “Gorbachev Says Putin Should Go”, *Moscow Times*, Mar.2, 2011.

④ “Fathers of Unity”，另外两位“统一之父”是老布什和科尔。

⑤ “Former Soviet leader Mikhail Gorbachev celebrates his 90th birthday”, Mar.2, 2021, <https://www.dw.com/en/former-soviet-leader-mikhail-gorbachev-celebrates-his-90th-birthday/a-56751812>

⑥ Mikhail Gorbachev, *What Is at Stake Now: My Appeal for Peace and Freedom*, Jessica Spengler (Translator), Polity, 2020.

⑦ “The Biggest Takeaways From Former Soviet Leader Gorbachev’s New Book”, *Moscow Times*, Oct.29, 2019.

性的场景中，我很难想象任何人会按照“民主教科书”的套路按图索骥……俄总统别无选择，只能果断行事。他的一些做法被称为威权方式，社会上有人提出批评……如果威权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一个强大的现代民主，那么我就支持他，即便我不同意他的一些具体做法和决定。^①

戈尔巴乔夫 90 寿辰时，普京也发了贺电。短短电文中，戈氏被评价为“当代出类拔萃之辈和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更为关键的是下一句，“对国家和全球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②。毋庸置疑，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至于是变好变坏，是祸是福，见仁见智，普京仅仅是在描述一个人与一个帝国“人是而物非”的事实。

戈氏应是苏联最长寿的领导人（第二长寿者是 87 岁的马林科夫，但他身居高位仅一个月便让位于他人），也许也是俄罗斯帝国史上最长寿的执政者。一个夭折的帝国，一位长寿的掘墓人，二者之反差，足以令人思绪万千。

笔者曾数次前往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那里安葬着俄罗斯著名的作家、剧作家、诗人、演员、政治领导人和科学家等。这是一座特殊的无声纪念馆，它记录了俄罗斯的辉煌和苦难，光荣与梦想，其中很多墓志铭都在述说我们所熟悉的故事。不经意来到戈尔巴乔夫夫妇的墓地，戈氏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已长眠于此，右边是为戈尔巴乔夫预留的空地。戈氏尚未盖棺，历史已有定论，即普京所说“对国家和全球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必然与偶然之间

对于 30 年前的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体制、决策和社会等宏观层面，苏联的衰败和解体非一日之寒，尤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体制僵化，经济低迷，军费沉重，两线作战，扩张过度，脱离群众……都程度不同地侵蚀着苏联的庞大机体。后续的改革失误，外部干预，更加速了这一过程。对此，多数学者对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乐此不疲，也无可厚非。

① “The Biggest Takeaways From Former Soviet Leader Gorbachev’s New Book”.

② Putin, “Congratulations to Mikhail Gorbachev,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Foundation for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Mar.2, 2021,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5084>

毕竟，庞大的苏联体制，即便是在正常情况下，也会积累种种痼疾，在飞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的诱惑和挑战中，显得步履蹒跚，举措失当，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世界上体制僵化、经济不振的国家比比皆是，古今中外，尤其是帝国的消亡，无不经历了漫长的衰败过程，而且往往是在连年对外征战和长期内部腐败之后。而作为一个现代的超级强国，苏联解体过程异常迅速。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三天后便作鸟兽散，苏联庞大的党政军系统无所作为，快步进入自由落体的不归路。对此，深受苏联文化熏陶的作家王蒙感叹道：“苏联说没有就没有了，苏共说解散就解散了，卢布说贬值就土崩瓦解……”^①

对于苏联体制的快速崩塌，近期学界的一些研究值得关注。其中复旦大学俄罗斯问题学者赵华胜教授提出的“浅层原因”，令人耳目一新。这篇2021年4月26日发表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的“苏联解体的浅层原因”一文，不同于一般的学究式考证，而是力图从“哲学角度”，将苏联解体的瞬间过程，置于历史和常识的坐标之中加以考量，开辟了一个观察历史事件和决策人物的不同视角：

苏联的制度模式有诸多弊端，但这些弊端与苏联解体没有直接关系。要说有，也只是间接关系。这些弊端使苏联不得不改革，苏联却在改革中丧失了存在。不过，葬送苏联的不是苏联制度模式，也不是改革，而是改革中的错误。改革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方向正确不意味着政策的和策略的正确，也不意味着改革一定成功。反过来说，改革失败说明一定存在严重问题，但不一定表明改革是错误的。^②

苏联的民族问题常常被用来解释导致联盟迅速瓦解的原因。赵华胜也认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复杂，处理有相当难度。更何况15个加盟共和国中14个是少数民族，其中6个信奉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近50%。但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而且还有比较成功的一面：

苏联最大的成功在于它使“苏联”和“苏联人”成为共同的身份认

① 王蒙：《苏联祭》，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② Zhao Huasheng, “The ‘Non-Deep’ Caus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RIAC), Apr.26, 2021,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ally-and-comments/analytically/the-non-deep-causes-of-the-disintegration-of-the-soviet-union/>

同（波罗的海三国除外）。俄语作为通用语言得到普及，世俗化深入社会，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可以相容，不同族裔的人可以在一起正常工作和生活，对民族身份和相互差别的感觉不是那么强烈，不同民族间通婚也习以为常。诚然，苏联的民族关系并不完美，但民族关系总体上是好的，认为民族关系不好导致苏联解体是过于主观的联系。^①

有鉴于此，改革的主要起因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事实上，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对保留联盟的支持度达95%，它们对苏联解体“最初感到的不是喜悦，而是茫然甚至是失落”^②。

根据一般的逻辑关系，赵华胜也不认同经济困难和军备竞赛是苏联体制快速崩塌的直接原因。“从一般的道理来说，经济状况与国家分裂没有必然联系……经济衰败确实使苏联国内政治矛盾加剧，社会不满高涨，但它导致的结果是政治斗争激化和社会混乱无序，而不是苏联解体。独立主要不是经济诉求，而是政治诉求，经济问题常常是独立的垫脚石，不管国家经济状况怎么样，都可以成为要求独立的理由……最终是中央政权瘫痪致使民族独立如脱缰野马，国家对局势失去控制能力，使联盟分崩离析”^③。

在这个意义上，赵华胜认为苏联解体是偶然不是必然。“联盟中央有许多拯救联盟的机会，即使是在联盟存在的最后半年，机会依然存在，但联盟中央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使它不能做出决断，失去了最后的机会”^④。

赵华胜还特别指出，在苏联处于国家命运多种选择之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将苏联推向解体不归路的居然是作为苏联主体的俄罗斯：

俄罗斯是苏联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就是苏联，苏联解体后也是由俄罗斯作为它的继承国。但作为主体民族，俄罗斯自我放逐，要求从联盟独立，它不是把那些想离开苏联的共和国拉回来，而是鼓励它们跑得更远，并视它们为经济负担，将它们弃之如敝屣。主体民族要独立，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少见，不能不说是苏联解体的一大奇观，也是苏

① Zhao Huasheng, “The ‘Non-Deep’ Caus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② Ibid.

③ Ibid.

④ Ibid.

苏联解体不同于一般国家分裂的重要特点。^①

对于戈尔巴乔夫，赵华胜指出：“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并没有摧毁苏联的意图，也没有抛弃苏联的理论，在维护苏联的统一上，他的问题不在于‘背叛’，而在于失控。”

所谓政治背叛主要是中国部分学者的一种看法，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苏共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制度，背叛了共产党的领导。这种说法是对苏联解体的一种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解读。苏联解体与它的意识形态体系没有直接关系，与它的国家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甚至与谁是执政党也没有直接关系。^②

赵华胜上述推论，虽然是针对苏联改革的各种流行叙事方式的“哲学”反思，也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在政治精英和国家机器与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市场和族群）之间的互动层面。

在战后的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学中，有两个“基本盘”，即自由主义的类型论和现实主义的能力论。前者注重政体类型，即西式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类型国家属于现代型；后者关注国家治理能力，不在乎国家政体类别。二者之间，自由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③尽管新自由主义对西方本身侵蚀极大，^④但随着冷战式微，西方还是将新自由主义模式以所谓“华盛顿共识”推向世界，^⑤对中俄在内的转型体制都产生巨大影响。

对于一直以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为主线的苏联体制，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震荡疗法，与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所实行的经济私有化一步到位的经济震荡疗法一样，其结果是只有致死的震荡而无任何疗

① Zhao Huasheng, “The ‘Non-Deep’ Caus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② Ibid.

③ 在政策操作层面，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撒切尔率先，里根随后，将西方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推向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称之为“新保守主义”），主张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力度越小越好。

④ 在美国，后冷战时期新自由主义当道，极大地弱化了政府的执政、监管、协调和均富能力，其弊病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就已充分显露，如极度贫富不均、2008年金融危机、阿片泛滥、联邦政府对波音安全问题放弃监管等等。

⑤ 在国际层面，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1989年率先抛出“华盛顿共识”，将新自由主义模式推向世界。John Williamson,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v.1, 2002, <https://www.piie.com/commentary/speeches-papers/what-washington-means-policy-reform>

效。戈氏改革以弱化、回避以至消除现存的政治秩序为前提，至少是忽略了西方政治学中现实主义大师亨廷顿的治理能力论：“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①

亨廷顿在秩序与自由之间的选择，其实是个伪命题。在西方对中俄转型研究中有一些几乎一成不变观念，如，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只有政治改革而无经济改革；中国是渐变，苏联是突变，等等。这些看法不能说全错，但仅仅着眼于中苏改革的表象。

在实际操作中，秩序和自由不是一个二择一的问题，而是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度”与“速”的互动和平衡。对中俄这样的超大型的国体，如何在改革与秩序之间实现同步和均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门艺术。这里，笔者借用赵华胜的“哲学”探讨的路子，以比较的方式，进一步审视戈氏改革。

首先是体制问题。虽然中国和苏联都实行过一定程度上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但两国的国情和历史非常不同，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工业与农业等方方面面都不尽相同。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一直实行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垂直系统。苏联体制下的企业厂长制，军队中的一长制（政治委员服从军事首长），农村的集体农庄制度，都体现了苏式自上而下的“管控”观念和机制。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联精英，对如何改动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完全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几乎是跟着感觉走。

而中国的政治精英则一直在探索和优化执政党、国家机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机制和不同的排列组合。这其中包括学习苏联模式，但又力图使之适应中国国情（如 1956 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国精英对各种体制的探索和尝试，有经验也有教训，但从未停止过，包括在改革开放前十年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启的历史性改革，就是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姿态，摸索、试验和优化适合中国国情的治理机制。“治理”概念在中国，不仅仅是一般所说的国家治理能力（governing ability），或亨廷顿的静态型秩序（order），它包括“理顺”各种复杂的关系（上下、左右、

^①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7-8.

工农、军民、贫富、轻重工业等），目的是“优化”不同的治理方式。

相对于中国的“动态”治理机制，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官僚体制非常稳定，具有一般官僚体制的惯性和惰性；很难说是高效，但绝非是一个失败的体制。正因为如此，要说服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强国的官僚阶层对现存体制进行深度整改，难度非常之大。官僚体制对戈氏改革的抵制，迫使这位年轻的苏共总书记只能在体制外营造变革的气氛和声势，如所谓“透明化”（гласность）。而戈氏发起的“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苏联党政机制的改革，却使上下级、各部门之间相互掣肘，各自为政，最终酿成中央计划体制的瘫痪，直接导致了1990年苏联全面的食品短缺。对此，《华盛顿邮报》当时指出，苏联的粮食危机与其说是戈尔巴乔夫政府没钱从国外购粮，不如说是苏联管理体制的混乱所致。^①在民族政策方面，戈氏为了反对党内强硬派，采取以下逼上的手法，不仅给地方放权，甚至对民族分裂势力网开一面。1990年开放党禁后，戈氏甚至允许民族分裂政党、宗教政党合法注册。^②在这个意义上，戈氏的“重建”，其实是一个弱化以至破坏现存体制的过程。破旧而未立新，苏联体制气数已尽。

相比之下，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重建各级国家机制的渐进过程。此前十余年里，中国实行的是一个高度分散的机制，其结果是在改革开放之际，中国并没有一个类似苏联那样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对中国自身的经验教训、苏联体制和各种不同的选项，采取开放姿态，渐进改革，灵活务实，避免了长期的、全面的、战略性的重大政策失误；中国政体“立新”的速度和质量，远超改造、破除旧机制的进程。这也许是中苏两大转型社会的最大不同。

2004年，在参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后，戈尔巴乔夫对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没有一个邓小平”^③。戈尔巴乔夫此刻的心情肯定非常复杂。17年后，赵华胜的哲学观点更为尖锐：

① Evans Rowl, Robert Novak, “Gorbachev’s Choices...And A Soviet Food Crisi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23, 1990.

② 红色普鲁士：“不能简单认为苏联民族政策‘垃圾’”，观察者网，2021年5月29日，<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521844>

③ 李肇星：“戈尔巴乔夫：苏联解体因没有邓小平”，2014年1月23日，<https://m.sohu.com/n/556298355/>

苏联领导人治国无方，在操作层面犯有一系列致命错误，这是中央权力衰落的又一关键因素……联盟中央有许多拯救联盟的机会，即使是在联盟存在的最后半年，机会依然存在，但联盟中央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使它不能做出决断，失去了最后的机会。^①

戈尔巴乔夫在偶然与必然之间的选择，或无力做出任何有意义的选择，也许就是苏联的宿命。

三、冷战结束 vs. 苏联解体

30 年前，苏联解体，两极终结，西方精英弹冠相庆。西方政要在给戈尔巴乔夫 90 岁生日的贺电中，除了对戈氏泛泛的溢美之词外，绝口不提苏联解体问题。^②这种选择性的“失忆”，也许会淡化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个人色彩，但客观上模糊了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之间的界限。

苏联解体 30 年后，西方叙事中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已经步履蹒跚，难以以为继，西方自身在民粹主义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夹击下也已满目疮痍。甚至疫情以前，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连年征战和无休止的“人道”干涉，已经造就了大批失败国度，极端主义盛行，难民浪潮滚滚，极大地冲击着西方本身。而西方学界最热门的话题，竟是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③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体而导致的两极体制结束，并不是此前冷战的结束，而是此后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盛极而衰的开始。苏联解体这个“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其实并非西方有意为之，但它至今仍然影响着 21 世纪的地缘政治走向。

① Zhao Huasheng, “The ‘Non-Deep’ Caus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② “Joe Biden congratulates Mikhail Gorbachev on his 90th birthday”, Mar.2, 2021; “Former Soviet leader Mikhail Gorbachev celebrates his 90th birthday”, Mar.2, 2021.

③ 新冠前关于“自由国际秩序”终结的论述，参见 Robert Jervis, Francis Gavin, Joshua Rovner, eds., *Chaos in the Liberal Order: The Trump Presidenc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Richard Haass, *A World in Disarra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8; Barry Posen, “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Foreign Affairs*, 2018, Vol.97, No.2, pp.10-19;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2017, Vol.96, No.3, pp.1-7; Joseph Nye, “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Foreign Affairs*, 2017, Vol.96, No.1.

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更非价值判断，而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知，即冷战至少在苏联解体前五年（1987年）就已成为过去式。与此同时，美苏主导的两极体制依然存在，但两国政治精英之间已视对方为伙伴而非对手。数年后苏联解体，则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一）冷战结束的若干“拐点”

柏林墙倒塌数月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断言西方自由主义已经完胜任何其他对手，“在未来世界中，人们不再会为了某种纯粹的空泛目标而前赴后继；世界范围内可歌可泣的意识形态之争，将让位于经济核算、为解决技术问题而进行的无止境的努力，对环境的关爱，以及消费各类奇技淫巧所带来的满足”^①。

而苏联解体一年前，美国老布什总统也宣布“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已经降临：

这是一个新时代，世界将免于恐怖，人们将致力于公正，追求和平。在这个世界会让东西南北各国共同繁荣，和谐相处。千百年来，人类都在对虚无缥缈的和平孜孜以求，但却陷于无数征战和屠戮之中而无法自拔。此时此刻，一个新世界即将诞生，这将是一个极为不同的世界，她将是法制取代丛林规则的世界，各国将共同承担维护和平和正义的义务，强国会尊重弱者的权益……^②

这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都不以苏联解体为前提。二人所憧憬的新奇世界，恰恰是以苏联存在为基础的两极体制。英国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则认为，冷战在1986年10月11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和1987年12月7-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苏峰会上就结束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冰岛就全面销毁各自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达成共识，一年后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中导协议。^③一个更为安全和稳定的世界秩序已经成型。与此同时：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 No.16, p.18.

② George H.W. Bush,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Persian Gulf Crisis and the Federal Budget Deficit”, Sep.11, 1990, <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archives/public-papers/2217>

③ Eric J.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4, p.250.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期待或臆想苏联即将垮台，而苏联解体时美方毫无准备。尽管美方希望对苏联经济施压，但美国自己的情报机构却（错误地）认为苏联经济状况良好，可以支持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事实上，里根总统本人确实相信美苏应该在排除恐怖的核平衡条件下实现共存，而不管其撰稿人如何为他的演讲稿字斟句酌，也不管他那并非聪明睿智的头脑中如何作想。里根所梦寐以求的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在那个离北极不远的冰岛，正值阴冷的深秋季节，里根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一拍即合。^①

显而易见，美国所关注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和能够威胁美国的苏联核战略，为达此目的，美国期待一个相对无害的两极体制，并不指望改变苏联国家机制的性质或弱化其执政能力，更没有寻求单极世界的奢望。

（二）两极的诱惑

里根理想中的无核世界，其实是对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确保相互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核战略出于本能的反感。在两极体制中，核武器成为国际秩序的“稳定器”，经历了最初的核垄断到后来的核均衡的过程。霍布斯鲍姆认为，美国在广岛投掷第一枚核弹 4 年之后（1949 年），苏联成功引爆了第一颗核弹；1952 年 11 月美国首颗氢弹试爆 9 个月 after，苏联也成功引爆了第一颗氢弹。“至此，美苏双方都放弃了以战争方式应对对方的政策，因为那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②

其实，对两极体制诸多“优越性”的洞察更为超前的，是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至少在美苏冰岛峰会前半年，加迪斯就在美国《国际安全》期刊发表了著名的“长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一文，认为冷战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稳固的国际体系：“冷战纵然有相互竞争、令人焦虑和无可置疑的危险，然而大国关系却保持了 20 世纪最长久的稳定。即便与近代史上最为长久稳定的大国关系相比也毫不逊色。”^③在加迪斯看来，冷战时期的世界并非太平无事，但经过早期的磨合之后，美苏双方在冷战后

① Eric J.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p.249.

② Ibid, p.229.

③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6, Vol.10, No.4, pp.99-142.

期（20 世纪 60-70 年代）逐步建立了若干隐性的“规则”，包括默认彼此的势力范围，容忍对方一些并非友善的行为，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在对方领导层危难时期不落井下石等。对于最后一点，加迪斯着重指出，美苏双方在冷战期间从未公开质疑对方领导人的合法性。^①

加迪斯认为，在诸多因素中，美苏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后逐步确认的“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武器原则，以及一系列的军控、监察机制，在两极体制中促成了美苏间“相对安全观”的建立，排除了单方面追求绝对安全的可能，因为一方的绝对安全意味着另一方的绝对不安全。^②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没有戈尔巴乔夫与里根达成的中导协议，美苏主导的两极世界已经实现了相对均势。不仅如此：

两极体制的稳定确实需要双方审慎、成熟，并富有责任感。……双方都认识到竞争是国与国关系中的正常现象……这首先需要意识到安全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即一国之安全不仅取决于为自身安全所采取的措施，而且要顾及这些措施是否会对对方造成不安全感。^③

与 20 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规模的热战相比，冷战确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但作为“长和平”的冷战并非歌舞升平，美苏双方从未停止过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层面的对峙和竞争。笔者在此仅仅强调冷战也许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国际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苏即使不喜欢彼此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但至少会为了保全自身而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

（三）不对称的共存之道

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综合国力一直远低于美国。二战结束，美国经济和国力傲视全球。虽然美国经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严重下滑，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被迫放弃金本位，但美国的西欧和日本盟友经济复苏和起飞，大大加强了西方的整体实力。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在冷战时期获得相对安全的环境，是在美苏间综合实力非常不对称的情况下取得的相当不错的结果。不可否认，核武器是两极体制中最为重要的平衡器，然而西方尤其是美国精英对苏联的观念也有相当程度的变化，其拐点是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①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pp.129-133.

② Ibid, pp.120-125.

③ Ibid, p.140.

危机对双方震撼极大。危机持续的 13 天时间里（1962 年 10 月 16 日-28 日），美苏两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动用核武器，美国总统肯尼迪面临的不仅仅是令人捉摸不定的赫鲁晓夫，而且还有美国国内强大的军工集团和鹰派人士。不得已，肯尼迪绕过美国的军政情机构，通过非正式渠道与苏联高层直接沟通，最终化险为夷。导弹危机后数月，美苏立即着手建立“热线”，以及时沟通，防止误判，便于预防和管控危机。1963 年 8 月，美英苏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后续一系列军控协议开辟了新径。

然而更重要的是理念的变化。1963 年 6 月，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和平演讲”，提出要寻求“一个不是由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给世界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而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一种使地球上的生活有价值的和平，一种使人民和国家能够成长、充满希望并且为其子女建立更美好生活的和平——不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且是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和平，不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且是永远的和平”^①。

即使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肯尼迪这段发自肺腑的文字仍然令人心动。受到震动的也包括竭力反对肯尼迪政府对苏“妥协”的极右派和鹰派。肯尼迪数月后被刺身亡，极右派和军工集团难辞其咎。^②肯尼迪之后，尼克松和卡特政府先后与苏联达成了若干军控协议，美苏两国基本实现战略稳定。

决策界之外，美国学界对苏联也相当“客气”，20 世纪 70 年代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 或 neorealism）认为，两极体制是最为稳定的国际秩序，从理论上论证了苏联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的合理合法地位。^③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学界对苏联的研究和关注也趋向“正常化”，至少部分实现了去意识形态化。^④

相比之下，在中国崛起的 21 世纪，美国流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① John F. Kennedy, “American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Address”, Jun.10, 1963, <https://www.americanrhetoric.com/speeches/jfkamericanuniversityaddress.html>

② Jeffrey Sachs, “Donald Trump’s dangerous China illusions”, *Boston Globe*, Feb.5, 2017, <https://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7/02/05/trump-dangerous-china-illusions/51H7yrI9vTE3PSmXDJD13M/story.html>

③ 参见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9.

④ 于滨：“西方苏联学的内核与外延”，《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167-196 页。

(offensive realism)，基本上排除了国际秩序和平转型的可能。政治学和中国研究中，“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垮台论”持久不衰。^①在政策层面，美方一直拒绝接受与中国的平等关系，拜登在就任后第一个外交政策演说中就信誓旦旦地宣称，在他任内中国别想超过美国。^②

同为共产主义大国，美苏当年携手在两极体制下结束了冷战，如今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崛起而重启冷战。戈尔巴乔夫治下甚至戈氏以前的苏联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其实相当友善。按照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凯润·斯金纳(Kiron Skinner)的说法，冷战期间与苏联的竞争不过是“西方家族的内部之争”，而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之间的斗争，“这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③

冷战作为“西方家族的内部之争”已经在1987年结束，二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成为事实上的“长和平”，而美国与“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即中国）的“文明”（即种族）之争却是无解的。^④

（四）战略欺骗与北约东扩

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死结，从1999到2008十年间，北约东扩三次，先后将东欧九国和波罗的海三国纳入北约体系，^⑤对俄罗斯安全利益构成极大威胁。对此，俄罗斯一直坚持北约东扩违反了西方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的“君子协定”。^⑥然而，即便是在西方内部，关于

① 参见 Chengxin Pan, “The ‘China Threat’ in American Self-Imaginatio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Other as Power Politics”,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2004, Vol.29, No.3, pp.305-331; Chengxin Pan, *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15.

② Jarrett Renshaw, Andrea Shalal, Michael Martina, “Biden says China won't surpass U.S. as global leader on his watch”, *Reuters*, Mar.25, 2021.

③ Joel Gehrke, “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Examiner*, April 30, 2019. 2019年8月初，斯金纳因“虐待下属”被解职。Joel Gehrke, “Mike Pompeo fires top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accused of abusing staff”, *Washington Examiner*, Aug.2, 2019.

④ 关于美国对俄对华政策中的“种族”因素，参见于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俄温差’”，《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5期，第89-106页。

⑤ 1999年3月，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加入北约；2004年3月，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七国加入北约；2008年4月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加入北约。

⑥ Mike Eckel, “Did The West Promise Moscow That NATO Would Not Expand? Well, It's Complicated”, *Radio Free Europe*, May 19, 2021.

北约东扩的起因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部分人认为，西方确实曾向苏联领导人保证过北约不会东扩。^①而另一部分人则坚称，当年美国和西方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从未涉及北约东扩问题。^②

近来，“否认派”中有人“反戈一击”，承认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至少两次得到美方口头保证。美国资深俄罗斯问题专家詹姆斯·哥特杰尔（James Goldgeier）2019年末发文说，美国的第一次保证是在1990年2月，当时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亲口对戈尔巴乔夫说：“北约不会令其军队向东移动一寸。”^③贝克也同意戈尔巴乔夫“北约的任何扩展均不可接受”的说法。此前，西德外长根舍也宣布：“北约需要做的是明白无误地宣布，不管华约有任何变动，北约绝对不会东扩，就是说，不会逼近苏联边境。”^④1993年10月，美方做出第二次保证。当时克林顿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在莫斯科对叶利钦说，美国不会支持新成员加入北约，而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前华约国家的“和平伙伴”机制。然而一年后，叶利钦发现北约扩员已箭在弦上，不禁勃然大怒。对于上述历史，哥特杰尔不持异议。但又笔锋一转，认为美方既然赢得了冷战，便可从实力出发，为了自身利益而改弦更张；通过北约东扩，为中东欧这一历史上动荡不安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无可厚非。^⑤

① Michael MccGwire, “NATO Expansion: ‘A Policy Error of Historic Import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8, Vol.24, No.1, p.26; Mary Elise Sarotte, “Not One Inch Eastward? Bush, Baker, Kohl, Genscher, Gorbachev, and the Origin of Russian Resentment toward NATO Enlargement in February 1990”, *Diplomatic History*, 2010, Vol.34, No.1, pp. 119-140; Mary Elise Sarotte, *1989: The Struggle to Create Post-Cold War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19-229; Thomas Blanton, “U.S. Policy and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in Svetlana Savranskaya, Thomas Blanton, and Vladimir Zubok, eds., *Masterpieces of History: The Peaceful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astern Europe, 1989*,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93-95; Alexander Von Pla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ush, Kohl, Gorbachev, and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trans. Edith Burl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184.

② Mark Kramer, “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9, Vol.32, No.2, p.41; Mary Elise Sarotte, “A Broken Promise? What the West Really Told Moscow about NATO Expansion”, *Foreign Affairs*, 2014, Vol.93, No.5, p.96; Mark Kramer, Mary Elise Sarotte, “Letters to the Editor: No Such Promise”, *Foreign Affairs*, 2014, Vol.93, No.6, p.208.

③ Jim Goldgeier, “Promises Made, Promises Broken? What Yeltsin Was Told about NATO in 1993 and Why It Matters”, *War on Rocks*, Nov.22, 2019.

④ Ibid.

⑤ Ibid.

哥特杰尔“美国赢得冷战”的说法，至少混淆了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和时间点（冷战至少在苏联解体前5年就结束了）。尽管如此，此种非历史和反历史的说辞在美国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不容置疑的标准叙事。甚至一向慎于言辞的老布什在1992年大选时，也以“赢得冷战”为竞选口号。对此，美国的“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予以驳斥：

如果任何一届政府宣称，它可以对地球另一面的一个大国内部的混乱不堪施以决定性的影响，那一定是十分幼稚的……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个人“赢得”了冷战。^①

不仅如此，凯南还强烈批评北约的首轮东扩，称之为“美国外交在后冷战时期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the most fateful error）。它会对“俄罗斯舆情中的民族主义、反西方倾向和尚武情结火上浇油，不但无助于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还恢复了东西方之间的敌对气氛，驱使俄罗斯外交与我们的意愿背道而驰。”^②凯南其实一直强烈批评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和高度军事化的冷战外交，也因此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③

哥特杰尔的“美国赢得冷理论”，其实是一个对北约东扩的结果加以“合理化”解说的“马后炮”，但还是赤裸裸地展现了美方的战略欺骗手段。贝克1990年2月对戈尔巴乔夫的“北约不会令其军队向东移动一寸”的保证，离东德退出华约还有8个月，距华约正式解散还有15个月。如何说服苏联领导层支持两德统一，自废武功（解散华约），贝克必须有所表示，又避免留下字据，因此口头保证最为合适。按照哥特杰尔的说法，北约真正东扩时，苏联已经解体，其继承者俄罗斯本身自顾不暇；当年的决策人亦都已离职，他们之间的口头保证也就不了了之，北约东扩由美国说了算。

戈尔巴乔夫对北约东扩的态度并非前后一致。2014年10月他对俄《生意人报》说，从未与任何西方政要讨论过北约东扩问题。^④在2021年5月21日接受德国《图片报》的访谈时又换了说法：“从那以后发生的许多事

① George Kennan, “The GOP Won the Cold War? Ridiculous”, *New York Times*, Oct.28, 1992.

② George Kennan, “A Fateful Error”, *New York Times*, Feb.5, 1997.

③ 参见于滨：“被误读的冷战与乔治·凯南？”观察者网，2020年8月24日。

④ Mike Eckel, “Did the West Promise Moscow That NATO Would Not Expand? Well, It’s Complicated”, *Radio Free Europe*, May 19, 2021.

情都与苏联解体有关……西方很多人都难掩内心的喜悦，这其中包括当初对我们保证‘北约不会令其军队向东移动一寸’的人。”^①直到耄耋之年，戈氏才认识到，苏联解体为北约东扩排除了最后一道障碍，然而为时晚矣。

四、苏联之后，一个解体的世界？

2021年夏，有两个不寻常的历史性纪念日。一个是中共建党百年（1921年7月1日），另一个是苏联解体30周年（1991年8月24日叶利钦发布禁共令）。苏共与中共历史命运如此不同，令人感慨和深思。一个超级强国，面对一个不乏善意的外部世界，却在一个满怀理想、立志改革却又过分天真的少壮派领导人手中快速滑向历史终点。

然而30年前的苏联解体，两极体制终结，至少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国际体制层面的两个变化。一是“终结历史”的“自由国际秩序”本身也盛极而衰。苏联解体后，西方失去外部制衡力量，进入“为所欲为”(realms of choice)的时代。^②从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科索沃战争，到21世纪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战争，以及从未停止的“反恐”战争，^③西方自由干涉主义在世界范围穷兵黩武，造就了大批“失败国家”，无数难民，以及无法根除的恐怖主义，最终祸及西方本身。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新自由主义“无为”更无治，贫富差距陡增，精英群体堕落，最终使反体制的民粹主义异军突起，席卷西方各国。美国/西方也许赢得了冷战，却失去了和平，更要丢失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体与LIO“终结”似有不解之缘。

第二个国际体制的变化是重回大国竞争。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式微，不会以历史再次“终结”而寿终正寝，而是以美国/西方与中俄两大国重新为敌而启幕。不无讽刺的是，在苏联解体之际，西方与中苏两国均关系颇佳，如今却自我放纵为激烈竞争、甚至敌对关系。戈尔巴乔夫90岁生日后，97

① Kai Diekmann, “Interview with Mikhail Gorbachev—the last President of the Soviet Union—Are we facing a new cold war, Mr. Gorbachev?” *Bild*, May 21, 2021.

② Stephen Brooks, William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2002, Vol.81, No.4, pp.20-33.

③ Max Boot, “America Still Needs Counterinsurgency: The ‘Forever Wars’ Are Ending, But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ts and Guerrillas Will Go On”, *Foreign Affairs*, June 2, 2021.

岁的基辛格五周内三次警告说，除非中美之间相互理解并实现共存，一个充斥核武器并为人工智能所支配的世界，将面临类似一次大战的灭顶之灾。^①

90 岁的戈尔巴乔夫仍在为西方的战略欺骗和帝国崩塌而耿耿于怀，比他年长 7 岁的基辛格却已经感受到世界末日的凶兆。然而两位当年叱咤国际风云的老者所面对的，是仍在梦想旧冷战的荣光、又对新冷战踌躇满志的同一批精英群体。西方的浅薄、贪婪和危险就在于此。

【Abstract】 Thirty years after it happened, the specter of the Soviet collapse is still haunting the Eurasian landmass in various ways and to different degre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the “biggest geopolitical disaster of the 20th centur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individual (Gorbachev), the state (Soviet Un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s the last leader of the Soviet Union, Gorbachev played a major role in ending the Cold War system. The subsequent paralysis and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ystem, however, was not his original intention nor was expected by the West. In contrast to Gorbachev’s radical and naive reform measures in the face of the highly centralized planning system of the Soviet Union, China has been exploring and optimizing different mechanisms between the ruling party, state institutions, and society. With an open mind, China’s incremental reform means flexibility and pragmatism. As a result,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the system renovation have far exceeded the pace of phasing out old components. A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evel, the unipolar world following the Soviet collapse did not “end” history but started the process of the primacy and weakening of the so-called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LIO). With the historical ascendance of China, a new round of geostrategic game between great powers is unfolding.

【Key Words】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ternational Order,

^① “The future of liberal democracies: In conversation with Henry Kissinger”, Chatham House, Mar.25, 2021; Mathias Döpfner, “Interview: Henry Kissinger o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pandemic,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Business Insider*, Apr.25, 2021; Jon Jackson, “Henry Kissinger Warns Against All-Out, High-Tech Battle with China, Urges US to Ramp Up Its AI”, Apr.30, 2021, <https://www.newsweek.com/kissinger-hi-tech-conflict-china-1587838>

Russia-U.S.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Аннотация】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30 лет назад по-прежнему различными способами, в большей или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косвенно или напрямую влияет на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нервы.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делается попытка изучить случайность и неизбежность «крупнейше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атастрофы 20-го века» с трёх измерений: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Горбачё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а также оценить взлёты и пад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Будучи последним лидеро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Горбачёв был в основном ответственен за конец систем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 распад империи, что напрямую привело к параличу и распаду совет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Хотя это и не было намерением Горбачёва, эти события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евзошли запад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радикальными и наивными реформаторскими мерами, предпринятыми Горбачёвым перед лицом высококонцентрированной системы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итай постоянно изучает и оптимизирует различные механизмы и варианты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правящей партие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институтами и обществом; при непредвзятом подходе постепенное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означает гибкость и прагматиз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скорость и качество «инноваций» системы намного превосходят процесс разрушения старого механизма.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уровне однополярный мир, возникший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е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истории, а положил начало процессу расцвета и упадка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либеральн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Перед лиц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одъёма Китая начал вырисовываться новый раунд игры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Западом

(责任编辑 宋羽竹)

论俄罗斯的宪法改革*

庞大鹏**

【内容提要】 宪法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的宪法改革及由此引发的政治运行机制的调整变化,是在俄罗斯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内生演化的结果。从宪法改革的时代背景看,此次宪法改革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当代俄罗斯领导人对于宪法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认识明确,宪法改革的基本原则一以贯之。普京政权提前布局,稳步推进,最终确保宪法改革平稳落地,俄罗斯社会总体保持稳定。从宪法改革的基本内容看,涉及俄罗斯国家政权的组织体系、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安全体系的调整。此次宪法改革是对普京 20 年执政经验的总结,是将普京行之有效的治国举措以法律语言的形式,进行理论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结果,标志着俄罗斯宪法从叶利钦时代过渡到普京时代。新冠肺炎疫情是宪法改革的刺激性影响因素,政治聚集效应明显。宪法改革引发俄罗斯内政外交的联动性明显,并将对俄罗斯的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俄罗斯宪法改革 俄罗斯政治体系 叶利钦时代 普京时代

【中图分类号】D7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3-0073(33)

* 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建议。

** 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引言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2020年俄罗斯的宪法改革将长久影响俄罗斯的制度建设与国家发展。2020年宪法改革后新诞生的宪法文本^①具有鲜明的普京特色。2020年宪法改革前，俄罗斯现行宪法于1993年经全民公决通过，也被称为“叶利钦宪法”。1993年宪法自诞生之日起，围绕着国家权力结构等问题就存在争议。从叶利钦时代到普京时期，俄罗斯政坛不断有呼吁宪法改革的声音。事实上，虽然在2020年宪法改革前，俄罗斯已对1993年宪法进行了16次修改，但是宪法的基本框架与核心内容保持不变。在这16次修改中，大部分是对第三章《联邦体制》下第六十五条的微调，即联邦主体的名称变化。这与普京时期合并联邦主体、克里米亚回归等事件有关。具有一定实质政治效应的修改是在2008年和2014年。2008年，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建议延长总统和杜马任期。经过宪法修改程序，俄罗斯总统和国家杜马代表的任期从4年分别延长至6年和5年。2014年，普京提议合并俄罗斯最高法院和最高仲裁法院，对宪法第七章《司法权》进行了相应调整。此外，普京提议对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的组成方式进行微调，俄罗斯总统可以任命不超过10%的联邦委员会成员，因此对第五章《联邦会议》也作了相应修改。相比较此前宪法调整的波澜不惊，2020年的宪法改革则是对1993年宪法的大规模修订。2020年宪法改革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全面性。俄罗斯宪法确立了俄罗斯国家基本制度，涉及俄罗斯的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基本制度事关俄罗斯国家治理和转型发展，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大意义。2020年宪法改革对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安全体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修订。这次修订不是像2008年和2014年那样对具体某一环节的技术修改，而是对国家基本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全面调整，涉及国家治理领域之广前所未有，包括政治、民族、文化、社会、外交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环环相扣，形成了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① Новый текст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РФ с поправками 2020. 3 июля 2020 г. <http://duma.gov.ru/news/48953/>

体现了普京执政20年来对于俄罗斯国家治理认识的主要成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2020年修订后的现行宪法具有鲜明的“普京特色”。

第二，平衡性。普京善于在必要与可能之间寻找黄金分割点。俄罗斯没有在普京前八年国家治理有声有色、政治声望高峰的时候进行宪法改革，也没有在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新时期、克里米亚事件后民意顶峰的时候进行调整，而是选择在2018年普京第四任期高开低走的敏感阶段改革。这实际上体现了普京对俄罗斯政治时空的统筹把握，也是对俄罗斯与世界政治联动关系的综合评估，是内外兼顾、全面衡量后的稳妥选择，是一种政治平衡感的表现。普京从提高议会地位和职能的政治提议入手，直面政坛关注的热点，引导社会和舆论关注国家权力结构的制衡问题，为宪法改革奠定了适宜的政治氛围。与此同时，又在总统核心权力建设这一俄罗斯最大的政治问题上沉稳布局，取得了与其执政以来历次政治改革同样的政治效果：形式上的竞争性，实质上的控制性。从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来看，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平衡的表现。

第三，统一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普京执政以来对俄罗斯国家治理内在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和统一的过程。总统权力高度的集中统一、联邦运行机制的事实单一、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形成了普京国家治理体系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性也是一种对立统一，俄罗斯政治资源的高度统一与俄罗斯政治组织体系设计中三权分立的制衡性、联邦制度的分权性等都形成事实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从根本上看，是俄罗斯制度文化传统与制度程序设计之间的错位。俄罗斯解决这种错位靠的是对政治运行机制的调整和重塑，国家基本制度维持不变，国家治理模式和制度运行机制适时调整，以不断贴合形势的变化。虽然在政治实践中容易解决这种错位，但是从宪法文本看就无法避免这种矛盾性了。这次宪法改革的一些举措是否与宪法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原则要求相一致，值得商榷。当然，对于国家发展而言，政治家追求政权稳固，至于文本是否实现了内在一致性，并不是俄罗斯此次宪法改革考虑的重点。总之，俄罗斯的宪法改革及由此引发的政治运行机制的调整变化，都是在俄罗斯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

二、宪法改革的时代背景

政局相对稳定，是1993年12月叶利钦时代宪法通过以来俄罗斯政治的基本特性。一方面，俄罗斯政坛错综复杂，有时还爆发激烈的政治抗议风潮；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宪法犹如定海神针，将政治斗争的范围限定在了宪法框架内，妥协与合作是俄罗斯政治派别之间以及国家权力机构之间关系的常态，有序和可控成为俄罗斯政治的基本特点。

以叶利钦时代为例，此一时期，国家杜马中的反对派经常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1996年总统大选后，俄共等议会党团还发起了弹劾总统的动议。1996年12月，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提出了修改宪法的议案，认为宪法破坏了各权力机关的平衡，执行权力机关必须受立法权力机关的监督，应恢复立法权力机关的纵向系统。虽然如此，主要的政治力量和三种权力机关仍能够就重要的政治问题达成协议，政治活动也都是在宪法框架内进行的，没有再现双重政权、府院对立、流血冲突等政治局面。俄罗斯宪法确立的制度体制自身的发展逻辑，开始发挥显著作用。俄罗斯精英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及由此引发的稳定状态的变化，也受到了宪法的派生性法律即相应领域的宪法性法律的有效约束。1996年12月，叶利钦总统在庆祝宪法日时发表了告俄罗斯公民书，他认为：俄罗斯有效的立法工作正在形成之中，因为有了宪法，建立了政权框架的轮廓，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使俄罗斯的发展第一次建立在牢固的人权和自由的基础之上；随着社会的前进，俄罗斯宪法的作用正在展现出来，并将继续展现出来；俄罗斯宪法制度经受住了社会生活的检验，就连批评宪法和反对宪法的人都承认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这是俄罗斯国家变革不可逆转的稳固保障，是俄罗斯走上了一条使全体人民达到和睦之正确道路的最重要标志。

总体来说，从宪法改革的时代背景看，俄罗斯的宪法改革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普京在1999年12月发表的纲领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曾经提到：修改宪法并不是刻不容缓和首要的任务，俄罗斯已经拥有一部真正的好宪法；这部宪法中关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章节被认为是世界上同类宪法法律

中最好的；重要任务不在于制定一部新的国家基本法，而在于使履行现行宪法及在其基础上通过的法律成为国家、社会及个人的生活准则。^①普京是基于当时俄罗斯的内外形势而做出的这个判断。实际上，1993年叶利钦时代制定、通过的宪法从一出台就存在巨大争议，毁誉参半。在叶利钦时代，每次国家杜马和总统大选的日期越临近，修改基本法的呼声就越高涨。但对所提出修改意见的分析表明，与其说是具有法律性质，不如说是政治动议，所提出的实际上是对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看法。

一方面，俄罗斯领导人对1993年宪法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叶利钦在1995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肯定地指出：俄罗斯没有把宪法变成政治斗争的对象，开始养成新的政治传统，总统、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和政府之间的协作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俄罗斯社会没有走向政治极端主义的道路，国家主要的政治力量及其领导人放弃了极端主义口号，主张合法与和平的政治斗争。^②在1996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叶利钦进一步指出：1993年12月宪法的通过，为新俄罗斯国体奠定了法律基础；新的俄罗斯国家大厦已基本建成，可以转向下一阶段装修作业了，而且要考虑如何在大厦里生活了。1993年宪法通过后，叶利钦认为，虽然国家建设过程永远不可能结束，但民主的俄罗斯已经形成，俄罗斯离开了经济崩溃的边缘，避免了混乱和民族战争，已经开始建立符合现代文明社会各种主要标准的政治体制：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活动类型的多样性，权力划分，多党制及新闻出版自由，正在建立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建立联邦关系，恢复地方自治。^③

1997年3月，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指出，1993年宪法通过后，俄罗斯的国家政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俄罗斯首次拥有了人民公开和自由通过的宪法；这部宪法实现了加强总统制的原则，成为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 декабря 1999 г. https://www.ng.ru/politics/1999-12-30/4_millennium.html

② О действен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7 февраля 1995 г.

③ Россия, за которую мы в ответе.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4 февраля 1996 г.

一原则既符合社会的需要，也符合俄罗斯过渡时期的现实状况；宪法限制了当局压制社会的可能性，成为公民捍卫自身权益的实际工具；在改变宪法之前，要先学会尊重它，学会按照宪法生活，充分发挥宪法的潜力。^①

2008年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也指出，正是1993年宪法把自由和公正、人的尊严和富足安康、保护家庭和祖国以及多民族人民的团结，作为公认的价值观和法律概念确定下来；也就是说，宪法使它们有了实践力，并动用国家全部资源和基本法本身的全部权威来支持它们，社会制度和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也由此形成；俄罗斯的基本生活准则以及俄罗斯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是由俄罗斯宪法确定的，并直接影响着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②

另一方面，俄罗斯领导人对1993年宪法存在的弊端也直言不讳。1994年2月，叶利钦在当代俄罗斯第一份总统国情咨文中强调，由1993年宪法确立的新的国家政权体制符合民主标准，以通过的宪法为基础，继续进行分阶段的宪法改革，这是一个经过检验的合乎规律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应当急于求成，也不能只顾眼前的政治利益。叶利钦认为宪法原则与现实脱节的一个原因在于，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国家机关中，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与反对派之间仍在暗中相斗；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放弃了发号施令式的统治方式，但尚未完全掌握按法律办事的原则。叶利钦正式提出了俄罗斯要建立法治国家的提议。^③

叶利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央地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叶利钦认为，1993年宪法的通过开辟了一片极其重要的立法天地——联邦主体的法律文件，但是缺乏同联邦国家级别文件的协调。同时，联邦会议和中央的立法力量在制定示范性立法文件方面，对地方的帮助不够。地方立法工作的混乱和不协调，可能把现实的联邦制度在法律方面构建的框架化为乌有。同时，需要不断完善立法才能在地方法律中体现俄罗斯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保障

① Порядок во власти, порядок в стране.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7 марта 1997 г.

②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5 ноября 2008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1968>

③ Об укрепле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5 февраля 1994 г.

法律空间的统一，保障俄罗斯整个版图内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使地方标准文件和宪法相符；如果不能有成效地协调，政府所做的大量工作就会落空。^①

在1997年国情咨文中叶利钦进一步指出：归联邦中央和俄罗斯联邦主体共同管辖的事务在法律上界限不清、它们各自权限内的财政和资金基础不明确，造成各级做出的决定所带来的政治经济问题责任不明，其结果是国家统一的法律空间受到破坏，联邦权力机关和联邦各主体权力机关的工作效率下降，已经酝酿成熟的社会经济改革停滞不前，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恶化；保护全俄罗斯的法律空间、实行统一的法律空间，并不意味着在国家全境内形式完全一样，这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更是不符合宪法的；联邦主体、各地都应当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民族、自然和其他特点解决各自存在的众多问题，但如果没有统一一致的生活准则，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国家，俄罗斯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法律空间。^②普京执政后，通过一系列调整举措，终于完成了叶利钦念兹在兹的全俄统一法律空间问题。普京在2003年国情咨文中指出，过去俄罗斯一些地区实际上不受联邦法律的制约，现在消除了这种绝对无法接受的局面；对于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地区来说，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的至高无上已成为生活的准则。^③

1998年12月，叶利钦在俄罗斯宪法日发表讲话，认为修改宪法改变总统制对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地域广阔的俄罗斯永远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否则将无法解决那些摆在俄罗斯面前的尖锐问题，宪法不仅可以确保国家的稳定，还能摆脱政治危机。1999年3月，在叶利钦时代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叶利钦全面分析了宪法与俄罗斯社会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叶利钦认为，评价议会工作的主要标准是立法工作的质量和通过法律的及时程度；不仅必须认真地评价法律文本，而且还必须认真地评价执行权力机关的具体决定是否符合宪法基本原则；经济方针的调整和经济改造，应当严格在现行宪法规定的范围进行，不应越过宪法制度的基础。那些改变现行经济制

① Россия, за которую мы в ответе. 24 февраля 1996 г.

② Порядок во власти, порядок в стране.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7 марта 1997 г.

③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6 мая 200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1998>

度、取消改革、破坏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做法，实际上威胁到了国家体制，需要加以坚决制止。叶利钦尤其反对关于立法权力机关的权限再分配的提法。叶利钦认为，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家杜马的权限已经相当大，它拥有影响国家政治局势的大量杠杆和手段：从对政府表示不信任，到弹劾俄罗斯总统。国家杜马主席从其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实际能力来看，丝毫不亚于政府总理。叶利钦指出，所有参政的政治家都十分清楚，议员席位在某种意义上比部长职位可靠得多，因此，任何关于俄罗斯总统制几乎是纯粹君主政体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同时，叶利钦表示，宪法也可以修改，但在讨论对现行宪法的任何具体修改意见之前，必须进行广泛的磋商，对修改意见的合理性进行社会讨论；不应当纵容各种政治团体提出完全相反的要求，而应当在生活、社会和政治实践本身所反映的问题中找到妥协的地方，否则就无法避免被指责在权力机关之间搞交易。此外，不管是立法者，还是总统，在任期接近尾声时，不能向其继承者强加一些他们很有可能难以遵守的游戏规则；俄罗斯总统不能给其继承者遗留这样的宪法，即他的权限发生很大的变化，以至于他不能起到宪法保障的作用，不能起到三权分立原则的保障乃至国家政治稳定的保障的作用。^①

叶利钦时代实际上给普京执政之路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是，叶利钦提到，在1993年宪法的基础上加强权力机关的作用，是俄罗斯走向强国之道的必由之路。叶利钦提出：如经验所表明的，正是各权力机关行动不协调，有时则是直接对抗，成为建立强国及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正是由于缺乏和睦，执行权力机关和立法权力机关长期对立，导致无法持续推进改革。从一开始，它们就是在严重的政治对立和在否定既定改革战略的反对派的压力之下诞生的；许多决议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现实。这些原因导致战术错误屡屡出现，加剧了对居民和经济所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不恢复社会对国家的信任，就不可能解决加强权力机关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信任目前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破坏。这种局面不仅影响到国家的社会政治气氛，而且带来了非常不良的经

^①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эпох.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31 марта 1999 г.

济后果。叶利钦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普京的俄罗斯新思想以及强国战略的主要理念来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普京执政之初的治理方向：把整顿政权体系、统一全俄法律空间而不是把修宪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①

梅德韦杰夫在 2008 年宪法修改中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扩大联邦会议的宪法权力，把对执行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第 103 条）交给国家杜马，制定宪法条例，以使俄罗斯政府每年就其工作成果和议会直接提出的问题向国家杜马报告工作。第二，把总统和国家杜马的宪法权力期限分别延长到 6 年和 5 年。梅德韦杰夫强调，这不是宪法改革，而是修改宪法，不触及现行体制的政治和法律本质，这种修改将会为现行体制稳定发挥作用提供更多的必要资源。因此，对基本法的改革执念绝对不妥，俄罗斯宪法是有效的，它在发挥作用，它的基本条款在今后许多年里都是不可动摇的。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国家的主权、国家制度、联邦体制、司法机构的组织原则和地方自治原则以及宪法制度的其他基础，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不变。宪法提出的目标、价值观和机制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帮助俄罗斯社会克服了困难并走上了稳定的发展之路，俄罗斯将会继续最大限度地运用基本法的潜力。重要的是尽一切必要的努力来帮助人们展现自己，特别是要为有才能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开辟道路。年轻人是民主的新俄罗斯的同龄人。俄罗斯的开放性、自由精神和对一切先进事物的追求都表现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将负有保持俄罗斯基本价值观的责任。人的自由发展及其社会保障将永远是国家政策的重点，是俄罗斯主要关心的事情和社会的发展目标。^②

2013 年 12 月 12 日，普京在俄罗斯宪法日当天发表国情咨文表示，1993 年宪法已历时 20 年，宪法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至高无上与国家强大这两个基本要点结合在一起，强调彼此的责任，彼此尊重和彼此捍卫。宪法构架应当是稳定的。然而生活不是静止不动的，不能把宪法进程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当然可以对宪法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这是法律实践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有时是必要的。

总之，当代俄罗斯领导人对于宪法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有着清

①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эпох.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②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5 ноября 2008 г.

醒的政治判断，既坚持原则，又伺机而动。普京执政20年之际，俄罗斯宪法改革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2020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详细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没有必要制定新宪法；第二，为什么有必要对1993年宪法做出修正；第三，宪法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什么；第四，宪法改革的建议内容是什么。

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坦承他常常被问到修宪的问题。对于宪法为什么必须修改，俄罗斯很多政治精英认为，1993年宪法是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前通过的，那时俄罗斯正在经历深重的政治危机，自那以后，情况已彻底改变。对此普京表示同意。普京认为，如今莫斯科没有武装冲突，北高加索也没有国际恐怖主义策源地。虽然俄罗斯今天存在一系列悬而未决、相当尖锐的问题，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形势保持稳定，因此没有必要制定新宪法。1993年宪法的潜力远未耗尽，希望宪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人权与自由在未来好几十年里仍会是俄罗斯社会牢固的价值基础。

与此同时，关于宪法改革的话题已经提出。普京认为，宪法改革有充分依据，对俄罗斯作为法制社会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十分重要，在这样的社会中，公民自由和权益、人的尊严和福祉是最高价值观。普京表示，的确到了对国家基本法做出一些修改的时候了，以直接保证俄罗斯宪法在俄罗斯法律空间的优先性。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有着广袤的领土、复杂的民族区域构成和多样的历史文化传统，普京强调，在议会共和制下，俄罗斯无法正常发展，说得更严重些，无法稳定生存。俄罗斯应继续成为强总统制共和国。俄罗斯应建立牢固、可靠、难以攻破、从外部看绝对稳定、保证俄罗斯独立和主权的体系。同时，这种体系内部是充满活力的、灵活的，能够针对世界上和俄罗斯周边发生的突发事件以及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随机应变。这种体系还应确保当政者或其他领域处于高位者可以被替换。这样的革新是社会进步和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关于宪法改革的内容，普京建议赋予国家杜马确定政府总理候选人、并批准经其提名的所有副总理和联邦部长的权力，总统无权否决议会批准的相关职务人选；保证俄罗斯宪法的优先性；在宪法层面规定对担任要职官员的

国籍、居住年限等硬性要求。^①

2020年宪法改革过程体现出俄罗斯执政阶层严密的政治设计。宪法改革是俄罗斯内政的核心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普京政权提前布局，稳步推进，最终确保宪法改革平稳落地，俄罗斯社会总体保持稳定。2020年1月普京提出宪法改革，两个月后俄罗斯立法机构即完成了宪法修正的所有法律程序。原定4月22日举行对宪法修正案的全民信任投票，因疫情而推迟至7月1日举行。7月3日，根据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宪法修正案全俄投票率为67.97%，支持率为77.92%。^②总体投票率和支持率不仅远超1993年12月12日举行的宪法全民公投54.8%的投票率和58.43%的支持率，也高于2018年总统大选67.5%的投票率和普京76.69%的支持率。77.92%是俄罗斯全民投票历史上最高的支持率。

从宪法改革进程看，宪法改革体现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性。2020年1月15日，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宣布进行宪法改革。^③1月20日，普京向国家杜马提交了《关于完善和调整公共权力机构个别问题的宪法修改草案》。这显示了宪法改革的紧迫性。实际上，早在2018年普京就已开始放出“试探气球”，通过执政阶层的政治精英提出“活宪法”概念。2018年10月，俄地方选举结束后不久，宪法法院院长佐尔金首次提出“活宪法”概念，声称宪法需要修改，应加强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权限划分制衡。^④这一言论在俄政坛激起巨大反响。2019年7月，普京团队的核心成员、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议会报》上发表文章，接过了佐尔金的建议，全面阐释“活宪法”概念，认为宪法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以适应俄罗斯国内正在发生的变化，而当前的重点是改变立法和行政权力的不平衡现象。^⑤沃洛金曾任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主管国内政治事务，深受普京信任。在2020年1月的总统国情咨

①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5 января 2020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2582>

② ЦИК утвердил итоги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по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Поправки поддержали 77,92% россиян. 3 июля 2020 г. <https://tass.ru/politika/8877939>

③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5 января 2020 г.

④ Зорькин вспомнил о «жив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9 октября 2018 г. http://www.ng.ru/politics/2018-10-09/1_7328_zorkin.html

⑤ Жива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азвития. 17 июля 2019 г. <http://duma.gov.ru/news/45717/>

文中，普京正式提出了宪法改革的政治理念。从现有信息看，宪法改革建议应该是经过了执政集团内部的充分酝酿才向社会推出的。普京国情咨文发表后，众多俄罗斯政坛重量级人物立即表态支持。被解职的苏尔科夫2020年2月发表言论称，宪法修正案通过后，现任总统任期可以清零，重新参加选举。与此同时，俄罗斯认为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对于实现独联体一体化的目标是一个机遇，为抓住这种机遇就需要在政策调整上进行超前布置。

政府调整为宪法改革顺利推进铺路。普京国情咨文发表后，梅德韦杰夫政府集体辞职。俄罗斯税务局原局长米舒斯京被任命为新任总理。1月21日新政府成立，副总理由10名减至9名，有3人留任；21名政府部长中有12人留任，外交、国防、内务、紧急情况、能源、财政等重要机构的部长没有变动。新政府的特点是年轻化，平均年龄为47岁，上届政府为53岁。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此前担任总统经济顾问，主要负责经济事务，是国家项目计划的发起者。2月17日，塔斯社公布普京专访节目，普京在节目中承认，政府调整早有规划。2020年3月9日，普京签署法令，对总统办公厅和安全会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修改，核心内容是添加安全会议副主席职位，隶属总统，安全会议副主席、秘书长、助理可被总统任免。这实际上是对宪法修正中未能涉及的总统办公厅和安全会议架构与职能的补充规定。为了确保社会对宪法改革的支持，新政府对经济形势强势表态，以确保经济运行稳定。米舒斯京上任之初就召开会议讨论稳定经济的问题。对于新冠疫情和油价下跌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新政府以公关姿态官方统一表态：俄罗斯石油产业掌握着丰富的资源储量和足够的资金储备，在任何价格水平下都具有竞争力；同时，俄罗斯有足够的资金落实总统国情咨文的目标，完成社会民生任务。虽然疫情导致宪法全民投票的时间推迟，但是2020年7月宪法修正案以超高支持率获得俄罗斯民众的大力支持。

从俄罗斯政治的国际背景看，俄罗斯与世界政治出现的新特点产生共振，政治稳定面临挑战：民粹主义导致社会抗议运动兴起，互联网政治影响俄罗斯传统的政党政治，民族与人口问题带来社会认同危机，技术革命落后引发治理困境等。面对这些迫在眉睫的政治挑战，也需要从制度设计的原则上即宪法层面做出回应。

三、宪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2020年的宪法改革紧紧围绕着国家权力体系、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安全体系展开，互为影响，相互支撑。

（一）国家权力体系的变化

第一，宪法改革只是表面限制总统权力，总统核心实权扩大。一是加强对政府的控制，总统有权直接免职核心官员。在总统有权批准政府辞职的基础上，宪法修正案明确了总统可以批准总理、副总理、部长和行政权力机关及总统管辖机关领导人的辞职，规定总统无需总理提议便可直接免去总理、副总理、部长的职务。二是加强对国家杜马的控制，有权直接解散国家杜马。修正案规定：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的提名被国家杜马三次否决后，俄罗斯联邦总统可以直接任命总理并有权解散国家杜马，举行新的选举。实际上，国家杜马没有任何自主的可能性，只有与总统提前进行政治协商才能避免总统不满意而杜马可能被解散的政治后果。三是加强对联邦委员会的控制。2014年宪法改革时已经规定总统掌握10%的联邦委员会议员任免权，这次修订为总统可以直接任命30人以内的联邦委员会议员，约等于18%，再次扩大了对联邦委员会的控制。而且，在这30人中总统可以任命7名以内联邦委员会议员为终身议员。卸任总统自动成为联邦委员会终身议员，且拥有豁免权。0票反对的现实说明，一些资深的政治家希望成为这7名议员之一。一些年事已高、面临退位且长期以体制内反对派自居的政治家，如日里诺夫斯基等，此次全力支持普京的提议，也与终身议员的巨大政治利益有关。四是加强对司法体系人事权的控制。原来宪法规定总统无权决定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院长的人选，现在规定总统有提名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的权力，供联邦委员会任命。修正案还规定总统有权提议联邦委员会免除法官职务。

宪法改革进一步巩固了总统办公厅的地位和作用。此次宪法改革将第四章《俄罗斯联邦总统》第83条第9款“组成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修改为“组成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确保总统行使自身职权”。这是对长期以来俄罗斯反对派质疑总统办公厅权力过大的正式回应。例如，1996年11月，国家杜马内俄共等政治派别通过了致俄联邦宪法法院的呼吁书，请求检查宪

法中有关总统办公厅的条款，认为总统办公厅拥有不符合俄罗斯宪法的过大的权力，表现为总统办公厅可以监督并检查联邦法律和总统命令、指示的执行情况，保障干部和公务领域的国家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协调国家权力机关在保障人权、大众传媒和广告宣传等方面的活动。这次宪法改革特意在有关总统办公厅的条款中增补“确保总统行使自身职权”的文字，等于明确宣示总统办公厅是确保总统行使自身职权的核心机构，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应该加强。总统办公厅领导人有权向各联邦权力机构提出消除执行俄联邦总统决定过程中的缺陷并颁布人人必须遵守的法规。这实际上给反对派传递了一个信号：总统的全面领导是俄罗斯稳定的最大政治保证。

第二，宪法改革导致国家杜马权力受限。一是国家杜马仅加强了监督职能。按照宪法修正案，国家杜马只是批准总统提名的总理，然后按总理提名再批准各部部长。国家杜马似乎扩大了对政府的监督权，实际上这种监督权仅仅是形式上的权力。修正案第83条对于总统权力第1款的修改：总统有权任命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政府总理候选人需国家杜马根据总统提名批准，总统同时有权解除政府总理职务。二是国家杜马自身发挥职能反而被监督。因为修正案规定总统可以向宪法法院提出审查议会通过的法案是否符合宪法，如果宪法法院宣布违宪，总统可以将法律退给国家杜马并拒绝签署。这样，宪法法院拥有了制衡议会的权力，国家杜马等于被加上了一层限制。

议会制度涉及俄罗斯国家权力的制衡，关乎执政阶层治国理念的贯彻，影响俄罗斯的政治稳定与发展。议会制度同时又与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联邦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发展历程体现了俄罗斯政治综合性和整体性的态势。俄罗斯实行的是总统制，总统权力集中统一，这体现在各个领域，议会制度也不例外。苏联解体以来，议会制度的改革发展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国家治理的变化特点而进行的，政治目的是为了不断改进和完善总统制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普京宪法修订实现了对俄罗斯国家机构的深层次改革，是对俄罗斯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的调整。这次宪法改革中总统核心权力的加强，与议会制度的改革密不可分。

第三，宪法改革使总理政治影响力下降。按照宪法修正案，总理失去了在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领域的影响力，实际上成为专职负责经济社会问题的

职业总理。根据宪法修正案，在联邦行政权力结构中明确了总统和政府的管辖机关。总统管辖的机关在103条第1款明确为：国防、外交、安全、内务、司法、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及公共安全部门。也就是说，修正案明确将国防部、外交部、紧急情况部、内务部和司法部等划归总统直辖。虽然以往在俄内政中，总统也是负责管理国防部等强力部门，但毕竟没有在宪法中体现。此次明确将国防部等强力机关定位为总统直接管理的部门，而且规定这些部门的部长由总统提名，在联邦委员会讨论通过。这实际上削弱了总理职能，同时也削弱了国家杜马对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的参与和监督权。^①

国家权力体系改革的暗线是对国家公职人员的选拔与任用，从制度上划出红线。普京执政的一大特点是对权力、资本和劳动三大社会关系谨慎处理，制定国家反腐败计划，纠正俄罗斯政治的官僚主义弊端。这次宪法改革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背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确保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宪法修正案规定，从联邦中央到联邦主体，包括市政职位在内的所有国家与地方机关的负责人，都必须无外国国籍、无海外资产。第71条新加第18项内容为“建立对国家和市政职位更替的限制机制，对拥有外国国籍或居留权和永久居留权、对在境外开设账户存放贵重物品的俄罗斯公民，限制担任国家和市政机关职位。”第77条新加第3项内容：“俄罗斯联邦主体最高官员需是年满30岁并长期居住在俄罗斯的俄罗斯公民，并且没有外国国籍和居留权或证明其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文件。禁止俄罗斯联邦主体最高官员在境外的外国银行开设和拥有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账户。联邦法律可以对俄罗斯联邦主体最高官员制定附加要求。”第78条新加第5项内容：“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领导人需是年满30岁的俄罗斯公民，并且没有外国国籍和居留权或证明其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文件。禁止俄罗斯国家机关领导人在俄罗斯境外的外国银行开设和拥有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账户。”

另外，此次宪法改革还确立了国务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2020年12月8日，普京签署了国务委员会法，落实宪法修正案，确定国务委员会在国家权力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组建方式和运作程序。根据该法律，国务委员会是

^① 庞大鹏：“普京修宪的政治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4期。

依照宪法成立的国家机关，由国家元首组建，旨在确保权力机关协同运作并确定国家内政外交基本方向和社会经济发展重点方向。国务委员会将就各地区发展的总方向、国家建设和联邦制及地方自治基础巩固的最重要问题、各级权力机关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建议。它还将协助解决联邦和地区权力机关之间的分歧并讨论人事政策。2020年12月21日，普京根据国务委员会的新法律签署命令，批准联邦国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新国务委员会由104人组成，其中包括总统普京（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总理米舒斯京、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各议会党团领袖、各地区行政长官和总统派驻各联邦区的全权代表。普京还批准了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的组成。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由28人组成，其中包括相关联邦主体行政长官和总统助理列维京。列维京表示，18个俄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自动成为主席团成员”并领导国务委员会执委会，其他人将轮流参加主席团。

（二）联邦制度运行机制的调整

普京刚上台时，俄罗斯实际上处于瓦解的边缘。车臣分裂主义迫在眉睫，其他联邦主体也各行其是，地方可以不向中央缴税，制定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有些联邦主体甚至相互提出领土要求，等等。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经济和社会政策也无法顺利执行。普京指出，俄罗斯复兴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作为秩序的源头和保障，在此基础上，任何革新才有可能。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建立起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体系，实现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统一。这为整个普京时代国家治理的顺利推行，奠定了最根本的政治基础。

第一，确保政府机制的一体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点政治方向是确保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体系。1993年俄罗斯宪法规定，俄罗斯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主体由共和国、自治区、边疆区、州、自治州以及直辖市构成。这种联邦主体的多样性成为俄罗斯联邦组成的主要特点。如何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联邦权力的统一性，就成为俄罗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关键。叶利钦时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俄罗斯未能处理好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造成中央权力软弱、地方政府自行其是的

严重后果。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普京时代对国家治理模式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深刻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加强了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国家垂直权力体系。2004年9月，普京在别斯兰人质事件后的政府扩大会议上表示：政府机制的一体性是巩固国家的最重要因素。俄罗斯联邦宪法第77条对此有明文规定。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理念体现为：中央政府与各联邦主体所在的地方政府，无论在处理联邦事务还是联合管理的事务方面，都要体现出一体性。相应地，它们应该按一个完整的、相互依存的整体来运作。^①此次宪法改革将这一核心理念写入宪法第71条，在属于俄罗斯联邦管辖部分的第4款新加“组成公共权力”一语，短短一句话体现了政府机制一体性的根本要求。第132条新加第3款再次强调：“地方自治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纳入统一的俄罗斯联邦公共权力体系，为更有效解决相关地区居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而相互协作。”

同时，对已经采取的一些治理举措从技术上进行法律化处理。例如，第70条第2款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是莫斯科市，首都的地位由联邦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新添加“个别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常驻地可以是联邦宪法法律规定的其他城市”。这是对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地理位置的承认。例如，俄罗斯国家杜马2006年12月20日通过法律，将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迁往圣彼得堡。2007年12月23日，普京签署宪法法院搬迁令。2008年5月27日，宪法法院搬迁完成并成功正式运转。此外，俄罗斯远东与北极发展部也是设在远东地区，属于该项条款法律效力的追加认定。

第二，加强对地方自治的管理。地方自治是俄罗斯权力结构的毛细血管。俄罗斯宪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地方自治机关（市、镇、村）不进入国家权力机关体系。但是，近年来普京已经对此进行了有的放矢的政治治理。治理方式之一，是地方自治的模式偏向中央治理及联邦选举的运行机制。第八章《地方自治》第131条对地方自治机关的组成原则和机制结构，明确添加了

^①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на расшир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 участием глав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3 сентября 2004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2592>

中央政府层面联邦法律的硬性要求：“地方自治在市政体制和联邦法律规定的形式下实行。地方自治机关结构由居民依据联邦法律规定的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机关的一般原则独立确定”。例如，借鉴联邦层面“选举过滤器”的经验，设置“市政过滤器”，即联邦主体地方长官选举中所要求的“信任签名”，同样也逐步用到地方自治。通过“市政过滤器”选拔上来的地方自治级别的负责人与中央政权高度契合。这种治理模式随着此次宪法改革的推行已经完全合法化。治理方式之二是实行代理行政长官制度。由于普京大规模使用代理行政长官制度，一批来自中央的技术官僚被推到了地方领导人的职位上。这一治理经验在此次宪法改革中被法律化和规范化。在第 131 条新加 1.1 款：“国家权力机关依照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情况，参与地方自治机关的组建，任命和免职地方自治机关官员”。这就意味着把普京广泛使用的代理行政长官制度的治理经验写入宪法，赋予联邦中央对联邦主体最高立法层面新的管辖渠道和权力。

第三，确保领土与主权完整。宪法在第三章《联邦体制》第 67 条第 2 款新加 2.1 项：“俄罗斯联邦保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除了与邻国划界工作外）禁止意图割让俄罗斯领土的行为及相关呼吁”。以此为依据，在关于俄罗斯与日本之间的南千岛群岛领土谈判的问题上，俄罗斯实际上表明了拒绝移交岛屿的立场。1956 年《日苏共同宣言》中写明“向日本移交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的条款因此失效。

第四，总结车臣治理的经验。普京通过包括确立国家法制和现代化发展在内的综合手段对车臣进行治理。车臣冲突是俄罗斯全国性的问题。在西方看来，苏联解体只是第一轮解体，只有 14 个民族获得独立，而留在俄罗斯联邦内的其他民族因种种原因没能获得自决权，它们在“排队”等着独立，车臣起着推动第二轮解体的作用。不仅如此，由于在车臣问题上有宗教极端主义的介入，车臣冲突很快就具有了一定的宗教性质，车臣在西方政治家的视野里也具有了新的作用。以瓦哈比教派为代表的宗教激进主义者在车臣冲突中非常活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京避免了俄罗斯的国家分裂，巩固了国家的统一。车臣冲突结束后，普京从使用军事手段时期很快过渡到政治与经济措施并举的治理时期。这次在宪法改革中也总结了治理车臣的经

验。例如，第三章《联邦体制》第 67 条第 1 款在原先“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包括俄罗斯联邦诸主体的辖区、俄罗斯联邦的内陆水域和领海、领空”的基础上，新添加了“根据联邦法律可以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设立联邦直辖区；联邦直辖区的公共权力组织依据相关联邦法律成立”。这与普京的治理经验密切相关。2000 年 6 月 8 日普京签署命令，对车臣进行总统直接治理，在车臣建立执行权力机关，并设总统驻北高加索代表。2000 年 6 月 12 日，普京总统签署了在车臣共和国建立临时行政权力机关的法令，任命卡德罗夫为车臣临时政府领导人。这标志着俄罗斯开始对车臣实行总统直接治理，车臣局势由单纯军事状态转入政权和经济建设同武装剿匪并行的新阶段。这条经验写入宪法，为未来处理类似事件预留了法律空间，实际上强化了联邦中央对地方的管辖。

（三）国家安全体系的统筹协调

俄罗斯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安全利益优先于发展利益，这是俄罗斯显著的国家特性。俄罗斯宪法对于国家安全的关注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俄罗斯奉行总体安全观，其安全观是涵盖内政外交重点、目标、措施的一个完整体系，重点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主要方向，并由此确定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改革任务，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与自由，推动国家的持续发展及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安全与发展有根本的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俄罗斯坚持为防止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必须确保社会稳定、民族与宗教和睦，实现公民的生存、安全、劳动、住房、卫生、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受教育和文化发展等权利。普京就别斯兰人质事件发表的电视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普京认为，俄罗斯国家内部冲突尖锐、种族间矛盾错综复杂，国防处于东西难守的境地。俄罗斯别无选择，只有巩固国家统一，建立新的资金运转体系，形成有效的应对危机的管理体系，才能确保国家安全。^①

第一，确保总统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核心地位。第四章《俄罗斯联邦总统》第 80 条第 2 款，新增加了总统的职责是“维护国家公民和平与和睦，

^①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4 сентября 2004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2589>

保障纳入到统一公共权力体制的机关协调行使职能并相互协作”。第 83 条第 7 款在总统成立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原有条款上，新补充“维护国家利益和个人、社会、国家安全的权力，维护公民和睦和谐，保护俄罗斯联邦主权的独立性和国家领土完整，预防国内和外部威胁”，这就从法理上赋予总统依宪处置紧急事态的权力。同时，新增加第 79.1 条，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采取措施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确保国家和人民和平共处，防止外部势力干涉国家内政”。“防止外部势力干涉国家内政”，这一点是对俄罗斯抵御“颜色革命”经验的高度凝练。

第二，维护俄罗斯历史观，加强俄罗斯国家认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史问题对于俄罗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俄罗斯与西方及中东欧国家对于涉及俄罗斯历史问题的认识，往往南辕北辙并严重影响俄罗斯内部的国家治理。摆脱历史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确保国内的社会稳定，这是普京执政的重点之一。因此，在宪法中框定关于俄罗斯历史认知的基调，是增强民众国家认同感、深化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必要途径。在第三章《联邦体制》第 67 条新加第 67.1 条，共 4 款新内容：一是明确俄罗斯联邦是苏联领土的法律继承国，是苏联作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成员的法律继承国，也继承了国际条约规定的在俄罗斯联邦领土外的苏联债务和资产。二是明确千年历史团结起来的俄罗斯赋予人民以上帝的信仰和理想，并保持国家发展的连续性，承认历史形成的国家统一。三是俄罗斯联邦纪念祖国的捍卫者，并保护历史真相。不允许贬低人民功绩在保卫祖国中的意义。四是儿童在俄罗斯国家政策中具有最重要的优先地位。国家创造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德智体美、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意识和对中老年人尊重的条件。国家确保家庭教育的优先地位，对无人照看的孩子承担起父母的责任。这里既重视对俄罗斯历史传统的维护，也重视对下一代的历史传统教育。明确宣示历史问题的政治意义在于警告反俄的一些国外势力，不要将历史问题作为对俄罗斯国家形象诋毁的手段和工具。

第三，高度重视民族与宗教问题，维护政治安全。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多民族国家之一。根据 2010 年全俄人口普查数据，俄罗斯共有 193 个民族，使用 277 种语言和方言。民族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在这次宪法改革中受到

国家保护。2018年3月，俄罗斯民族事务局曾经提出《2025年前俄罗斯国家民族政策战略（修正案）》草案^①，将民族间关系状况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蔓延、社会和财产分化，以及全球化导致的民族文化遗产、民族传统道德价值观损失等因素。经过近一年的讨论，2018年12月普京签署最终版本。^②在最终版本中，令人意外的是，草案中对于前述原因的敏感表述被删除了。^③这说明俄罗斯国内局势的复杂性：一方面，草案本身说明普京政府认识到全球化和信息化引发的人口流动对于俄罗斯国内局势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2018年国内民粹主义的社会情绪上升，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普京政府作了谨慎处理。实际上，早在2012年普京第三次竞选总统时就发表过《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竞选文献，已经指出人口流动对于民族认同等问题的影响。在普京看来，全球性民族发展趋于多元化，很多国家也实行多元文化政策，而且全世界的移民现象还会加剧，这将会改变各大洲的面貌。他指出，这种过程是复杂的，很多国家都未能成功地同化移民。普京强调，尽管外在现象类似，但俄罗斯的情况必须坚持自己独特的解决方式，因为俄罗斯的民族和移民问题同苏联解体直接相关，实质上，是由于18世纪基本形成的历史上的大俄罗斯的解体。普京提到，俄罗斯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贯穿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文明的主轴线是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文化。他认为，必须巩固“历史性的国家”^④，用国家和文化来促进各民族和宗教的融合。^⑤此次宪法改革将普京对于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很多治理经验写入根本法。第67.1条论述千年历史时强调了

① Проект Указ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ратег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5 года» (подготовлен ФАДН России 13.03.2018). <http://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56646789/#ixzz5UXUGYwTQ>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дписал Ука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ратег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5 года, утвержденную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9 декабря 2012 г. № 1666». 7 декабря 2018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59348>

③ Там же.

④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23 января 2012 г. http://www.ng.ru/politics/2012-01-23/1_national.html

⑤ 参见庞大鹏：“世界政治中的俄罗斯：互动与传导”，《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1期。

俄罗斯赋予其人民以上帝的信仰，这里虽然避免使用东正教的字样，但是实际上是肯定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和现实中的地位。第 68 条第 1 款新加“俄语同时也是组成国家的各族人民的共同语言”。第 68 条新加第 4 款“俄罗斯联邦的文化是其多民族独特的遗产，文化受国家支持和保护”。第 69 条新加两款条文：国家保护俄罗斯联邦所有人民和族裔的文化特性，确保守护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俄罗斯联邦为生活在国外的同胞行使其权利提供保障，维护其利益并为维护全俄罗斯文化特性提供支持。上述条款既巧妙地维护了俄罗斯族的主体地位，又树立了保护民族多元文化的框架，同时还对俄罗斯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尤其是独联体倡导的“俄罗斯世界”的思想进行了法律化规定。这些举措对于解决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与宗教问题，维护政治稳定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四，高度重视民生福祉，维护经济安全。第 75 条新加三款条文：俄罗斯联邦尊重公民的劳动，并保卫其权利。国家保障最低工资不低于俄罗斯联邦全体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俄罗斯联邦按照普遍、公平和团结的原则建立公民退休金制度，并支持其有效运行。按照联邦法律规定的方式每年至少一次对退休金进行指数化；根据联邦法律对社会强制性保险进行保障，为公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并将社会补贴和其他社会费用指数化。新加第 75.1 条：为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改善公民福利和国家社会相互信任创造条件，确保公民和劳动者得到尊重，保障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保障社会伙伴关系，经济、政治和社会团结。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保守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来说，做好民生福祉，是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四、宪法改革的综合影响

宪法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此次宪法改革不仅与后 2024 年俄罗斯政局密切相关，也与新冠疫情引发的世界政治变化同频共振。同时，宪法改革引发的俄内政外交的联动效应也不容忽视。

第一，从宪法改革的后续效果看，一揽子宪法改革法案保障了普京的进退。宪法改革及后续一揽子相关法案直接影响着俄罗斯的政治进程。一揽子

宪法性法律的修改决定普京进退的细节。新宪法通过后，普京已分三批向国家杜马提交了一揽子宪法性法律修正案。这些法案既关乎后续相关法律法规的常规修改，也涉及根据新宪法而专门制定的新的宪法性法律，如前总统豁免权法^①和国务委员会法等。宪法改革后，普京在“2024 问题”上将进退自如：往前看任期清零，理论上可以连选连任至 2036 年；往后退通过豁免权法确保自身及家人的安全。关键在于进退之间的各种可能安排，这些安排集中在后续一揽子法案的内容与细节上。

2024 年普京本届总统任期将结束，俄罗斯最高权力需要稳妥过渡，这是普京的战略目标。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居于这个政治周期的中间阶段，对于确保普京执政理念的延续与普京体制的稳定具有政治示范效应。即使 2024 年普京可能离职，也需要在 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前后开始布局能够在 2024 年之后发挥有效政治影响力的机制。稳定性和继承性是普京执政团队对 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政治考量的基本原则。

此次宪法改革是对普京 20 年执政经验的总结，是将普京行之有效的治国举措以法律语言的形式加以制度化。从提出和讨论的过程看，此次宪法改革是一次精心酝酿的政治设计，是一次指向性明确的修订。最初提出的权力制衡只是引子，真正落实的修正条款涉及俄罗斯国家制度、国家安全、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等治国理政的重大领域。俄罗斯宪法改革以及连带的一系列政治变动也是直接源于普京为解决 2024 年挑战的精心谋划。宪法改革对于国家权力体系及后 2024 年政局有重要影响。直接的政治作用是强化了总统的核心权力，目的还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普京表示，此次宪法改革是为了建立一个无懈可击、绝对稳定的体系，保障俄罗斯的独立和主权，这将加强俄罗斯的国家地位，并为俄罗斯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普京时代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模式，都是为了把最高领袖与底层人民之间的隔阂打通，而打通的路径和桥梁就是建设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国家。俄罗斯历史上凡是行之有效的政治体系，其精髓皆在于此。普京的

^① 此次宪法改革增补了第 92.1 条规定：因期满、提前辞职或因健康长期无法履职而被终止权力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享有豁免权；对于因期满、提前辞职或因健康长期无法履职而被终止权力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的保障由联邦法律规定。

强国战略与俄罗斯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是一致的。

第二，宪法改革与新冠疫情同频共振。2020 年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性危机，成为世界各国稳定与发展的最大影响变量，世界各国人员往来按下了暂停键，世界经济增长挂上了倒车挡，人类发展面临空前的风险挑战，国际形势进入动荡变革期。2020 年对于俄罗斯而言，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分水岭。它是向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的过渡。俄罗斯面临突破性历史任务。^①世界政治的变动深刻影响着俄罗斯，俄罗斯与世界政治明显共振，与世界各国一样面临抗击疫情与经济衰退的双重挑战。在这一双重挑战的形势背景下，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宪法改革。俄罗斯疫情的危机治理与宪法改革稳步推进。经过周密的内外联控，宪法改革对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影响总体可控。

新冠肺炎疫情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突发性全球危机，其影响远远超过疫情本身，也是影响俄罗斯宪法改革最大的刺激性因素。总体上看，俄罗斯 2020 年上半年应对第一波疫情相对成功，下半年则遭受第二波疫情的严重冲击，与此相应，俄罗斯 2020 年的形势特点在上、下半年也有差异。2020 年上半年俄罗斯疫情的危机治理与宪法改革稳步推进，同时俄美关系在历史记忆、战略稳定与地缘政治三大问题上博弈不断。下半年，尤其是 7 月宪法修正案通过后，俄罗斯周边战略态势恶化。白俄罗斯选举危机、纳卡冲突和吉尔吉斯斯坦选举动荡渐次发生，俄罗斯最为紧密的三个盟友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出现动荡。俄总统办公厅一度担心会与本国内政产生联动效应，影响 9 月的地方选举和推动远东地区抗议事件升级。但是，从俄罗斯的政治实践看，各种危机并没有对宪法改革产生实质影响。由于疫情促成了俄罗斯政治聚集效应，客观上反而有利于宪法修订案的最终通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场典型的全球性挑战。冷战时期，人类一度面临核战争危险，但全球经济所受冲击尚不及此次疫情。此次疫情已经冲击到人类健康、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是一场全面的、综合性

^①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5 января 2020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2582>

挑战。从世界范围内的形势看，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大国竞争加剧、民粹情绪上升等因素影响，世界出现经济下滑、安全趋紧、政治分化的态势。但是危机中也孕育着新局，危机也是改革的机遇。可以说，疫情对于内政是一种二律背反的影响。最典型的是欧盟。在疫情大面积蔓延于欧洲之时，欧盟再次面临挑战。除了疫情本身及其带来的经济灾难外，挑战还来自英国“脱欧”、意大利转向欧洲怀疑论、美国拒斥欧盟一体化、俄罗斯分而治之政策、德国宪法法院脱离欧盟法律秩序并削弱欧洲央行信誉等。然而，欧盟的历史就是在灾难推动、激励或裹挟下不断前行的历史。煤钢联营和欧共体是为应对二战后局势而创立的，单一市场是对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不景气的回应，货币联盟是为了应对 1991 年两德统一而达成的协议，欧洲稳定机制的创立是欧元区金融危机的结果。欧洲联合或一体化路径之所以如此，源于欧盟是一个由政治意志构成的制度实体，是一剂法德之间百年战争和毁灭性流血的解药。后疫情时代的欧盟具有雄厚的经济与巨大的绿色发展理念影响力，以及突出的全球规则设置能力。疫情危机历史性地提升了欧盟一体化水平的政治决断力。^①

疫情对于俄罗斯内政的影响也有类似欧盟之处。这被称为是疫情政治学中的政治聚集效应。强力举措和领袖作用成为重大危机面前的普遍政治现象。俄罗斯防疫形势相当严峻。但就目前来看，疫情对政治局势稳定尚未构成重大威胁。疫情发展不会失去控制，对政局稳定的冲击依然在可控范围内。在第一波疫情时，经过初期短暂的混乱后，普京果断施策，对疫情的治理绩效明显，普京的个人威望进一步提升和巩固。从疫情全球治理的实践看，国家在危机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强大的国家是克服危机的关键，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成为民众的期望。不仅如此，危机局面还能让政府从法律层面对反对派的政治抗议运动加以有效遏制。在俄罗斯实际上没有兴起反修宪、反清零的政治抗议。对政治决策的考验也体现在后疫情时代。疫情导致产业链缩短，全球治理开始在区域一体化层面发力。经济全球化这一

^① 谢伏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9 页。

历史大势不会因疫情而终结，但其结构和内涵可能出现新的变化。以生产要素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可能被拓宽，涵盖经济、安全、社会要素的更为包容的全球化将具有更强的韧性和潜力。因此，俄罗斯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在这一趋势下调整政策，应对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9月13日地方选举，是2021年国家杜马选举前俄罗斯举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竞选活动，也是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对俄罗斯政治实践的一次检验。从最终结果看，地方选举虽然过程有些许波澜，但是统一俄罗斯党大获全胜，再次表明俄宪法改革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由于疫情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统一俄罗斯党的选情并不被看好。除了疫情影响外，在此次地方选举前，白俄罗斯局势动荡，远东抗议活动中也出现了支持白俄罗斯民众抗议活动的声音，政府一度担心远东地区的抗议活动会像白俄罗斯一样蔓延至全国。2020年8月20日纳瓦尔内在从托木斯克市飞往莫斯科的途中中毒。纳瓦尔内中毒事件也让选前局势有所紧张。鉴于上述局势，地方选举选情复杂。选前俄专家学者及媒体一度不看好2020年地方选举形势。但是，本次统俄党地方选举的结果没有出现先前俄媒和智库分析的落选情况，甚至是统俄党2018年以来最好的一次。统俄党在本有可能发生州长第二轮选举的地区顺利获胜，同时保持了在州议会中的多数党地位。统俄党提名和支持的19名地方行政长官候选人大获全胜，在11个地方议会中也赢得多数席位。唯一的问题是实际支持率和席位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同时在3个市级议会出现失去多数党席位的现象。尤其是受纳瓦尔内中毒事件的影响，统俄党在托木斯克市杜马选举中仅获得11席。三个新政党（新人党、绿色可替代党和为了真理党）分别突破了5%的得票率顺利进入地方议会，也意味着可以在不收集签名的情况下直接参加2021年国家杜马选举。2021年1月21日，为了真理党与公正俄罗斯党合并，强势参加2021年国家杜马选举。^①

第三，宪法改革引发俄罗斯内政外交的联动效应。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斯实际上陷入低速发展。2013年乌克兰危机以来，甚至趋于停滞。但是，

^① Справоросс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начинают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с партиями «За правду» и «Патриоты России». 21 января 2021 г. <https://tass.ru/politika/10518339>

在普京执政20年之际，社会共识却是2010年代是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最成功的时期：在这10年里，俄罗斯成功阻止了西方向独联体空间的渗透，阻断了威胁俄罗斯切身利益的西方扩张；俄罗斯正从大欧亚空间的边缘向中心靠近，付出相应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力量“东升西降”对比的变化，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中美竞争的加剧，俄罗斯认为妨碍其实现独联体一体化的阻力在减弱，普京也不再讳言政治抱负。2020年4月，在俄罗斯政论节目“克里姆林宫·普京”中，总统普京表示，如果苏联解体后出现的这些国家走上一体化的道路，这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这些国家已经认识到，联合将使所有人受益，一体化是一条自然而然的道路。苏联解体已是30年前的事了，这些苏联曾经的成员，正在克服对过去的恐惧，克服对苏联复兴的担忧。^①2020年6月，普京表示，苏联成立时规定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但如果一个共和国加入了苏联，并获得了大量的俄罗斯土地，这些领土历史上属于俄罗斯，那么当它离开苏联时，只能带走它加入时带来的东西，不应该随身带走俄罗斯人民赠予它的礼物。^②总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现原苏联地区重新一体化的外部阻力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但是，俄罗斯分析家认为，国际形势和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俄罗斯的深刻变化：美国的衰落不可避免，欧洲将彻底失去世界中心的地位，中国有望成为超级大国，必将与美国发生冲突。形势的变化将会大大减少俄罗斯在独联体内采取行动时可能遇到的外部阻力。

俄罗斯因此借宪法改革实际上提出“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力求为整合独联体一体化积极创造条件。此次宪法修正案第79条规定，俄罗斯联邦可以根据国际条约参加国家间的联合组织，并将自己的部分权力转交给这些组织，但这不能限制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也不能与俄罗斯联邦宪法制度的原则相抵触。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际条约规则通过的国际机构决议在解释时违反俄罗斯宪法，将不得在俄罗斯联邦内执行。尽管没有明示，但这一条款的

①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усилий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19 апреля 2020 г. <https://rg.ru/2020/04/19/putin-nazval-estestvennym-obedinenie-usilij-postsovet-skih-respublik.html>

② Путин порассуждал о «подарках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республикам СССР. 21 июня 2020 г. <https://lenta.ru/news/2020/06/21/podarki/>

补充内容实际上在于指明国内法高于国际法。俄罗斯宪法共有八章，其中第一章《宪法制度的原则》和第二章《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按照规定不能修改。其中，第一章第15条第4款规定：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和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是俄罗斯联邦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规定的规则与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的规则有不同之处的话，则以国际条约中的规则为准。这有“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含义。俄罗斯现行宪法是在1993年出台，当时叶利钦执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而且是借助西方的支持才结束了1993年因宪法之争而形成的“双重政权”局面，因此，叶利钦制定的1993年宪法是一部基本接纳西方理念的宪法，第15条实际上与西方的诉求一致。由于宪法前两章不能修改，第15条因此不能动。如果想改变“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法理基础，只能以比较隐蔽的政治语言予以表述。所以，宪法修正案不可能明确说“国内法高于国际法”，但是现在规定“国际机构决议在解释时违反俄罗斯宪法，将不得在俄罗斯联邦内执行”，实际上明确了“国内法高于国际法”。

为确保“国内法高于国际法”，俄罗斯建立了高效的执行机制。2015年12月15日，俄为应对某些国际法带来的政治挑战，已对《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加以修正，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决议的效力优先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在司法实践中开启了“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探索。此次宪法改革进一步完善了该执行机制。

首先，明确宪法法院在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上的释法权。

第125条第1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是俄罗斯宪法监督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宪法诉讼程序行使司法权力，保护基本宪法体制、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保障俄罗斯联邦宪法在俄罗斯全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直接影响；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由11名法官组成，其中包括宪法法院主席和副主席。修改前本条宪法仅仅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由19名法官组成。

第125条第5.1款第2点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按照联邦宪法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与俄罗斯联邦宪法矛盾的国际机构决议执行可能性的问题；解决在外国或国际（国家间）法庭对俄罗斯联邦施加义务的（仲裁）决议与俄罗斯联邦公共法律程序基础相抵触的情况下，该决议执行可能性的问题。

此项规定特意指明，国际决议除了不能与俄罗斯宪法产生矛盾之外，也不能与俄罗斯的公共法律抵触。俄罗斯公共法律的范围极其广泛，实际上是其国内法律的代称。

其次，由于宪法法院在裁决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上被赋予宪制权力，确保宪法法院做出与俄罗斯中央政权利益一致的决定就至关重要。为此，此次宪法改革特意在总统与宪法法院的人事决定关系上做出了重要改变。

第83条第6款规定：总统向联邦委员会提名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主席、宪法法院副主席、宪法法院法官、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主席、最高法院副主席、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供任命；总统有权任命其他联邦法院主席、副主席和法官。修改前此条宪法仅仅规定：总统向联邦委员会提名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候选人供任命。

第128条第1款再次明确：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主席、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副主席和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官，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主席、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副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由联邦委员会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提名任命。修改前此条宪法仅仅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由联邦委员会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提名任命。

再次，宪法改革与发展模式选择的关系。2021年是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30年。我们可以从30年的发展看宪法改革的历史意义。当代俄罗斯转型与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进程，涉及三重转变：从苏维埃制度向所谓西方民主制度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一个加盟共和国向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转变。这条转型与发展的道路已走过30年。与1991年相比，俄罗斯现在的现代化目标并没有根本的差别，依然坚持社会民主发展，力求使国民的富裕程度接近欧洲水平，并积极提高国家机构的工作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在可预见的将来，国家向何处去？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俄罗斯面临的战略选择有四个方向。一是动员模式。俄罗斯正被西方包围，西方不断给俄罗斯制造麻烦，周边的邻国正在去俄罗斯化。如果这种理解占据上风，那么选择的将是动员模式。国家将集中优势资源，并分配给优先方向，基础设施建设、油气、纳米技术等一些极其宏大的目标被宣布为国家最优先的方向。但这里至关重要的是选择动机。如果纯粹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则过分夸大了

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经营活动被置于次要地位。二是“食利者”模式。这是指最大限度地利用和重新分配自然资源所产生的红利。国家发展依靠的将首先是生产石油、天然气、金属、木材的那些部门，即靠传统出口产品而存活。这种模式无法缩短俄罗斯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利于未来经济，即知识经济的发展。三是“惯性”模式。利益集团随机应变，它们为获得资源展开争斗。在这种情况下，被宣布为优先方向的将是经济和政治稳定，为了这一目的推迟国家发展所必需的、艰难的改革。四是“现代化”模式。这是指坚持不懈地改革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完善法律，建立符合创新与投资需要的发展机制。提出的任务将是提高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的质量以及公民的积极性。俄罗斯社会中的有识之士认为，“现代化”是俄罗斯发展的最有效的一条道路。俄罗斯公民的积极性只有在这种模式下才能得到发挥。前三种模式推行起来要容易得多，但现代化道路并非单纯的一系列投资项目，而是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目标以及落实体系将其贯穿起来。目前俄罗斯已通过和正在研究的未来计划恰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因此这种模式已有了一定的基础。这是相当复杂的任务，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众心理等。但是，如果不用这种方式解决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未来俄罗斯的发展将遭遇更大的困难。稳定和降低政治风险对国家的发展尤为重要。只有建立能自我修正的体系才能降低风险。^①

可以说，俄罗斯的宪法改革及由此引发的政治运行机制的调整变化，是在俄罗斯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内生演化的结果。

五、结语

宪法改革是俄罗斯政治中的大事。宪法改革正在并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影响俄罗斯的政治形势。俄罗斯此次宪法修订不是微调而是大量增补、全面改革。除第一、二、九章外，对涉及国家重大制度建设方面的条款进行了调整。此次宪法改革是对普京 20 年执政经验的总结，是将普京行之

^① Игорь Юргенс. В ожидании перемен-У России есть четыре пути, один из них – «к золотому миллиарду»//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0 января 2008 г.

有效的治国举措以法律语言的形式理论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标志着俄罗斯宪法从鲜明的叶利钦时代特色，过渡到体现普京时代内在特征的阶段。当代俄罗斯的宪法发展史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转型和发展的进程相一致，体现了俄罗斯国家治理从西方化到俄罗斯化转变的特点。

俄罗斯在普京治下从“全盘西化”向俄罗斯传统回归。在继承叶利钦改革成果的同时，强调俄罗斯新思想和主权民主，在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保持俄罗斯特色并实现现代化，这是一条俄罗斯自身越来越熟悉的俄罗斯化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国家主义的法律传统根深蒂固，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被视为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普京时代俄罗斯立法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此次宪法改革在内政层面对巩固国家制度产生了影响：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扩大了总统的核心权力；在国家结构形式中，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国家认同上，突出俄罗斯族的主体地位，精英民族化得到实现；在国家安全层面，增补的诸多条款对俄罗斯主权领土问题、“俄罗斯世界”、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宪法改革后总统的核心权力再次扩大，这与普京宪法改革的理念和政治目标一致。此次宪法改革依然体现了俄罗斯集中优化政治资源，实现突破性发展的治国理念。

这次宪法改革虽然由于普京任期清零淡化了接班人问题，但是普京依然需要解决 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以及 2024 年以后政局走向的问题。总统核心权力的加强，为应对和解决后 2024 年政局可能出现的动荡提供了法律基础。2020 年宪法改革总结此前俄与西方斗争中积累的经验，完善处理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的法理基础和执行机制，为俄罗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服务。

美国对于俄罗斯此次宪法改革基本持负面态度，更多是从价值观的角度加以评价。美国认为，普京借宪法改革重塑个人化的专制国家，最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表明分权等核心民主原则受到了冲击，总统再次位于法律体系的最高层，其权力得到进一步扩展；普京借此重塑了一个统一、专制、集中和高度个人化的国家；这场宪法改革暴露了俄罗斯最高法律的短暂性和不稳定性。实际上，总统任期清零只是此次宪法改革中一个附带性的政治目的，普

京的主要意图是对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进行经验总结，对国家安全保障机制加以巩固提升。如果过于聚焦执政者个人的政治得失，就会误判此次宪法改革之于俄罗斯发展的重要意义。此次宪法改革将在较长时间内对俄罗斯的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目前的很多判断还需要在未来俄罗斯的形势发展中加以检验和修正。

【Abstract】 Constitutional reform is, now and in the future, a key issue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Russia. Russia's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addition to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in the mechanism of its politics, is the result of internal evolu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heritag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Judging from the background, this constitutional reform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constant deepening in understanding. Today Russian leaders clear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Basic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remain unchanged. Putin's regime has been arranged ahead of schedule and steadily put forward, which ultimately ensures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Russian society. Judging from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it involves adjusting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Russian regime, its state struc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s well. This constitutional reform is a review of Putin's governance experienc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t is the result of theoriz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of Putin's effective governance measures in the form of legal languages, which marks the transition of Russian constitution from the Yeltsin era to the Putin era. The COVID-19 epidemic is a stimulating factor for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with an evident effect in political unity.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has brought about an obvious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 internal and external affairs, which will have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Russia.

【Key Words】 Russian Constitutional Reform, Russian Political System, the Yeltsin Era, the Putin Era

【 Аннотация 】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реформа — ключевой вопро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и в будущем.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реформа России и вызванные ею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и измен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её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ействия являю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внутренней эволюции, основанной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наследи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традициях и социальном развитии России. Судя по истории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реформы,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реформа прошла через процесс постоянного углубления поним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лидеры чётко понимают взаимосвязь между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реформо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ю, и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реформы остаются неизменными. Режим Путина был введён в действие с опережением графика и неуклонно продвигался вперёд, чт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обеспечило плавно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х реформ и общ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удя по основному содержанию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реформы, она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у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и систем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Эта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реформа является итогом 20-летнего опыта правления Путина.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воплощения эффективных мер управления Путина в форме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еоретизировани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и легализации, что знаменует перехо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т эпохи Ельцина к эпохе Путина. Эпидемия пневмонии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ового типа является стимулирующим фактором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реформы, и эффек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единения очевиден.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реформа вызвала очевидную связь между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и внешними делами Ро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реформа окажет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реформа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России, эпоха Ельцина, эпоха Путин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最后的帝国及其邻居 ——俄罗斯周边安全与地区秩序*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

【内容提要】2020年以来，俄罗斯周边形势突变，发生在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纳卡等地的动荡，引发了人们对于俄罗斯如何反应、作何考虑的重点关注。本文作者指出，俄罗斯对于周边地区仍然高度关注，但是重点不同，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两个国家的安危与走向，直接关乎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态势，对俄罗斯则不具有同等的意义。作者认为，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对周边地区的外交政策和行动，已经发生了改变，不是帝国式对周边事务到处插手的做法，而是根据自身的利益考量，有选择地、以不同的参与程度加以应对。俄罗斯权衡自身目前的实力与利益，在处理周边事务方面的目标和优先只有一个，就是确保本国安全，而非建立某种周边地区秩序。

【关键词】俄罗斯国家安全 俄罗斯邻国 俄罗斯外交政策 欧亚地区秩序

【中图分类号】D8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3-0106(15)

* 本文原文发表于《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21年第2期(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ев. Последняя империя и её сосед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как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приоритет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1. Том.19. №.2)，感谢作者本人以及《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授权本刊以中文发表。中译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欧亚合作与中俄关系的战略定位”(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3)的研究成果。

**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ев)，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合作者。

而你的大方的建造者，远瞩高瞻，
心旷神怡，他曾作怎样的构想，
竟把殿堂上的多角形、半圆形的壁龛
安排在朝东和朝西的方向？
美丽的庙宇，肃穆而安宁，
四十扇大窗——光明辉煌。
乘着风帆，托着穹顶，
走来四位无比俊美的天使之长。
充满着智慧的圆顶建筑
千秋万世留存在人间，
六翼天使的震耳的恸哭
不会使暗淡的镀金翻卷。^①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Осип Манделъштам）

“圣索菲亚大教堂”（节选），1912年。

苏联解体三十年后，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俄罗斯相对顺利地渡过了对于任何一个瓦解之帝国来说的危机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俄罗斯这个旧有共同体中最为强大的一块碎片，不止一次克制了恢复已被破坏大厦的诱惑。类似举动（不计后果）的目的，无外乎是在过去统一国家空间内，建立新的安全共同体。俄罗斯在过去几百年的帝国对外政策中，已经具备了对此类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使得俄罗斯在今天至少会认真思考相关行动的合理性问题。

俄罗斯成功避免了恢复苏联的企图和诱惑，即便没有苏联这个国家，也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实力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俄罗斯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19世纪欧洲各帝国中，它是唯一一个几乎以不变的形式保留下主要潜能（物质资源和力量储备）的国家，同时俄罗斯过去所有的“同僚们”早已被排除在世界强国之外。1991年的地缘政治灾难，尽管减少了俄罗斯帝国的领土面

^① 中文翻译使用的是王智量老师的译本，参见[俄]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诗选》，载于《智量译文选》，智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积，但并没有像20世纪上半叶的大英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失去最重要的特征和原有的资本。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在1995年指出的那样，解体更多的是去除了苏联的外部负担，并没有触及力量基础——资源储备与军事力量。这一特性是俄罗斯制定对外政策的决定因素。俄罗斯像以往一样，对国际秩序的需求和依赖程度极低，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于其直接管理的地区，并且只对这样的地区，承担维护安全的责任。

丰富的自然资源、辽阔的西伯利亚、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的人口、强大的军队、有核武器作为保障的战略自主权——这些都是俄罗斯在任何一种国际秩序中足以要求其他各方尊重其利益和价值观的充分条件。这些条件可以使俄罗斯保证自身的发展与安全，并不依赖于国际秩序的支持，而贸易大国美国和中国则非常需要这种支持。

帝国规模与权力的结合，以及本着“又想吃东西，又想减肥，什么都想要”的原则，容易导致政策的摇摆，造成帝国周边的无序。而如果在周边和国际舞台有建立稳定合作机制的真诚愿望，反对其他大国强加游戏条件，这样做就既能有效地保障自身生存，又不至于去控制其他的国家。因此，俄罗斯没有建立那种人们所熟知的在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内被称为“国际治理”的机制。在就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讨论中，有专家认为俄罗斯有这样一个需求：建立周边“朋友圈”，理由是俄罗斯“没有盟友”。但这种需求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原因是，即便有潜在的朋友及盟友，他们在事关俄罗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上，也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对外政策至今仍受亚历山大一世的影响，他在维也纳会议上令与会者折服的是，能将空泛地讨论建立世界道德体系与他提出的继续保留对波兰领土直接控制的严格要求结合起来。这首先体现了要求世界听取俄罗斯合乎道义的论据，其次也展现了俄罗斯有能力担负起对已经是俄罗斯一个组成部分的责任。维也纳秩序以及现在欧盟内部机制所依赖的力量平衡，俄罗斯并不需要。虽然在鼎盛时期——打败拿破仑和希特勒之后，俄罗斯已经具备了对国际秩序施加直接影响的能力，但俄罗斯从未充当过国际秩序变迁中革命性力量的角色。俄罗斯不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看作是其力

量的源泉，而这恰恰是中国现在以及美国在一百年前所做的事情。唯一例外的是“世界革命”理论，但斯大林实质上已于20世纪30年代将之推翻，转而关注自身内部的问题。当力量受限的时候，国家只会在本国层面上考虑秩序问题，并且如多米尼克·列文所认为的那样，任何一个帝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自身内部多民族的管理。

2020年在俄罗斯周边地区发生了许多大事，如白俄罗斯的内部动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军事冲突，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府更迭，这都使得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研究要基于周边角度。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也即将来临，2021年12月，正如俄罗斯总统所说的，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苏联解体30周年。在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国家的历史中，其所蕴含的内部变化与曲折的对外政策，虽然对地区国际政治有影响，但是关键在于俄罗斯的行为变迁，因为俄罗斯是影响这一世界组成部分（后苏联空间）发展的决定因素。

一、重要的与次要的

俄罗斯的周边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这就使俄罗斯被迫、但也展示出一种全新的外交政策与外交实践。21世纪上半叶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促使莫斯科参与到世界秩序的演变进程中来，但莫斯科并没有给自己设立摧毁和改变世界秩序的目标。俄罗斯加入到决定自然能源价格的各种协议中，影响着距其相对较远的叙利亚、委内瑞拉或者是中非共和国。俄罗斯公开反对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规则 and 标准。

俄罗斯周边的形势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原因之一，是俄罗斯没有直接许多世界大国接壤，俄罗斯对其周边国际安全的影响力具有决定意义。一战前俄罗斯在西部与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接壤，在南部接壤的是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东部是中国。现在直接接壤的多民族国家只在东部有，虽然这里还有一个主权国家蒙古。俄罗斯西面的欧盟属于一种国际秩序，建于冷战后，俄罗斯没有参与其中，因其违逆俄罗斯的利益。欧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管控能力有限，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虽然对欧盟信誓旦旦，但看一下这两个国家的表现，就可以明了欧盟对其影响有限。

俄罗斯没有在周边建立帝国秩序，俄罗斯周边存在很多中小国家，其行为或多或少受到大国的影响——美国或者中国，在很多时候也包括欧盟。这就使俄罗斯经常去思考其对周边发生的事务承担责任的尺度问题。这样的思考必然触及的一个矛盾是——俄罗斯有在这个区域建立国际秩序的能力，但是没有建立的必要性。我们所注意到的俄罗斯周边政策的演变，完全反映了这种矛盾性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尝试。莫斯科在2020年关键性事件中的表现，为分析俄罗斯周边政策的发展走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策依然非常稳定。在此基础上曾有一种假设，即，在苏联废墟之上建立的一批新国家，是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的一个整体，在可以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联合在一起的理由中，地理空间是最有说服力、最合适的因素。但逐渐由基本的假设转向对具体问题的关注。并且俄罗斯觉得可以自给自足，这种思维的影响在不断增长。决定莫斯科行动反应的，不是周边的形势对俄罗斯治下的体系产生了怎样的挑战，而是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威胁着俄罗斯自身的国家安全。莫斯科由于拥有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因此对通过盟友解决此类问题的兴趣不大。作为一个核大国，在面对与其他大国冲突时，俄罗斯无法把一些军事能力微弱的国家，视为国家间冲突时的补充力量。与除了“核五国”以外的世界各国的关系中，俄罗斯自身就拥有足够充分的军事力量。

2020年秋冬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事件，对该国的国内发展非常重要。然而，在分析俄罗斯对原苏联空间政策的语境中，该事件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因为这并不具有鲜明的、能够影响欧亚地区国际政治的特点。而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不仅是莫斯科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的正式盟友，而且还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这两个国家在具有鲜明国际意义的事件中居于中心地位。苏联解体至今，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都曾是俄罗斯的军事盟友，并且从来没给莫斯科惹过大麻烦。现在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稳定和国际地位都成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形成的对莫斯科有利的状态正在改变。

因此，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局势的任何变化，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观察家们从俄罗斯立场产生影响的角度来解读。并且整体上，是从俄罗斯保证对周边国家控制的角度来理解。这指的是莫斯科对帝国经典行为的偏好——要在邻

国事务中起决定作用，目的是保证本国的安全，而本国的安全可能会受到敌对大国的渗透或者由于不可控的无序状态而遭遇威胁。但白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情况，对俄罗斯的重要性又不相同。如果说俄罗斯官方明确表达对白俄罗斯合法政府的支持，那么在南高加索地区的举动则有较大的差别。这使观察家们推断出，莫斯科不准备在南高加索参与到严重的冲突中去，并会因外界的压力而让步。

在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事件中，扮演敌对国家角色、干预俄罗斯周边事务的，不是处于世界第一梯队的大国，而是第二梯队的波兰和土耳其。两国综合实力大大逊色于俄罗斯，这一事实使这场辩论更具感情色彩。俄罗斯周边的国际局势似乎回归到17-18世纪的地缘政治现实，那时乌克兰已经分裂，实力还不足够强大的俄罗斯与波兰和奥斯曼帝国对抗。但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这两个大国中的一个被俄罗斯消灭，另一个被贬到俄罗斯对外政策中无关紧要的地位。如今，面对这两个邻国的欺诈行为，俄罗斯的反应不可避免地被看成是示弱的表现。并且这种软弱性，与俄罗斯领导人对莫斯科在全球舞台以及欧亚周边事务中起到决定作用的信心，截然相反。

俄罗斯对白俄罗斯事件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差别反应，明显体现了两个地区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不同重要性。莫斯科绝不允许北约在西线进行渗透，并且为此做好了采取坚决行动的准备。卢卡申科总统的声明和举动，曾不止一次让人怀疑他对俄罗斯的忠心。虽然白俄罗斯在他的治下从未对俄罗斯的利益进行过挑战，但其对西方国家的谄媚（多面性）难免引起俄方注意。

但这些因素并不能使俄罗斯不顾卢卡申科，让他独自承担来自西方邻国和本国反对派的压力。原因在于，俄罗斯很清楚，一旦卢卡申科的对手上台，非常可能会有怎样的外交政策倾向。波兰与立陶宛一道，都是白俄罗斯反对派的主要赞助人，是北约国家，是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国。华沙在此问题上的积极外交行动，不仅仅出于其自身的选择，而是体现和借助了西方多年来在原苏联空间内对俄罗斯施加的外力。白俄罗斯反对派的表现，是西方两个重要体系——北约和欧盟东扩的延续。现在这两个体系是俄罗斯主要对手，北约和欧盟对俄罗斯采取经济打压措施，还在俄罗斯周边进行军事演习。

在白俄罗斯领土上发生军事冲突，将会使俄罗斯与欧洲陷入那种不可避免的状态——如果事态继续升级，就可能导致全面的战争。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对莫斯科而言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而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形势则不够明朗。这两个彼此敌对的民族都对俄罗斯态度友好，在俄境内有大量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移民。但是亚美尼亚领导人最近两年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引起了莫斯科的困惑和不满。纳卡问题的国际语境与白俄罗斯的案例完全不同。阿塞拜疆的军事进攻，在外交层面上得到了土耳其的支持。土耳其虽然是北约成员国，但从其行为标准、雄心和诉求来说，已经不被美国列入其在欧洲的“正常盟友圈”。安卡拉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关系无关紧要，而与西方核实力紧随美国之后的法国间的关系，坦率而言是相当糟糕。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军事冲突在可控的范围内，不会急剧升级而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在叙利亚，俄土偶尔会发生冲突，但总能通过外交途径得到解决。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卡拉巴赫事件对俄罗斯而言，并不是生存大事，而是外交互动的问题。互动的结果，或许是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工作的终结。这一国际小组的形式出现在1992年，在欧安组织的框架内，美、法及其他国家参与其中——参与国除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冲突的直接对象国以外，其他国家现在都是北约或者欧盟的成员国。假如明斯克小组不复存在，莫斯科未必有理由为此感到遗憾——它是在俄罗斯极度虚弱时代的一个外交产物。这种局面也将符合土耳其的利益，该国对莫斯科来说是个合适的伙伴。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两种情况下，决定俄罗斯行动的直接因素，是事态的发展将对俄欧关系的力量平衡产生怎样的影响。俄罗斯缩减了的综合能力决定着对外部挑战的排序策略，因此，俄罗斯会将其中的一些挑战看为事关生存的大事，而另一些则是外交博弈。由某一个欧洲大国对白俄罗斯危机进行管控，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为紧随其后的，是对俄罗斯而言在总体平衡上的不利变化。与土耳其合作是可以接受的，不会引起类似的情况，还能关闭美欧影响原苏联空间的一个渠道。俄罗斯卸下了对周边国家事务负完全责任的义务，逐渐适应着周边地区日益明显的无序状态，但却保留着掌控周边的帝国势能。

而且，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我们不能仍然抱着以前的那种心态来认定，即帝国的实力应当以直接控制独立国家的方式来得到加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和竞争状态依然是不变的，但对采取决策的具体要求是可以改变的。这些要求越来越多地与不断加强的技术因素相关联。以前从首都到边境的距离，意味着调动部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现在则完全不是这种情况了。

一些欧洲大国与美国还力求保留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帝国式管控。但是除了极个别的情况，这种管控只能通过操纵国际经济制度来实现。美国的全球影响当然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它在世界很多地区还有驻军，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准备充当相关国家的守卫者角色。常有这样的讨论——即便是为了关系最紧密的盟友，美国可以承担多大的军事风险？在欧洲各国中，只有法国在非洲的一些前殖民地还有些驻军。以马里事件为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力量可以在局部地区成功缓解战术上的威胁因素。但在很多情况下，美、法两个大国只能调控本国的周边事务——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规制，法国则是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内发挥影响。对于较远地区影响力的发挥，要么需凭借先进的技术力量和军事部署（美国），要么只能设定有限的目标和任务（法国和英国）。

国际环境波动性的不断增强，使得大国也需要执行更为谨慎和克制的政策，特别是在本国对外的义务承诺方面。俄罗斯也不例外。未必能够去期待，俄罗斯在当今条件下会保留在遥远历史时期的帝国行为特点。俄罗斯与奥地利、英国、土耳其或法国不同，俄罗斯守住了领土扩张时期获得的土地——从乌拉尔到太平洋，这些领土是帝国时期保留下来唯一能带给俄罗斯益处而不是损失的遗产，从波罗的海到帕米尔所获得的土地也有同样的价值。只有当周边相关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俄罗斯的地缘安全关系重大时，俄罗斯才真正愿意履行其维护安全的义务。在原苏联空间内，这就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二、结盟是非必要的奢侈品

大国拒绝履行必需范围以外的义务，这是对世界秩序概念本身的新挑

战。国际关系学上的大国霸权，是克服国际体系无序状态的一种途径。现在极为迫切的问题是，当理论上可以觊觎霸权的大国已经不需要秩序来保障自身的安全与发展时，秩序是否还有可能存在？国际秩序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由于有自身明确的优先事务，大国越来越多地节约力量，就像俄罗斯现在所做的一切一样，那么对以某种形式的“大国协调”，来缓解不断增强的无序状态之希望，则越来越渺茫。

不管是否令人满意，事实是，一个参与全球核俱乐部的大国，不可能有盟友。联合国安理会五大拥核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由五国的军事实力所决定。按照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观点，五大国的军事优势地位，促成了另一种永远的“冷战”态势——在五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这场“战争”可以以各种方式进行，有时的表现形式甚至是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即便如此，没有一个大会真正把伙伴的利益与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捆绑。因此，当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与美国正式盟友的主权有矛盾时，美国对其盟友利益的保护举措并不是非常明显，抑或俄罗斯没有将自己盟友的利益视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我们都不必表示惊讶。特别是，当事态不是关于盟友的生存问题，而是其能力的变化消长时，大国的选择更会如此。在国际关系中，较强的国家不会为较弱国家的利益而斗争。例外的情况是，当较强国家的生存问题直接取决于其小伙伴的利益受到怎样的保护，这个时候强国会出手加以保护。正如我们所见，此种情况只能由地理位置来决定，比如大国在邻国有重要的战略部署。除此之外，即便较弱国家对临近大国保持忠诚，他们也很难证明自身对于大国的价值。

特别是谈到与核大国的关系时，考虑到五国中实力最弱的英国和法国都可以独立解决生存问题，要想让一流核大国相信盟友的利益对其而言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是不容易的。俄罗斯正是处于这种状态，在评判俄罗斯当前周边局势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一点。

国际关系史中鲜有这样的案例——我们可以称之为盟友关系。特别是在谈到实力大不相同的国家间关系的时候。可以将英国、苏联、美国在二战时期的合作视为盟友关系的理想案例：拥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实力，拥有共同的目标，即消灭执行侵略性政策的德国，这些保证了同盟关系在数年内的稳定。

美国核武器的制造，终结了这一联盟，迅速地、不可逆地造成了力量失衡，并且已经战胜了共同的敌人。1813年打败法国的大国联盟也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期间，俄罗斯、普鲁士、英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分歧如此之大，因此不得不将法国重新归入到大国之列，以求达到力量平衡。

美国、英国以及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盟友关系，建立在华盛顿军事绝对优势的基础之上。正因如此，北大西洋联盟从建立之日起的中心问题就是，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为了保护盟友的利益来承担风险。英国和法国在1956年、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中、英国在与阿根廷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冲突中，都充分体会到，其盟主（美国）只会在触及自身直接利益的地方施以援手。

只有在对于保障自身利益必不可少的时候，大国才会创建正式的同盟关系机制。例如在出现军事冲突时，盟国关系有助于军事力量的部署和资源的分配。但是随着威胁降低或者自身技术能力提升，盟友的价值就变得多余。这样，小伙伴是否有权在原则上对盟友关系有所期许呢？是的，是有权的，如果国际环境对其有利，并且大国由于自身利益而需要其所在地区的话。例如，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的驻军，在五年期满（为了完成人道主义使命而需要的时间）后的前景，将完全取决于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俄罗斯在该地区内参与两国事务，具有道义上的、而不是自私的特点，关于这一点，俄罗斯总统在2020年瓦尔代会议期间同与会者见面，提及不能重复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时，有清晰的阐释。

有人从理论上简单地认为，俄罗斯和原苏联空间内其他国家共同建立的多边合作关系，主要是俄罗斯国际政策软弱性或者强大的外在因素作用的产物。虽然毫无疑问的是，在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正是这种逻辑，但是需要注意，欧亚经济联盟的建立（2015年），是在莫斯科已经拥有了重回大国政治所必需的条件之后。

有些人赞同，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而是有利的。他们的论证，在这里有令人信服的支撑。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俄罗斯在决议的通过机制上，与其他实力无法与之相匹配的国家分享着同样的权利；俄罗斯的开支大大减少，因为在这里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是共同解决的。

认为俄罗斯对保留境外义务有十分的兴趣，这种观点荒谬至极。俄罗斯在这方面的投入并不比其他大国更高，并且在各地有着越来越明显减弱的趋势。我们不能说，与哪个第三国结盟，对俄罗斯、中国或美国的生存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世界和平越来越多地不是维系于复杂的制度体系，而是取决于各国对关键军事决策的理性认识。

在国际机构中通过决议时，美国或欧洲动员盟友的能力，在现实中意义不大。如果这些决议是反对国际社会弱小成员的话，那么最坏的情况是这些弱小国家依旧像原来一样处于劣势。而如果是反对强国，比如中国或俄罗斯，结果就不会顺利，也没有决定性意义，这改变不了中俄。莫斯科和北京没有美国含义上之盟友的事实，在国际政治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中，并不会因此缺失什么。但如果中俄之间建立正式的联盟，国际体系就会处于革命的边缘，因为这种实力相当的国家建立联盟，势必需要确定共同的目标和敌人。

谈及大国与力量不匹配国家间结盟的现象，从概念上讲有两个复杂问题。一是，这种关系是不需要的；二是，也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但如果我们在谈结盟时，实际上指的是不平等的关系状态，则有必要使用其他术语，而不是“盟友”。就像一位备受尊敬的亚美尼亚同事在2020年10月初指出的，“认为俄罗斯应当替亚美尼亚的利益而战，这是一种错觉，事实是亚美尼亚应当为俄罗斯的利益而争”。也就是说，一个基于理性评估的国家，应该有的行为方式和思考逻辑是，其自身在大国利益体系中的位置，不仅是主观自我评价的结果，而且要力求反映客观事实。

三、克制的美德

大国正在失去履行多余义务的兴趣，个别欧洲强国是最后的例外，但其有限的本身，也说明规避义务的必要性，如果不能这么明说的话，也该实际这么做。这一过程是客观的，并且没有根据认为是可逆的。

最近几年我们多次讨论过（有充分的根据），现今条件下中小国家可以采取多维度的政策。原苏联地域空间内的大多数国家，还有例如东南亚国家，非常正式地声明，存在大国赋予其的可能性，使其可以合理、自由地选择外

交政策，而不必选边站。与此同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国对外政策的灵活性不断提升，大国对结盟的需求日益降低，也越来越少地愿意为建立全球或区域层面的国际秩序而投入，不愿意在不触及自身利益的地方冒险。大国无论采取怎样的行为，其底气和物质基础都要比其他国家坚实得多。

苏联安全共同体于1991年解体，随后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表现，对于新独立国家来说是非常自然的，这都使俄罗斯比欧美国家可以更好地适应这个世界——国家对创建这个国家的公民所承担的义务，与任何一种道德理念相比，都占有优先地位。2020年，技术能力以及灵活吸引特定条件下的盟友，都使得俄罗斯在履行国家安全责任时，并不依赖于国际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对周边国家情况的关注度降低，相反，注意力会更集中。这样做的目的，是推动周边国家在安全与发展问题上，慎重地采取自身的行动，同时要考虑到俄罗斯的利益。

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向新政策的过渡，并非一蹴而就。2014-2015年的乌克兰危机，并没有成为苏联复兴的开端，虽然那时俄罗斯有这样的军事实力。当时莫斯科多次提过的“俄罗斯世界”概念，引发了这样的担忧——俄罗斯有意在周边进行国际政治变革。但克里米亚的回归、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同情，都仅仅是维护俄罗斯自身安全的措施，而不是建立新安全空间的铺垫。假如俄罗斯在2014年考虑的是乌克兰民众的未来，那么可以通过军事途径，在几周内解决基辅二月政变的问题。尽管俄罗斯现在仍与乌克兰有着相当紧密的经济和人文联系，但这些关系的结构功能，已经不再是支持共同的发展空间，而是为了现实利益。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莫斯科未来必须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其目标也未必是利他的。

大约也就是在那时（乌克兰危机之际），俄罗斯意识到，对其而言，中国对中亚的关注并不是大问题。那些在2014年期待莫斯科与北京在中亚地区发生碰撞和竞争的人，他们的根据是，继续保持周边地区与世界隔绝，依然是俄罗斯主要的政策手段。或许那时就值得考虑的是，对“一带一路”倡议友好的回应，说明俄罗斯的行为逻辑悄然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对中国倡议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莫斯科在与西方关系严重恶化的背景下，要在中亚建立“和平之家”的意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很轻易地就对中国

在中亚地区的想法表示欢迎。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七年里中国没能克服自身限制因素以及地区特点，没有在那里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岗位。

2020年土耳其在外高加索地区力量平衡的变化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周边的冲突，是苏联解体以后最古老、规模较大的民族冲突。在土耳其新对外政策的语境之下，显然其动机是使冲突的解决朝着有利于阿塞拜疆发展，这也使莫斯科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并使整体局势的走向明朗化。此处新的国际环境对俄罗斯来说，相当舒适和有利，俄罗斯在卡拉巴赫地区驻扎了维和部队。因此，在现今国际政治中，没有一个政治家像埃尔多安那样好地为俄罗斯的利益而服务。土耳其仍然是北约成员国（也是俄罗斯的近邻），但被纳入到俄罗斯权力政治的轨道上来了。

俄罗斯的这一系列决定让人们看到，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其关注的并不是邻国本身，而是在更广泛的全球背景下，评估邻国问题对自身的威胁和机会。俄罗斯的邻国因为实力有限，并且还受外部力量的影响，无法参与解决俄罗斯的外交任务。但白俄罗斯依然是俄方关注的焦点，因为其一旦从属于北约和欧盟，将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欧洲和平。

南高加索地区是一个广泛的国际合作区域，哪些国家能够参与进来，就看其对俄罗斯利益的态度。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只是因为罗马尼亚在北约战略计划中的地位才具有一定意义，没有自身的原因。中亚是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地区，目的是要在那里避免西方国家和激进伊斯兰的存在。这两项任务，就像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向俄罗斯输出劳动力一样，北京完全赞同。非常不确定的是欧亚经济一体化的命运。欧亚经济一体化未来最重要的功能，是不重蹈欧洲的覆辙（用经济手段建立区域安全共同体），而是要通过技术合作来促进跨境贸易。

当然，前面已经提到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的优先地图中占有特别的地位，仅仅是因为这两国从地理上看，紧邻俄罗斯领土上的主要“权力中心”。但完成维护俄罗斯免受西方突然袭击、保障俄罗斯欧洲部分与远东地区自由交流的任务，不受莫斯科与这些空间内政治实体之间关系的限制。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俄罗斯在军事政治领域内采取最坚决的战术行动，那么其目的是快速实现和平，而不是为了引发大规模战争。

对于俄罗斯而言，关键的不是周边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或者是与俄罗斯的关系模式，而是其实际行动。对此，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进程的参与者们心知肚明。在那里的每一次政治动荡之后，新政府都会确认并善意表达对俄罗斯的优先关注。但同时，在新的情况下，俄罗斯未必会拒绝向一些吉国人士采取庇护或发展“特别关系”，一旦形势发展对俄罗斯利益造成影响，莫斯科未必会保证不加以干涉。

（翻译 班婕，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教师）

【Abstract】 Since 2020, drastic changes occurred in Russia's neighboring areas. Turmoil in Belarus, Kyrgyzstan, and Nagorno-Karabakh has aroused concerns on how Russia will respond and act.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Russia still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its neighboring areas but with different focus.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Belarus and Kazakhstan determines their security and orientation, which directly relates to Russia's core interests; while the developments of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not of the same significance for Russia. Actually, in the wake of the Ukraine crisis, Russia's diplomacy and actions in the neighboring areas have changed. It is not an imperial intervention in neighboring affairs, but a selective and different approach based on its own interests. The only goal and priority of Russia in balancing its power and interest in handling neighboring affairs is to secure its national security instead of establishing sort of order.

【Key Words】 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Russia's Neighbors, Russian Diplomacy, Eurasian Regional Order

【Аннотация】 С 2020 года ситуация вокруг России претерпела рез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а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ь в Беларуси,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и Нагорном Карабахе заставила задуматься о том, как Россия отреагирует и что учтёт. Автор статьи отмечает, что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уделяет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прилегающим территориям, но акценты отличаютс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Беларус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определя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я этих двух стран и напрямую связано с основ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я развития других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 и регионов не имеет такого же значения для России. Автор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посл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и её действия на прилегающи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изменились. Это не имперское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в периферийные дела, а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е и иное участие, основанное на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интересах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звешивает свои нынешние силы и интересы, и имеет только одну цель и приоритет в решении периферийных дел — обеспечение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 не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акого-то порядка в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ах.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соседние с Россией страны,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新发展格局与国别区域研究**国别区域研究的内涵、争论与趋势**

赵可金*

【内容提要】国别区域研究是关于一国域外世界学术知识体系的总和。然而，关于国别区域研究内涵的界定，在学界却一直充满争论。事实上，作为对域外国别和地区进行的知识体系建构，国别区域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域内和域外区分的地理属性、学理和实践并重的意义属性、人文与社会学科融合的方法属性的统一体，具有明显的跨文化、跨学科、跨区域的特征，本质上是一门交叉学科。通过分析学界在科学主义与事业主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先验研究与经验研究、全球主义与地区主义等方面的争论，发现国别区域研究存在着全球化、在地化、学科化和部落化四个发展趋势。

【关键词】国别区域研究 国别区域研究学科特征 国别区域研究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D8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3-0121(25)

作为一门学问，国别区域研究（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是关于一国对其外部世界学术知识体系的总和。近代以来，当整个世界被民族国家化之后，关于一国国内的知识建构被纳入明确的学科体系，比如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门类；对于一国内部问题的研究往往会根据问题的性质归入某一明确的学科科目之下，比如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被视为经济学研究。对于一国之外经济问题的探讨则往往不被视为经济学研究，而是将其与某一国别区域联系起来，被称为国别区域研究。由于对一国外部的研究往往涵盖了语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

*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社会、文化、人类、地理等诸多学科，很难被纳入某一学科之下，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因此往往被宽泛地称为国别区域研究。国别区域研究尤其以语言文化、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为主要学科支柱。

从其学术使命来看，国别区域研究以获得对某一国别区域的地方性知识为宗旨，并不以获取普遍性知识为目标。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国家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对于同一国别区域的情况往往有着多样化的解读，带有不同的国家视角和国家特色。在多数情况下，国别区域研究承担着一个国家形形色色的对外战略和实用目的，因此很多成果停留在描述性研究的层次，被批评为缺乏学理研究的基础。国别区域研究的学术社群往往与各个学科社群格格不入，且互有批评和优势，当然也各有其生存之道。近代以来，受欧美发达国家殖民主义和海外扩张的影响，国别区域研究带有很强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从而遭受了不少学者的鞭挞和指责，无论是基于人文学科的努力，还是基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概莫能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大循环中来，也面临着众多全球性问题，各国都纷纷重视推动全球研究背景下的国别区域研究，且相互对话和深度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国别区域研究社群，也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学者和影响巨大的学术成果。毫无疑问，国别区域研究日益成为学科发展百花园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一、国别区域研究的内涵

作为一门学问，首先必须正名，名正则言顺。迄今为止，国别区域研究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称呼，比如地区研究、区域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国别区域研究、国际区域学、中国周边学、全球学等。最初，国别区域研究来自于英文中的“area studies”，泛指对西方之外的非西方地区研究，既有战略的考虑，也有文化的内涵。但是，在中文语境中，地区和区域研究范围比较模糊，有国家之下的地区（比如美东地区、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等），也有国家之上的地区（比如东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中东地区、中东欧地区、

拉美地区等),但并不突出国家的意义。在民族国家时代确立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区域都已经实现了国家化,国家成为最具文化和战略意义的地理区域,有着明确的疆域和主权,在国际社会较少争议,因此突出国别有利于人们对于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知识共享。而把一些在地区事务上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作为国别研究对象,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除了大国之外,很多地区还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地区化趋势和自上而下的地区主义合作浪潮,形成了形式多样的以区域和次区域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地区合作框架,对所在地区各项事务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比如欧盟、东盟、非盟、南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欧亚经济联盟、集安组织、拉美共同市场、拉共体等,还有一些范围更小的区域合作形式比如澜湄合作机制等。这些区域国际组织和地区合作框架,在构建地区认同、激励地区合作与塑造地区偏好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会促成地区文明的融合。因此,包括阿米塔夫·阿查亚、中国云南大学副校长李晨阳在内的一些学者强调,应当把区域研究作为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当然,在提及区域合作机制时,区域研究更强调把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区域内部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现象,通常被置于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研究领域,而不被列为国别区域研究的范畴。这是国别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外交学之间的研究边界和学术分工。

在中文语境下,“国别”或“外国”、“区域”或“地区”之类的概念有一定的弹性,范围可大可小。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社会各界,在不同情境下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有着多重含义,并不一定专指中国以外的知识建构。当下对国别区域研究的界定,完全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尤其是中国教育部近年来积极推动国别区域研究基地所采取的称呼,在英文上被翻译成“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据李晨阳的考察,很多学校和研究机构在名称使用上存在差异,反映了对不同侧重点的强调。比如清华大学成立国际与地区研究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2017年9月20

^①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Routledge, 2001; 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143-155页。

日), 将国际放到地区前面以突出国别研究的重要性; 北京大学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2018 年 4 月 12 日), 将区域放在国别前面以突出区域研究的重要性。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国际区域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蕴岭研究员)、“中国周边学”(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和“全球学”(暨南大学庄礼伟教授)等概念, 分别突出其学科性、周边地区对中国的首要性和全覆盖性等。^①

在国际学界, 国别区域研究的概念具有多重含义。比如 2014 年英国政府启动的“优秀研究框架”下的区域研究评审委员会, 在申报指南中将国别区域研究定义为: “对世界上所有的区域以及在区域中居住或与之相关的群体的研究”。^②根据这一定义, 国别区域研究是一个变动的学术领域, 涵盖但又不限于: 非洲研究, 美国和英语国家研究(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及北美殖民地), 亚洲研究(包括中亚、含中国的东北亚、南亚、东南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研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太平洋地区研究, 欧洲研究(包括欧盟、俄罗斯和东欧及后苏联空间), 中东研究(包括以色列和伊斯兰世界)以及这些地区和区域内种族与更广泛世界的互动, 包括犹太人、穆斯林和其他移民族群。^③从方法论上看, 该机构认为对这些区域的历史、语言、文化、文学、宗教、媒体、社会、经济、人文地理、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以及区域间和全球化研究, 均属于国别区域研究的范畴。美国学者阿兰·坦斯曼(Alan Tansman)对国别区域研究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定义: 这是一种在跨学科视野下认识、分析、诠释外国文化的事业。^④大卫·桑顿(David Szanton)认为, “区域研究”是涵盖了不同领域和研究活动的学术家族, 包括高强度的语言学习, 用当地语言深入实地研究, 密切关注当地的历史、观点、材料和诠释, 紧紧依靠详细的观察、测试、阐释、批判、扎根理论, 超越人文学

① 李晨阳: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

②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Council for Wales, December, 2014, <https://www.ref.ac.uk/2014/>

③ Ibid.

④ A. Tansman, “Japanese Studies: The Intangible Act of Translation”,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科和社会科学的界限进行学科对话等。^①很多学者在开展国别区域研究的时候，往往会聚焦一个或者几个相关国家，努力将其与更大的范围（比如所在的大洲）结合起来，以获得对该国别区域的整体性认知。英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和艺术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认为，国别区域研究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以国别为对象的区域研究（比如日本研究）；二是以全球化为主题的区域研究（比如不同区域间的跨学科和比较研究）；三是以重要问题为导向的区域研究（比如恐怖主义、民主等）。^②尽管学界对国别区域研究的理解各异，但均强调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地域性、整体性、学科性等特点，区别在于各自关注的重点不同。

综合国内外学界对国别区域的理解，可以将这一学问的名称确定为国别区域研究（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它是指对某一域外特定国家/联邦区域、地理区域和文化区域进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的知识体系。典型的国别区域研究往往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语言、地理、文学等相关学科。国别区域研究还包括对特定地区海外侨民和移民的研究。作为对域外国别和地区进行的知识体系建构，国别区域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域内和域外区分的地理属性、学理和实践并重的意义属性、人文与社会学科融合的方法属性，这三种属性的统一体。

从国别区域研究的定义出发，不难发现这一研究具有明显的跨文化、跨学科、跨区域的特征，本质上是一门交叉学科。阿兰·坦斯曼特别强调国别区域研究所具有的翻译特征。他说，国别区域研究“是一项通过多学科棱镜来寻求认知、分析和解释外部文化的事业。”^③尽管不少学者怀揣追求科学化的梦想，但国别区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这一研究更多属于不同文化转译的解释学——解释彼此之间为什么在同一议题上存在着迥乎不同的看法，解释在处理彼此关系时为什么必须要尊重和包容国别与地区的多样性

①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② J. S. Goodman, “Shielding corporate interests from public dissent: An examination of the undesirability and unconstitutionality of eco-terrorism legisl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2008, Vol.16, No.2, p.823.

③ A. Tansman, “Japanese Studies: The Intangible Act of Translation”.

等。因此，重视国别区域研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标配，也是走上世界舞台的“必修课”。入乡随俗，入国问禁。每一个行走世界舞台上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必须对不同国别区域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化规范、公共政策、法律体系、社会关系等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否则，每一步都会遭遇陷阱，麻烦不断。一个国家区域研究的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战略布局的体现，反之，区域研究也能促进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具体来说，国别区域研究有三个本质特征：

一是跨地域研究。国别区域研究是一个国家对其域外知识的建构，本质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域外知识探求的学术和战略意图，既有从一国出发经略疆土的地缘战略考虑，也有不同地域之间友好交往的外交目的，跨地域性是国别区域研究的首要特征。因此，国别区域研究确立了明确的观察角度和观察方位；不仅确立了明确的地理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也设定了“谁研究”的基本视角和基本观察方位。

“谁研究？”为国别区域研究设定了出发点和判断标准，也赋予其特殊的研究偏好。国别区域研究体现着某种国家战略意图，致力于满足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战略需要。不管以国家为分析单位，还是以特定地理和文化区域为单位，国别区域研究体现着研究者的偏好和意图。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是不同的，欧洲的非洲研究与中国的非洲研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不同视角的国别区域研究也能从侧面折射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借此比较不同国家对特定国别区域的战略走向。因此，国别区域研究是一门行走世界田野上的经世致用之学。这一学问重视田野调查，重视文献考证，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国家的域外知识体系，增进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知。

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上不同国别区域已经日益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从不同视角观察的特定国别和区域研究越来越重合。除了仍然存在各自视角的差异外，重叠部分逐渐增多，国别区域研究正在被纳入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之中，国家治理与地区治理本身也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跨文化研究。表面上看，国别区域研究类似于一种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博物学，几乎涉及某一国别区域的所有内容。实际上并非如此。国别区域研究本质上重在进行一种跨文化比较研究，这一研究致力于解决局外人针对该国别区域提出的社会和文化相关假定、意义、结构、动力等问题，同时也为其创造了一个通过比较研究来反思自身文化和社会的机会。文化是打开国别区域研究大门的真正锁钥，通过比较文化和比较文明的渠道，国别区域研究找到了通往域外世界的康庄大道。

显然，从意义属性来看，国别区域研究既是一项致力于解释特定国别区域现象的学理研究，也是一项国家推动与特定国别和区域关系互动的实践研究。国别区域研究承担着学理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双重使命，设定了“为什么研究”的意义路线。在国别区域研究社群中，有的学者倾向于以特定国别区域为案例，检验所谓的普遍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进而发展和修正理论。有的学者则倾向于锁定特定国别区域进行精雕细琢的调查研究，进而发现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世界。还有的学者从纯粹实用的角度出发，为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智库、媒体等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更多进行政策性、实践性和操作性问题的研究，主要目的是为了现实的发展需要。不管采取哪一种研究路线，均可被视为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途径，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不同研究路线会百川入海，共同汇入国别区域研究的汪洋大海。

因此，决定国别区域研究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采取文学、历史、哲学的先验人文主义视角，也不在于是否贯彻社会科学的经验路线，而在于找到阐释国别区域文化意义的纹理脉络。举例来说，中国的拉美研究应该是什么？与美国的拉美研究有什么不同？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期待取得什么样的收获？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拉美地区的客观现实，更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因此，国别区域研究是一面镜子，通过观照区域国别实情，间接镜鉴自身前进的方向。

三是跨学科研究。国别区域研究简而言之就是对其他国家、域外地区做研究。无论是早期英法等殖民国家的“东方学”“埃及学”“斯拉夫学”之类的研究，还是冷战期间美苏推动的区域研究，其共同特征就是跨学科性：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而是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努力，比如民族学、人类

学、宗教学、语言学、博物学等。典型的例子是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即费正清中心，二者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做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学术基地，成果涉及许多领域，“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开辟了一个新‘学科’，而在于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甚至理工医农）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指地理对象，即某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撑，共同对这个国家或地区做研究，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达到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学术基础的目的。”^①因此，如果要尝试建立新学科的话，国别区域研究应该是一个“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学科。多学科研究对于国别区域研究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真正抓住和解释另一个社会和文化真谛的全部画面。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加快，中国海外资产已经超过6万亿美元，每年出入境人数超过1.7亿人次，中国大学、智库、媒体和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客观上都对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同时，提高服务社会需求的能力，也是国别区域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使命。

二、关于国别区域研究的争论

国别区域研究是一个国家的域外知识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国家事业。然而，自国别区域研究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无休止的争论。在学术建制上，国别区域研究在高校一般存在两种类型：一是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科系所。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南亚研究系、普林斯顿大学的中东研究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语言和文学系以及中国众多外语类院校的二级学院和系所。这些学科系所往往提供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有时也会提供某一特定地区的政治学）方面的本科专业学位，历史和文学方面的研究生学位。二是国别区

^① 钱乘旦：“建设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域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项目。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别区域研究机构以非学科化的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项目的方式存在更为有效。美国目前有数百家专门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机构，中国也建立了数百家国别区域研究基地，有的专门建立了国别与区域研究院等，它们通常只开设课程或者举办学术活动、短期培训和交流活动，不提供学位教育。同时，这些机构一般不设立太多专任教师，而是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专业院系聘请兼职教师或者吸引研究生参与，举办一系列多学科的讲座、工作坊、会议和研究项目。通常情况下，上述两种类型的国别区域研究机构之间可以相安无事，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会发生争论，在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科定位、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等方面意见不一。

（一）科学主义与事业主义的争论

国别区域研究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项事业？这是学界始终争论不休的问题。事实上，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项事业。说是一门科学，是指它意味着一个国家对外知识的建构，无论此种知识是基于社会科学的评估，还是基于人文学科的感悟，都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国家对国别区域的认知体系；这些知识是关于该国别区域内在客观规律和法则的集中，任何违背这一规律和法则的做法都将在实践中碰壁。说是一项事业，是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与特定国别区域处理相互关系的战略需要、国家利益、社会需求以及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国别区域研究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走向，只要这一国家目标没有达到，国别区域研究就始终是重要的议程。

长期以来，美国国别区域研究中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学者经常批评国别区域研究仅仅是一项政治运动，服务于美国的冷战战略和“了解敌人”的战略意图。根据这一观点，在冷战期间，从事国别区域研究最直接的目的是服务应对共产主义世界及其威胁，很多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承担着国家的战略使命。因此，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国别区域研究就变得过时了，关于国别区域研究的兴趣也急剧下降。此种批评声音在政治学中最容易听到。还有一些左翼学者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活动，反对将国别区域研究作为支持美国霸权的一部分，认为这与世界各地的进步变化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这些批评是不准确的。国别区域研究最初的确有服务冷战和国家战略意图的

因素，但其学理研究及成果也是不可忽视的。美国对其他国别区域的研究在观点上也是非常多样的，并没有完全按照冷战进行政治画线；即便是冷战结束后，一些后社会主义转型、市民社会、族群复兴和文化变革等主题，也一直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

科学主义和事业主义之间的争论，说到底是如何处理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尽管两者存在着竞争性矛盾，但在很多时候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不可偏废，需要将决策咨询研究、基础学理研究结合起来。尽管对国别区域研究持纯学理研究观点的人始终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也推动了国别区域研究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快速成长，但完全脱离国家战略事业需要和社会各界需求轨道的国别区域研究是不存在的。很多人在考虑国别区域研究的时候，也在争论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的意义，包括课程体系中是否具有足够的国际和外语设置、学习内容是否准确、应该设置在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等。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散居人群和移民在国别区域研究中的角色和兴趣、多元性和多文化主义、除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之外的其他外语研究的重要性等。很多人承认，国别区域研究与国家战略事业是不可分离的。也有一种强劲的潮流认为，国别区域研究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政治学、经济学研究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模型理论。这些人质疑，如果仅凭模型就可以解释某一国家，还需要继续关注其语言、文化、翻译、历史以及政治经济问题吗？因此，必须承认国别区域研究的战略内涵，即，并不是所有国家均有必要发展国别区域研究，一些中小国家即便有开展国别区域研究的意图，但也不一定具备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条件。

（二）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论

国别区域研究是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还是以理解多样性和特殊性为目标，也是引发学界争论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国别区域研究仅仅是普遍理论的“试验田”，之所以聚焦某一国别和地区研究，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检验已有理论的适用性，根本目的仍然是验证理论和发展理论。对这些学者来说，国别区域研究有着坚实的知识内核和深厚的学术机理，“在一个具有反智传统、基础研究不断受质疑和攻讦的国家，保有和扩张制度化的国际知识，

能够对以欧美为中心的美国社会知识施加桑顿所说的重大的‘去偏狭化’（deparochialization）和‘去想当然化’（denaturalization）改造”。^①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国别区域研究之所以单独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主要是因为根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理论。国别和区域充满着多样性，所有的理论发现都是特定情境下的产物，反映着局部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在这些学者看来，任何国别区域研究都是带有偏见的。比如欧美发达国家的国别区域研究，过于吸纳带有政治偏见且未加批评的分类、视角、承诺乃至殖民主义传统，甚至继承了西方国家致力于维持和扩张霸权控制的传统。对这一倾向提出严厉批评的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他在1978年提出了“东方主义”的概念，认为西方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欧美中心主义传统。一方面，国别区域研究学者没有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其所经历的社会文化生活被来自外部的视角和知识所建构、分析和批评；另一方面，国别区域研究被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政治偏见所主导，对形形色色的普遍主义理论比如新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等缺乏免疫力。^②的确，国别区域研究存在着学术殖民的现象，一些国别区域的相关研究缺乏学术自主性，很多研究摆脱不了其政治背景和政治承诺的影响，尤其是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其在研究日程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也是不容低估的。

近年来，国别区域研究围绕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争论热度不减。在欧美发达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别区域研究服务冷战的战略需要下降。当长期负责筹集和管理国别区域研究资金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国高等教育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开始调整计划并关闭其国别区域研究委员会的时候，不少学者认为，国别区域研究的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以往三十多年时间内寻求建立的国别区域教学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强调跨学科性质的改革方案，意味着国别区域研究需要新一代的结构体系。社会各界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支持也开始调整，更多关注跨区域的题目比如“发展和民主”等。越来越多的国

① 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48.

② E.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1978.

别区域研究机构和学者更认同其学科的归属感。

步入 21 世纪以来，这些争论有着更强的学科和学科内次领域的特征，即便是强调理论研究，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比如，由于现代化理论和发
展经济学的推动，经济学家曾经是国别区域研究中的引领群体，但随着定量
研究和形式模型的普及，导致经济学家开始从国别区域研究中隐退，国别区
域研究逐渐为文化、历史和制度研究学者所主导。经济学家对国别区域研究
不再保持浓厚的兴趣，因为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数据不足以支撑那些复杂的模
型和定量分析。相比之下，一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从事国别区域研究时
开始接受理性行动理论和形式模型理论。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则
在重视情境化研究方面保持了极强的学术定力。人文、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研
究者尽管立场不一，但却是在国别区域研究方面争论最活跃的群体。不过，
对国别区域研究最强烈的抵制来自于从事美国研究的区域问题专家。这些人
关注美国且将之作为一个天然的分析单位，认为美国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根本不需要考虑其他国别区域研究的多样性。这一股学术力量仍然势
力强大。

（三）先验研究与经验研究的争论

长期以来，先验研究和经验研究也是国别区域研究的一个主要争论，而
且这一争论一直扩散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从柏拉图强调先验研究与亚
里士多德强调经验研究开始，先验与经验之争就贯穿着整个学术发展史。近
代以来，从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科学开始，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一
大批社会思想家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成为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
重要动力。

在国别区域研究中，也一直存在着先验逻辑中心主义与经验实证研究
之间的巨大张力。强调先验研究的学者恪守逻辑中心主义的传统，在从事
国别区域研究时更强调描述性研究和演绎分析，更看重国别区域现象背后的
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这与主张通则式理论研究的社会科学路线是相反的。
迄今为止，国别区域研究被人诟病的最大问题是过于强调描述性研究，过于
看重对某些材料的先验推理和文化阐释，缺乏知识上的严密性和完整的理论
基础，难以称得上是一门独立学科。为了克服国别区域研究存在的类似问题，

美国国别区域研究一度重视使用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技术来收集经验数据以供社会科学学者分析，试图提出一些国别区域研究的理论模式，从而开启了注重经验研究的路线。^①经验研究强调对国别区域的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理论建模等定量研究，既重视对一国自身不同发展时期的历时性比较分析，也重视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共时性比较分析，试图揭示出国别区域内在的某些客观规律或理论认识。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竭力将先验理论与经验分析结合起来，走中层理论的路线，弥合两者之间存在的鸿沟，强调把国别区域研究纳入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研究框架之中，试图借助已有的二级学科框架为国别区域研究提供强大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根基。比如杜克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系主任默克斯（G. Merkkx）就提出将国别区域研究纳入比较政治学的框架之中，强调对特定变量（在跨国相互作用中）的研究。^②不过，总体来看，重视国别区域研究中层理论建设的努力成效并不大，这一工作非但没有带来国别区域研究的改善，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分歧。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大量原先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学者重新回归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这样的母学科麾下，国别区域研究中始终存在着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深刻矛盾。当然，这一矛盾也并非全然是消极的，也有学者认为此种矛盾恰恰是国别区域研究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和潜力的最大来源”。^③

（四）全球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争论

国别区域研究还有一个无法摆脱的争论，就是全球性与区域性的争论，这是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内在矛盾的反映。事实上，尽管国别和区域可以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来进行研究，但它们从根本上说都是人们主观建构的产物，是“想象的共同体”，在一些国家眼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不同程度

① R. A. Bates, R. J. Buck, E. Riccomagno, et al.,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observation for large system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B (Methodological)*, 1996, Vol.58, No.1, pp.77-94.

② H. De Wit, G. Merkkx,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12, pp.43-59.

③ A. Tansman, “Japanese Studies: The Intangible Act of Translation”.

上是“想象的异邦”。严格来说，不同国别和区域都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无法与整个世界相脱离。所谓的国别和区域，不过是受到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制约而产生的历史建构物。因此，究竟把国别区域作为从属于全球主义的一部分，还是作为地区主义的独立分析单位，也一直是国别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争论点。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不胫而走，推动全球主义成为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力量，人们越来越接受全球主义的重要性。不管做出何种的界定，也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全球化被普遍认为是跨越边界的运动，推动地方性因素、文化、社会和经济生活在世界范围连为一体。从这一观点来看，全球化的发展将荡涤国别区域研究，国别区域的传统边界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刷下将不复存在，以此为基础的国别区域研究也就不再有什么意义。跨国主义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将整个世界划分为南亚、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拉丁美洲等等是政治化的传统界定，是相当武断的做法且容易引发争论。比如，阿富汗的地位就十分尴尬，它究竟是南亚地区的一部分，还是中东地区的一部分，抑或中亚地区的一部分？为什么非洲大陆被划分为北非国家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缅甸和菲律宾共同作为东南亚国家是基于什么样相似的文化特征？波罗的海国家究竟应该被视为欧洲国家，还是应该被视为中欧国家或原苏联国家？欧亚地区真的是一个有意义的分析单位吗？随着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所有这些问题可能都需要重新界定，传统的研究边界需要破除，一些跨国族群和跨国网络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比如基地组织、族裔群体和散居群体、基于互联网的全球行动网络等，都在重新塑造着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地图，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别区域研究一时间成为国别区域研究的主流。在这些观点看来，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必要研究单个国家或地区，因为很多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都是全球性的，比如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病肆虐、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犯罪等。由于这些问题超越了国家边界，使得基于单个国家或区域的详细研究对解决问题毫无裨益，而新问题只能通过创新方法来解决，适用于全球性问题的创新方法需要汇集各学科的专业知识来供给。

面对全球主义国别区域研究的强劲潮流，学界也有一些批评意见认为，

国别区域研究过于沉湎于全球化的研究。事实上，全球化有其跨越边界的一面，也有其塑造新边界的一面，是一体化和碎片化的统一。随着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不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互动，而是涵盖区域内部各个国家和社会行为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等复杂内容。最早的区域主义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后期欧洲贸易特惠制度的产生。^①自此之后，地区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及其发展，被称为恶意的地区主义（malevolent regionalism）；第二次地区主义浪潮是欧洲一体化启动以来引发的区域合作主义，主要成果是各个区域经济合作集团的诞生；第三次地区主义浪潮是冷战之后的所谓新地区主义，作为对霸权稳定替代方案提出的地区主义国际秩序。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这一术语由诺曼·帕尔默（Norman D. Palmer）最早提出，是指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欧洲单一法案的出台与实行，特别是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以地区为中心聚合发展，区域化和地区主义现象越来越突出，并且与之相伴出现了一种“世界性现象”的区域合作的新浪潮。^②相比之下，新地区主义强调区域的开放性，注重区域内部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在对话协商基础之上的自愿合作，是一种国家参与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开放地区主义。冷战结束以来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对于国际新秩序的变迁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地区主义主导下的国际关系是由几个自然或者人为塑造的区域集团组成的。21 世纪，区域集团的强化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形成欧洲、北美、亚太、拉美、欧亚、非洲等若干区域集团，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方式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军事手段逐渐降到次要地位。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一个国家被排除在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之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排除在地区组织之外。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区域一体化动力的推动下，若干区域集团之间的秩序以及区域内部的国际

① E. D. Mansfield, H.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9, Vol.53, No.3, p.576.

② 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oronto: Lexington Books, 1991.

秩序建设，日益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受制于诸多现实条件，新地区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新秩序的形态，前景还并不明朗。新地区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面对着全球主义、民族国家主义、国家分离主义以及霸权主义等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由此注定国际新秩序在区域范围内的构建，也是一个极其曲折的历程。同时，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传统的地理边界被侵蚀，但新族群、宗教、认同等新社会边界也在深刻发展，而这些因素的发展也是全球化带来的重要变化。因此，学界日益关注这些新的社会边界，它们也成为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越来越强调跨学科探究，更重视对某一特定区域进行情境化分析，这是国别区域研究新的变化。

总之，在全球化背景下，边界在重塑，空间在重整，需要有新地区主义的视角，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和跨越地区的主题研究（**thematic research**）。出于此种考虑，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 1986 年建立了穆斯林社会比较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uslim Societies**），集中关注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区。1994 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也设立了一个梅隆基金会资助的学位研究项目，致力于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和跨语言、历史和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全球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争论并没有终结，还将继续下去，成为推动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动力。

三、国别区域研究的未来趋势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开展国别区域研究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和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别区域研究。展望未来，国别区域研究正经历历史性变动，总的趋势是朝着全球化、在地化、学科化、平台化方向发展。

（一）全球化趋势

“研究什么？”是判断一个学科领域发展方向的首要问题。自国别区域研究产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集中于一个国家对域外世界的它者研究，表现为对某一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综合研究，逐步构建该国国别学和区域学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战略体系。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普遍联系日益频繁和紧密，对各种超越国别和区域的全球问题的研究越发吸引国别区域研究学者的注意力。国别区域研究逐步开展针对特定地区对全球性问题的回应研究，从观照地方到观照全球，推进全球视野下的国别区域研究，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全球视野下的国别区域研究，意味着每一个国别和区域都被纳入全球视野的观照之下，更加关注全球性问题及其地方性回应。经济全球化和跨国人口流动重塑了全球地缘政治，且日益侵蚀着国别区域的传统边界，尤其是在散居人群和海外移民的研究中，一些地区内部的国界意义下降，比如欧盟和东盟，国别区域研究的基础也在发生着深刻位移。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口流动对国别区域研究的影响，因为散居人口会深刻影响其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互动进程，包括经济上的贸易和投资、政治上的族群摩擦以及思想观念上的诸多变化。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影响着国别区域的运行规律，甚至塑造着国别区域的新边界、新关系。德国和土耳其的关系、美国和古巴的关系、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都受到人口流动和移民的深刻影响。在美国的大、中、小学，留学生群体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教育文化，要求设立新的课程以适应这种变化。国界作为国别分析基本单位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文化边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以及日益上升的跨国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日益承担起作为新的分析单位的使命。尽管包括国际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女性主义与和平运动等，在实力、韧性和纲领成熟度上还各不相同，但都已经成为传统国别区域研究边界的挑战。

全球视野下的国别区域研究，进一步刺激了多学科的对话交融。且不论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引发了几乎所有学科学者的兴趣，大量关于全球化的文献成为各个学科研究的必读材料，包括技术、贸易、投资、金融、教育、医疗、文化、媒体、人口、族群、宗教、性别等众多社会问题被纳入全球化研究中来，而且也包括某一国别地区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研究。全球视野下的国别区域研究，开始呈现为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及其理论方法之间的对话，他们从各自国家区域的视角致力于探讨并尝试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并在本学科范围寻求与其他国别和地区的比较，找到解决共同问题的方案。典型的例子包括金砖国家大学联盟框架下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研究，一

些原苏联国家关于经济转型和民主转型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直接推动了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学科专业的成长。

（二）在地化趋势

“谁研究？”是影响国别区域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别区域研究之所以存在，最初就是源于满足欧洲殖民者在海外置产兴业的经济需求和美苏争夺霸权和势力范围的战略需要而逐渐形成的，而且不同研究主体的具体研究偏好往往界定着其国别区域研究的内涵与特征。按照这一指标，未来国别区域研究正在从外来者的观察向当地人解说当地的在地化发展。过去，国别区域研究主要是来自于特定区域之外的研究人员对该区域的外部观察，而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和深入，当地人逐渐加入到国别区域研究中来。未来国别区域研究趋向于对特定国别区域进行内部观察，由当地人来研究当地，“国别通”（本国的外国通和外国的当地通）越来越成为一个研究共同体。

其实，这一国别区域研究在地化的趋势，自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就已经呈现出其轮廓。以美国的中国研究为例，经历了从最初的传统汉学(Sinology)向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转变。美国早期传教士对传统汉学的研究主要由裨治文、卫三畏、丁韪良、明恩溥、林乐知等人完成，近代以来则先后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孔飞力(Philip A. Kuhn)、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包道格(Douglas Paal)等引领。尤其是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日益成为当代美国的中国研究主力军，比如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和赵鼎新、美利坚大学的赵全胜、丹佛大学的赵穗生、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王飞凌、哥伦比亚大学的吕晓波和孙哲、加州大学的郭苏建、卡特中心的刘亚伟、巴克内尔大学的朱志群、路易威尔大学的华世平、纽约大学的张旭东、杜克大学的洪朝晖、内华达大学的蒲晓宇等。他们与戴维·兰普顿、柯庆生、江忆恩、托尼·赛奇、沈大伟、谢淑丽、陆伯彬、麦艾文、傅泰林、欧博文、黎安友、鲍瑞嘉、狄忠蒲等一起构成了美国的中国研究学术共同体。近年来，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美国智库和大学纷纷与中国相关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中国研究在地化趋势更加明显。比如美国华府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先后与清华大学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在清华大学合作建立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此外，纽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建立了上海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北京建立了中心，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建立了双硕士项目，霍普金斯大学与南京大学合作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也发展很快。通过这些渠道，中国本地学者越来越深地融入美国的中国研究行列，成为日益显赫的研究力量。

即便是在国别区域研究上学有专攻的学者，也有可能轻视那些在外人看来理所当然的文化和社会要素的重要性，也容易忽略一些关键的内部理解和动力进程，因此有必要与当地人结成联盟，尊重他们的研究日程、研究视角、研究经历以及学术优先次序，进而对其国别区域研究的日程进行必要的调整。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国别区域研究日益重视得到来自当地人的帮助，比如俄罗斯的一些学者开始强调与欧美和其他国家的同行开展大规模的合作。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推进，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也开始重视吸收当地研究力量来拓展对国别区域的理解，包括当地语言、文学、哲学、市政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力量被普遍重视。一些沿线国家的学者开始融入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通过联合举办学术会议、开展学术访问、举办人才培养的学位和非学位项目，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开始呈现出在地化趋势。

为了推动国别区域研究的在地化趋势，需要在研究载体和机制上创新，就是要加强实体化平台的建设。国别区域研究涉及多学科学者，如果没有独立的平台，没有形成必要的联系沟通机制，则很难展开深入的融合研究。在大学里，这一载体往往表现为一个实体化的独立研究机构（比如研究院、研究中心）。在智库方面，这一载体则表现为一个经常性的研究部门或研究项目。此外，还可以设立国别区域研究会、创办国别区域研究杂志和建立国别区域研究图书馆等。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每一个研究机构或平台都是一个特定国别区域研究的联络站，这里不仅汇聚本国对其他国家的研究，而且也吸纳其他国家对自身的研究。依托一家研究机构、一项研究课题、一个学会、一份杂志等平台，有助于开展跨国的多学科交流讨论，推动国别区域研究日益属地化。

（三）学科化趋势

“怎么研究”界定了国别区域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最初，国别区域研究更多属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研究范畴，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和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的研究。语言、文学和翻译是打开国别研究的钥匙，其他维度的研究必须以外国语言文学为前提，或者必须是基于对象国语言文学而进行的拓展性研究。随着交往的深入，在对象国语言文学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人文地理、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研究，呈现为跨学科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二战以后，出于国家战略需要，美苏的国别区域研究汇集了众多学科背景的人员，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特征十分明显。

环顾世界，尽管各个大学的国别区域研究中心陆续建立，但地位比较脆弱，对学科和经费都有着高度的依赖。从学科来看，已有的国别区域研究机构除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已经高度学科化的单位外，大部分往往分散在不同学科内，其前景受制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国别区域研究往往被其所依赖的学科所俘获，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经费来源看，国别区域研究高度依赖政府支持和社会赞助，一旦国家战略需要和社会需求下降，国别区域研究就缺乏自我生长的能力。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别区域研究原先凝聚各学科协同合作的战略需要大大下降，国别区域研究逐渐从地方性知识返回到学科性知识体系之中，回归各自的一级学科或基础学科。长期以来，国别区域研究比其他学术领域有着更为根深蒂固的跨学科传统，不同学科之间的竞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更为紧张的是，不同学科竞争性发展的逻辑是致力于构建普遍性理论，而国别区域研究更看重地方性知识或区域学支持，认为西方大学发展起来的西方化理论不能简单地在某一国别区域应用。在此种竞争环境下，一旦政府和社会资助不再看重某一国别区域，这一国别区域的相关研究就会迅速在竞争中失去优势，不管是教职聘任、人才培养项目设立，还是研究项目申请，都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展望未来，国别区域研究的前途有两种：第一种前景是继续沿袭多学科交流的传统。国别区域研究一直有多学科融合的传统，二战后以来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往往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尽管有时也会把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纳入其中，但在很多情况下只不过是附庸

风雅的点缀。国别区域研究一直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和社会现实需求是其安身立命之道。当然，如果国别区域研究继续这一跨学科的传统，其地位就容易受到外部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因而始终保持脆弱的发展格局。另外一种前景是推动国别区域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形成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以及独立的学会、独立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独立的杂志、独立的专业等一整套学科系统。为什么要把与某一特定国别区域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这是一个需要逐步形成共识的问题。简言之，这既与该国别和区域的战略重要程度相连，也与此国别和区域的文化特性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国家的“国学”研究也许会成为支撑这一国别区域研究主题的核心支柱，进而基于特定语言基础上形成横跨多种学科的协同研究。牛津大学的跨学科区域研究学院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一学院成立于2004年，依托这一学院将不同学科内的国别区域研究者聚集在一起，成为影响大学预算决策的重要力量。不管向着哪一种前景迈进，学科化都将是国别区域研究必须力争推进的方向。

（四）部落化趋势

“为谁研究？”也是国别区域研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未来国别区域研究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国别区域研究是一门实践感很强的学问，无论是早期欧洲为满足殖民需要的“汉学”“埃及学”“斯拉夫学”“亚非研究”，还是二战后美苏引领的国别区域研究，都具有很强的战略使命，要么是效力于国家战略需要，要么是服务于市场发展需求。毋庸置疑，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和对全球治理变革的推动，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也将越来越具有服务实践的特色，经世致用仍然是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各地区日益连为一体，整个世界正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军事上被“新美利坚帝国”（a new US Imperium）所支配。尽管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思想家仍在不断提供新的视角和知识建构，但基本上是美国学者和大学主导着世界的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甚至主导着世界范围内的人才培养。诚如安德鲁·威昂德（Andrew Walder）指出的那样，这一趋势使得关于中国的研究项目是由美国培养的社会学家在开

展，而真正基于中国经验的视角和分析越来越少，导致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在其他国别区域研究领域也有类似状况，“知识在美国生产，却在其他国别和地区消费”，美国的国别区域研究出现了萨义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回归。进入 21 世纪后，“9·11 事件”和反恐战争的暴发，导致美国开始选择性关注阿拉伯和中亚地区语言与国别区域研究。与冷战期间的研究不同的是，美国大学中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学者更加多样化了，更加重视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协作，进而致力于创建新的社会理论路径，更加重视美国社会文化与这些国别区域社会文化的比较。不难看出，未来的国别区域研究越发围绕每一国别和区域形成跨国的部落或社群。不仅在发达国家形成了社群，在发展中国家也形成了独立的社群，且不同国家的社群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原本“为国家和社会而研究”的属性，开始呈现出“为学术而研究”的属性。

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特别提及了国别区域研究社群中学科化与国别化之间的矛盾。从事国别区域政治研究的学者，其学科基础应当是“纵向”深挖，立足于政治学基础知识，同时争取更多了解“横向”的知识，应该重点关注国际政治、比较政治、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等等，而不是“国别区域学”。但是同在政治学领域，研究非洲的学者和专攻日本的学者似乎很难找到共同的兴趣点，也不大可能在同一个学术团体内相互切磋。同样，在经济学领域，研究拉美经济的专家和研究中东经济的专家大概也很少有机会沟通。导致国别区域研究部落化和社群化的更重要原因，来自于国别区域研究对自身独特性缺陷的认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纯粹从某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视角、理论和日程出发对域外知识进行建构，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和不足，有必要建立对国别区域之庞大复杂社会，进行综合性、社会性、历史性的理解。大卫·桑顿认为，鉴于国别区域研究从自身出发建构域外知识存在的缺陷，有必要引入其他视角的观点以保持平衡，“在美国的核心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当中，淡化政策制定者和广大民众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一直以来都是区域研究的基础性功用，而且也是其将来的主要作用”。^①

^①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34-78.

需要把本国视角的域外知识建构与域外视角的该国知识解说结合起来,深入推动对话交流,构建关于某一国别区域研究的跨国知识网络,“拉美研究是北美人与拉美人一起做的研究,而不是做给拉美人的研究。”^①因此,将局外人的观察和局内人的视角结合起来,有助于提供一个更全面和更具分析力的框架,尽管在现实中此种努力的难度很大,但这是国别区域研究未来的前进方向。

国别区域研究的部落化趋势要求形成“国别通”和“学科通”的融合发展。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学者,最好能够同时具备两个身份:一个是某区域或国别问题的专家,另一个是某学科的学者。一方面,要与研究同一对象国或对象地区但分属不同学科的学者协调合作,另一方面也要与同一学科背景但研究不同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专家互通有无。培养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人才,同样需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努力,既要培养通才、“杂家”,也要培养专家、“工匠”;在课程设计上,既要显示各国各地区的特性,又要突出它们的共性,据此完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可喜的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的推进,无论是国家的战略需要,还是社会各界的发展需求,都有助于推动国别区域研究的深入发展,相关的资源、机会和研究条件都会大大改善。要抓住这一机遇,大力提倡跨专业、跨国别与区域的综合研究,开设一批高水平的课程,撰写一批相应的教材,努力培养更多的通才和专家。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国别区域研究方兴未艾,其所反映出的时代趋势是地方性知识的复苏。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反之,越是全球化,越是地方化。对于一个拥有 70 多亿人口规模的世界来说,所有地区不可能齐头并进,更不可能整齐划一。相反,多样性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的常态,世界的统一性是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当然,多样性也离不开世界的统一性。国别区域研究是世界与生俱来的学问,政治和战略因素可能会影响国别区域研究的兴衰,但无法取消国别区域研究,也无法长期维持源于某一地方性知识的文化霸权地位,这就是国别区域研究的基本定位。

^① P. Drake, Lisa Hilbink, “Latin American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pp.34-78.

【 Abstract 】 Country-specific and regional studies is the academic knowledge system of a country's outside world. However, the definition in connotation of country-specific and regional studies has been full of controversy within academic circles. In fact, as a construction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country-specific and regional studies is a unity of geographical attribute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attributes in meaning which emphasizes both theories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methodology attributes in integr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isciplines. It is essentially an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 with obvious intercultural,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analyses of debates in scientism and professionalism,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transcendent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globalism and regionalism,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four trends namely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ribalization in country-specific and regional studies.

【 Key Words 】 Country-specific and Regional Studies,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y-specific and Regional Studies,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and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 Аннотация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это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мировых систе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выходящих за пределы страны. Однако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содерж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ызывает споры в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кругах. Фактически, как построение системы знаний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 и регион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значально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един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атрибутов, выделенных изнутри и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регионов, атрибутов знач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подчёркивают как теорию, так и практику, единство методических атрибутов интеграци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дисциплин, обладают очевидным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межкультурност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сти и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ости, по сути, являются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Путём анализа дискуссий в области сциентизма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а, универсализма и партикуляризма,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эмпир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глобализма и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ся, чт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присутствуют четыре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сть и трайбализац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дисциплин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е постро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 研究方法与创新

冯绍雷 李中海 张 昕 郑春荣 严安林 孙建中
余南平 石晨霞 王 健 余建华 门 镜 臧术美

【编者按】2021年5月，在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的指导下，《俄罗斯研究》编辑部联合《国际展望》《国际观察》《国际关系研究》《德国研究》编辑部，就“新发展格局下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与创新”举行学术研讨会。我们选取了部分发言专家的文稿，组成本期笔谈（根据发言的内容，从一般理论到国别研究案例排列），以飨读者。当前国别与区域研究事关重大，因为中国的事情历来很大程度上与如何理性地把握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密切相关。当下的中国正在从梁启超笔下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迈向“世界之中国”，现在可能是历史上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第一次尝试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野（甚至包括南北极、外太空等）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之中国”急需建立能够覆盖全球各个地理空间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同时也日益迫切地需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立足中国、讲好世界故事”。崛起中的中国参与世界的程度越深，对于世界各个地区的关切和了解的需求就越大。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中国“国家知识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为上述过程提供知识储备责无旁贷。

【关键词】区域与国别研究 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 国家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D8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3-0146(39)

学习《论持久战》“三阶段”战略预判， 研究中国长时段的内部发展与对外战略

冯绍雷*

毛主席对于抗日战争中“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三阶段”预判，^①不光为历史成就所证明，而且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

首先，就我国当前阶段对外关系而言，虽然并不完全是“敌强我弱”，但是在并未取得对美国主导的西方总体优势的局面下，将其视为一个类似于“战略防御”或者“防守反击”的态势，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笔者将这一阶段称为“大国关系的调整期”，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华战略表面上来势汹汹，但事实上实力对比今非昔比，拉帮结派而漏洞百出，以“民主与专制”作为思想政治工具也捉襟见肘。这一“调整阶段”至少持续到 2024 年，这会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不光美国、俄罗斯、印度、中国台湾地区等届时将要面临 2024 年选举，这些国家与地区的选举将产生巨大而难以估量的“外溢”效应，同时，这也将是疫情后国际政治经济重组的一个关键时刻。更重要的是，多项国际预测表明，今后的若干年，将会是中国 GDP 总量超过美国的敏感时段。如果我们在这一“防守反击”的战略阶段能站稳脚跟，对以后的长期发展做好通盘筹划，那么中国以一个稳健进取、和平开明的发展中大国姿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博弈，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此后，一个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与西方阵营长期持续的较量阶段，将真正拉开序幕。

类似于《论持久战》中“战略相持阶段”，在中美这两大对手之间，总体而言，美国实力依然占先，但又各有优长，因此长期相持胶着的艰难博弈难以避免。在这一阶段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大国成长的历史经验表明，哪一个大国能够抓住机遇，有效地推进国内体制改革，它就能决胜于千里之外。以美国为例，面临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罗斯福新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39-518 页。

政问世，而凯恩斯本人则甚至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思想。^①新政大刀阔斧改革内部弊病，使美国国力大增，通过赢得二战胜利，最终一举成为世界霸主。同样是美国，在经历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滞胀、越战、内部政治危机之后，70 年代末里根推出新保守主义改革，以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掀动新一轮全球化，借势瓦解苏联，主导了 90 年代后整整几十年的世界潮流。相比之下，同时期的苏联虽有改革雄心，但一再错失机会，在为时过晚的局面下，已无力挽潮流于既倒，终于落得大国解体。大国内部改革未必要以称霸为归宿，但客观上对于激烈竞争中大国地位的沉浮，起着关键作用。

“战略相持阶段”的中美博弈，是否坚持以改革内政为优先，实际上不光为大国成长的历史经验所证实，而且也将是我党一系列既定路线的必然延伸：（1）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方针，将会在一个较长时期主导内外发展。内循环必须以全方位内部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为辅佐。（2）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模式与治理能力的实现，理应是“战略相持阶段”一个极其关键的战略目标。没有真正的“自我革命”，就不可能实现这一阶段的全胜。（3）至于 2035 年实现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按目前计算，需要这一阶段年均增长 4.75% 的发展水平。要达到这一水平，没有真正的体制改革，激发各类要素增长，盘活整个国民经济，是不可能实现的。

进一步言之，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内部体制改革，已不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欧美为导向的模式，而是把中国的传统、基础、积累与国际先进思想和经验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强调推行改革的稳固的政治基础，以及改革的有效务实，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在这样背景下的对外开放，也是扎紧篱笆之后的打开大门。有充分理由可以预期，经过“战略相持阶段”长期而深入的改革，中国国际地位与实力的提升，乃是大势所趋。

最后，与《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战略反攻阶段”相类似，中美较量是否会导致像中日战争一胜一败这样一种历史结局？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未来大国博弈的战略估量，而且也将是未来世界走向

① [英]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相蓝欣、储英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

的哲学与道义取向的一次跨世纪考量。笔者曾多次提出，未来国际秩序构建可用世界秩序历次更替的经验作为铺垫。尤其是，可以 1814-1815 年维也纳体制为参照。理由在于，这一体制导致了恩格斯所说的“百年和平”的实现。尽管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有过若干战争，但是百年间并未发生过全面的欧洲战争。微妙之处在于，维也纳体制并非所谓“民主和平论”的实现。相反，作为维也纳体制主角的英国、俄国、奥匈帝国、普鲁士王国，都是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君主立宪或专制体制，而并非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国家”。换言之，内政的体制差异不应该成为国际和平的障碍。值得关注的是，近日来我们所熟悉的美国外交学会主席哈斯、资深学者库普乾居然也公开署文，明确主张以维也纳体制作为未来世界秩序构建的楷模。他们叙述的重点，不光是同意国内体制差异不应该成为大国协同的羁绊，而且从技术层面提出了维也纳体制各国间的中立、协商、互相尊重，应该是大国交往之道。^①此文既出，一时争议四起，恰好说明这一问题乃是当前国际转型的一个关键聚焦。可以说，“战略反攻阶段”的前景，不光取决于力量对比，而尤其在于以怎样的模式与制度构想引领天下。究竟是以胜负决断式的预判，还是以大国协同式的模态去掀动潮流，效果必定是大不一样的。

作一个简短的总结：第一，中美博弈的开局，十分重要。路径选择往往决定了事后的发展。立足于“战略防御”或“防守反击”的姿态，不光为了战术上伸张有度，也为长期发展战略留下余地。第二，“战略相持阶段”的内政改革乃是成功的关键，这已为内外经验和已有认知积累所铺垫。“自我革命”是不忘初心的一個成功保障。第三，决胜和反攻阶段的制度模式选择，事关重大。往往不是实际上难以测量的实力决定一切，而是思想与道义的高度在左右人心，创造奇迹。

在这样背景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事关重大。因为，中国的事情历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理性地把握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我曾经说过旧世界已经老去，但新世界尚未来到。首先的问题是，旧世界如何老去，留下了哪些遗

^① Richard N. Haass, Charles A. Kupchan, “The New Concert of Powers”, *Foreign affairs*, March 23,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1-03-23/new-concert-powers>

产，该做怎样的清理？其次的问题是，新世界何时会到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个世界才会到来，新世界将会以怎样不同于旧日的方式而兴起？为什么我们会尤其关注俄罗斯，因为在俄罗斯身上，我们看到了那种一身而二任的禀赋，即，它曾经是新世界的缔造者，但同时也带有浓重旧世界的印痕。我们能从中取得怎样的教益呢？有待大家十分的努力。

对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特点及发展方向的思考

李中海*

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日趋活跃，高质量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研究方法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更多关注。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杂志曾组织系列文章，邀请优秀青年学者从“三大体系”建设的高度和学科发展角度，对40年来中国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和总结。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也主持出版了《国外俄苏研究》系列丛书，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领域方法论问题的讨论趋于活跃。应该看到的是，今天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与40年前相比已取得显著进步，这一领域学者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和成果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不应忽视的是，这一领域的总体研究状况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这一判断同样符合区域国别研究的实际情况。笔者作为学术期刊负责人，在多年办刊实践中也感觉到，目前期刊收到的投稿也存在科学性、理论性和原创性不足等突出问题。要改变这种局面，使区域国别研究向精深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区域国别研究向精深发展，必须坚持科学精神，从社会科学的高度认识区域国别研究。换言之，应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看待。

* 李中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执行主编。

今天的区域国别研究被赋予了智库、外宣等多种职能。不可否认，区域国别研究要服务于国家大政方针，服务于外交工作，相关学者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发表看法，对外交工作建言献策，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作为社会科学的区域国别研究，还是应有别于政府智库、外交和新闻机构。从社会科学的高度，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来研究、阐释世界，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独特优势，也是其首要任务。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三大体系”建设还是争夺国际话语权抑或提升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增强国际问题和区域国别研究的科学意识都是第一要务。

其次，要认识到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特殊性，从特殊性角度研究区域国别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时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①目前很多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都是从发达国家或其他不同类型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中提炼出来的，对这些理论必须进行适用性检验，否则，盲目奉行“拿来主义”，用这些理论来指导区域国别研究，不但无法解释具体区域和国别的现实问题，也不能提出具有现实意义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因此，需要明确区域国别研究的认识论根基，“不要用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

再者，区域国别研究要增强学科意识，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工具。所谓增强学科意识，并不是说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科，正如有学者指出，无论区域国别研究如何发展，都不大可能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一般性学科相提并论的门类，但是区域国别研究要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社，2016年5月17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4.html>

使用现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工具。区域国别研究涉及研究对象的历史、地理、人文传统和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中需要解释的问题和现象杂多，需要借鉴现有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和研究工具，对复杂问题进行合乎逻辑秩序的梳理和阐释。关键是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式的过程描述。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①另外，应对研究的选题进行充分概念化，以概念为基础对特殊性问题进行一般化处理，从而在学理高度阐明具体地区和国家的发展轨迹和可能趋势。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转型，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波澜壮阔，世界各国和地区也正在经历复杂的变化，亟须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概括和阐释，区域国别研究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存在问题的评价，可以发现，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为使区域国别研究不断向精深发展，可能需要抓住几个着力点。

一是加强基础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支柱和生命力在于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根本在于科学意识和学科意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问题研究既是经验性学科，也是规范性学科，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对外交工作提供智力支持，是区域国别研究者应尽的义务。但是同时应该认识到，作为社会科学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地探析和阐释研究对象的根本特点和实际情况，为此需要作艰苦细致的基础性研究，相关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部门应为基础研究提供更多支持。

二是加强人才培养。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应该看到，不少区域国别研究单位都面临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一些机构挂牌很多，但学术成果很少。专业研究人员短缺是主要制约因素。同时还存在人才供给和需求不对称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人才紧缺，另一方面是相关专业博士面临就业难问题。此外，在博士培养阶段还存在科学思维训练不够、论文写作基础训练不足等突出问题，尤其是写作能力的培养存在很大欠缺。

三是为学术成果的展示提供更多平台。区域国别研究中既有理论研究，也有现实问题研究，既有大国研究，也有小国研究，既有热门问题研究，也有冷门问题研究。目前，小国研究、冷门方向研究面临着成果难以发表的突出问题。学术期刊部分承担着学术成果展示、交流和学术批评的职能，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学术期刊的学术引领作用，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以知识生产为核心推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

张 昕*

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角度来看会议标题中的“新发展格局”，我理解最相关的是两层意义：首先，当下的中国正在从梁启超笔下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迈向“世界之中国”，现在可能是历史上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第一次尝试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野（甚至包括南北极、外太空等）。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之中国”急需建立能够覆盖全球各个地理空间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这是我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则是，我们同时也日益迫切地需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立足中国、讲好世界故事”。崛起中的中国参与世界的程度越深，对于世界各个地区的关切和了解的冲动就越大，而国别区域研究作为中国“国家知识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为上述过程提供知识储备责无旁贷。

* 张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出于现实的政策需求，已经对区域国别研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特定领域的投入可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这个领域的大国美国。过去几年，学界多有提升国别区域研究专业地位的努力，部分高校已经成立专门的国别区域研究、教学单位，大量专门以国别区域研究议程为主题的会议也不断召开。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士来说，当下的中国的确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同时，中国现有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作为舆情搜集基础上创造、传承、积累知识、培育人才的体系仍难当其责。现实的巨大需求和这个领域里“国家知识体系”的供给能力之间仍有巨大差距。这个落差与历史积累的欠缺有关，也与当下国家知识体系背后的组织方式、激励机制有关。

在更抽象的层面，也需要认识到：知识生产本身是一个国家“国民政治经济体系”或者“国家-社会-市场”综合体的一部分，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国民政治经济体系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知识生产体系。知识生产本身又始终在政治与行政场域、经济场域、制度化文化生产场域和媒体场域之间的缝隙中游走，寻找、争取自己的合法性和价值，而知识生产本身也可能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力场域。此外，在当下全球性的传统知识生产体系式微、进入一个“专家已死、真相何在”的年代，我们更需要认识知识生产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属性，建设中的中国国别区域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也无法置身其外。

在此过程中，作为以特定区域为主要关注对象和界定学刊基本属性的《俄罗斯研究》，近几年的实践，也是希望推进以知识生产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和促进培育相应的学术共同体。具体而言，《俄罗斯研究》尝试鼓励和推动有鲜明学科基础和学科问题意识的研究，减少单纯针对热点问题的舆情报告、情况介绍、政策注解和口号式的研究；推进和鼓励多个层次上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超越单纯的以国家为单位、以外交政策为中心的研究；加强国别研究与主要学科领域的对话和知识积累（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和历史），在向其他学科提供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区域国别知识的同时，希望逐渐推动本领域对于传统学科的反哺。这方面区域国别类学刊和传统学科领域的学刊之间有增加合作的重要价值和空间。

除了以学刊为基础的知识生产体系，我们也日益面临新的知识传播环境带来的挑战——这也正是所谓“专家已死、真相何在”时代的重要背景。由

此，我们也希望尝试在宣传和推广上学习和利用各种新的传播媒介、手段和方式，将“征稿-投稿-审稿-修改-发表-发表后推介”这个围绕学刊的知识生产传播全过程通盘考虑，为构建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知识生产共同体做出新的尝试。我们已经建立了《俄罗斯研究》杂志的微信公众号，但是公众号转载长篇学术论文的传播效果还是有限。因此今后我们可能考虑的方式还包括：在专门的学术论文基础上，适当增加对谈、圆桌讨论等更为活泼、更注重交流性质的内容提供；尝试对学刊的作者进行采访、提供论文文字之外的音频（播客）或者视频内容、增加作者和读者的互动；针对某些热点问题，推出本学刊相关主题历年发表论文的“微专辑”，专门推送以加强传播效果；与其他学刊、媒体、智库、媒介平台的多种形式的合作，进一步提升学刊论文和论文作者的影响力。当然，这些可能的尝试在以引用率为核心的学刊评价体系中是否能够起到正面作用，我们还在刚刚起步的阶段。

此外，目前中国学者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除了跟中国有直接关联的议题，在中国以外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这方面不能陷入僵化理解“内循环”的误区。对此，我们也希望利用《俄罗斯研究》这样的小小平台，能更多对外推广中国学者对于俄罗斯、欧亚地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与中国未必有直接关联的），推介到俄罗斯和欧亚地区、甚至更广的学术研究群体中去。通过和国外学术群体、学刊的合作，我们也希望推动中国学者更多加入国外相关领域学刊的审稿和编辑工作，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推广中国学者的声音、理念和研究成果，实现学术研究、知识生产领域“内外循环”的和谐统一。这应该也是“立足中国、讲好世界故事”的内在需要。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若干问题与改进思考*

郑春荣**

当前，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准确把握区域与国别形势变化、科学应对错综复杂的国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批准号：20VQG011）的阶段性成果。

** 郑春荣，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的能力，助力“于危机中谋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目标。

（一）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制约着其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化问题。学界普遍的共识是，区域和国别研究涉及一个区域和国别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这决定了它是一项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需要多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但是，对于以哪一个学科为主的问题，学界则有不同认识，例如，历史学、政治学和外国语言文学分别强调各自的学科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尤其是外国语院校近年来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纷纷设置了区域与国别研究方向的二级学科。但是，这样的设置并未解决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问题，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一级学科》简介，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也需要“借用”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正因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尚）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因此，目前它也难以被设立为独立的一级学科。

2.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问题。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往往专注于单个国别、单个区域的精细化研究，这样的深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相关区域与国别事件的内部根由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忽视国际大环境这一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而且，在研究的进路上，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偏见，例如国际关系学科倾向于从上至下的研究视角，重国际大势、轻区域与国别的特殊性，而外语学科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则由于选择了相反的棱镜，往往缺乏对全球格局的关注。

3.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立场主体问题。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对于研究对象区域和国别有着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往往有着研究对象区域与国别某个问题的自驱动力，尤其外语学科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国外的知识和情况富有好奇心、敏感性。但是，与此相对，他们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学习领会却相对不足，甚至他们中的个别人认为，这是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的任务。由于这样的认知偏差，使得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时常不能从

中国发展的需求出发展开区域与国别研究，而且也无法履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职责与使命。

4. 区域与国别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常年来从事的都是基础研究，但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天然具有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属性。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常常割裂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认为后者是智库研究人员的工作内容，而非高校一般研究人员的职责，这在本质上与咨政成果大多未纳入职称评审和业绩评估体系有关。如果割裂看待区域与国别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则会使二者成为“两张皮”，无法发挥它们之间的融合联动。

（二）加强和改进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思考

一是要提高站位，从服务党的治国理政的高度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绝不应只是研究人员的“自娱自乐”，而是有着鲜明的使命导向。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勃兴，得益于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理应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开展以及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

二是应按照交叉学科设置区域与国别研究。如果选择在某个现有学科下设置区域与国别研究方向，很容易陷入单一学科的窠臼，不利于多学科协同、跨学科深入。既然区域与国别研究涉及的是某个区域与国别的整体性知识体系，^①考虑到区域与国别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其设置为交叉学科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这样的设置可以发挥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各学科之间“搭桥”的作用，实现多个学科之间的融合与协同，也有利于未来发展成熟，形成“区域与国别学”这样综合性的理论与方法。

三是应秉持从下至上和从上至下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可从某个国别深入，延伸到区域，再扩展到全球维度，即从点到面再到立体；同时，看问题的视角不应是单向的，而是也需要基于国际大局观、

^① 罗林、邵玉琢：“国别和区域研究须打破学科壁垒的束缚——论人文向度下的整体观”，《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7-165页。

向下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视角。这也就要求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不应只是某个领域或某几个领域的“国别通”“区域通”，也应是某个领域或某几个领域的“全球通”。

四是应将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两种视角统筹起来。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应坚持看问题的中国立场和视角，这并非是在倡导“中国中心主义”，而是要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外语学科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容易盲目地以为对象国或区域的当地知识就是准确的、权威的。因此，应避免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先入之见，保持清醒性和批判性。我们应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视角思考研究选题，把握好世情与国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在当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还有一个使命是“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要做到这一点，正如习总书记近日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指出的，“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①

五是要坚持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的创新。这不仅是指区域与国别研究应努力做到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辅相成，尤其是高校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在服务国家决策需求上尚缺乏自觉意识，选题的敏感度也有不足，为此，需要与实务部门加强沟通，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决策需求。事实上，长期的“冷门”研究与短期的“热点”研究并非相互无涉，相反，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素材和方法上的支撑，而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现实关切。而且，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除了要增强对单个国别和区域的深入研究，比如通过加强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或者通过建立国别和区域相关数据库，并利用大数据展开研究，还应加强跨国别、跨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包括地区内比较、地区间比较和跨地区比较这三种亚形态，找出国别与区域之间的异同点或趋同趋异的影响因素，助力我国对外政策的精准发力。

^①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求是网，2021年5月10日，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5/10/c_1127428545.htm

正确处理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五对关系

严安林*

区域国别研究是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大户”，一向受到学者们较大的关注与重视。近几年来，区域国别研究再度被各方所“青睐”，从而在机构设置、资源投入与学术产出等方面硕果累累。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做好区域国别研究，怎样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创新？在此提出需要处理好，或者是平衡好的五对关系。

第一对关系是“区域”与“国别”的关系。即“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关系，也是研究范围的“大”与“小”的关系。“国别研究”应该是“区域研究”的基础，如果只关注“区域研究”，不重视“国别研究”，可能出现“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问题，研究工作会浮于“大”、流于“粗”，而不够具体、不够细致。但如果一味重视“国别研究”而忽视“区域研究”，则可能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许多研究者对于某一国别可能研究得很深、很细，但如果只限于“国别研究”，可能会出现站位不高、格局不足的问题，最终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就以个人所从事的“台湾研究”或“两岸关系研究”为例，也时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可能因为过于重视甚至是局限于台湾岛内局势的分析，甚至对岛内情况如数家珍，如对于国民党与民进党关系、政党政治等着墨很深，但如果忽视外界对于台湾地区的影响，就会产生类似的问题。而台湾地区，历来是“四战之地”，深受外界多方面影响，不仅与美国，而且与日本的联系密切，影响久远而深刻。亚太地区局势的演变对于台湾岛内政治势力的影响不小。

第二对关系是“区域国别研究”与“全球”的关系。即“区域”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这也是“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当然需要重视区域国别内的各种问题的研究，更需要重视影响区域的外部世界的因素。研究视野必须扩大到周边与全球，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全球一体化，“区域国别”与世界的联系是越来越紧密了。当然，“区域国别”的发展对于世界的影响不小，而世界局势的发展对“区域国别”的影响更是不容低估。还是以台湾地

* 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区为例，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影响不小，而世界的发展又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社会，包括最近国民党的变化，进一步地“本土化”，美国在其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等，都是值得深究的。这实际上也是需要处理好“区域国别”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

第三对关系是“区域国别研究”与“专业领域研究”之间的关系。过去各方一贯比较重视与强调“区域国别研究”，各高校成立许多的研究机构，教育部设立许多的研究基地都是侧重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的。近若干年来各方开始比较强调“专业领域研究”，成立了不少的世界经济所、全球治理所、国际战略所、外交政策所等专业性质的研究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强化“专业领域研究”之后，“区域国别研究”事实上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据王逸舟在《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发表的“外交知识刍议”一文统计，2019-2021年这三年间，在国家社科基金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课题指南的263个课题中，有49%的课题是与高层政治、中央外交方略直接有关；有关美国的题目40个，占15%；不包括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题目28个，占10%左右。^①显然，“区域国别研究”的比例不高，至少在数量上并没有随着“专业领域研究”的大发展而同步增加。现在人们再度呼吁重视“区域国别研究”，这是大好事。“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是“专业领域研究”的基础。需要在机构设置等体制、机制上给予“区域国别研究”充分的保障，也需要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中给予应有的保障。当然，各相关科研机构的考核指标也是重要指挥棒。包括相关的智库，既要根据形势与政策需要强化内参建设，也不能忽视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成果的认可，甚至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同时给予内参成果、领导批示与学术论文等基础研究的认可。

第四对关系是“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关系。“区域国别研究”较大的一个特点是“跨学科”的性质，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所研究地区或者对象国别的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各方面的情况。如果对各方面情况的“专业学科”研究得好，对于“区域国别研究”一定是相当大的助益，是一个巨大的促进与深化。以香港研究为例，如果对于香港

① 王逸舟：“外交知识刍议”，《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第5页。

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问题，在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三方面的研究都做得非常好，相当程度上就是做好了香港研究。

第五对关系是学术、理论等“基础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之间的关系，即“基础研究”与“咨政研究”之间的关系。“基础研究”最终也是需要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但不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类似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如果没有“基础研究”，“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是难以做好的，因此需要重视“基础研究”，不可偏废“基础研究”。但如果只有“基础研究”，只做“基础研究”，不转化为“决策咨询研究”，这样的“学术研究”应该也是不完美的。当然，其中需要打通专家学者的“基础研究”如何服务“决策咨政”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需要推动“学术研究”与“咨政研究”的有机融合。当前，上海与全国的各类高校和研究机构拥有多学科、宽领域、强基础的优势，承担着国家和上海许多战略性、长期性、前瞻性的重大研究任务，但毋庸讳言，事实上依然存在不少不能及时将重要“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咨询”，在“学术研究”与“咨政研究”方面存在“两张皮”、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等问题，包括需要做好内参文风的转换，不是只用学术语言，而是用决策与职能部门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来表达。

以上是个人提出的区域国别研究中需要平衡好的五方面关系。当然，其他需要处理好的关系还有不少，如“政治经济研究”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研究”之间的关系，“语言”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理性”与“感性”的关系，虽然情感不能代替现实，但现实有时会被情感所左右，或是受到情感的影响。

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创新范式

孙建中*

全球、区域与国别是三个不同的集体单位（units），属于三个不同的国际关系研究层次（levels），都属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现在，我们国家高度重视区域与国别研究，并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或研究领域来对待，

* 孙建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观察》副主编，教授。

旨在通过对区域与国别的研究为全球层面的国际关系研究服务，最终都是为我们当前的外交政策与战略以及长远的国家利益服务。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研究在内容上要突出其对我的信息或情报价值，在方法上要突出其对我获取有价值信息或情报的有效性、长期性和稳定性。

（一）关于新发展格局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冷战时期，美国创立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这一门独立的学科，“苏联学”是其研究主题和核心内容；其基本定义是研究如何满足美国的军事竞争和海外行政管理需求的一门学问，因而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存在密切关系；其基本特点是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其主要目的是为美国战略情报服务甚至提供战略情报。正因为如此，国家、情报机构和基金会是为这一研究提供资金的主要来源。应当说，美国的“区域研究”为其赢得冷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未来不排除该学科在美国遏制中国大背景下复兴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当对当今美国“区域研究”的方法和范式及其创新和发展趋势加以关注，可以通过学习、借鉴和有选择地吸收，为我所用，进而为研究方法和范式的创新提供铺垫。

现在，中国的命运与世界命运紧密相连，中国发展的基本态势是：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树立了新发展理念，确定了新发展格局目标。所谓新发展格局，就是指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其目的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可持续力。这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不仅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是一种战略抉择，对于我对外经济合作与竞争也是一种战略抉择。因此，新发展格局也是未来指导我对外战略的指针。

在此背景下，探讨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和范式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我们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时必须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不能抛开定性研究而纯粹地进行定量研究，在重要的研究课题上更是如此，因为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的涉外研究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大战略，必须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于现实问题，我们应抱着“实然”（to be）的态度；对于理想的问题，应抱着“应然”（ought to be）的态

度。两者不能混淆。也就是说，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尤其是要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具体问题，并在需要时就我们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二）关于新发展格局与研究方法和视角创新

既然构成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是以国内循环系统为主，目的是让中国摆脱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局面，从而让美西方国家失去通过经济制裁手段牵制和打压中国的基础，那么研究方法的创新也必须围绕着为构建更具活力和可持续力的国内循环服务来开展。

一是周边海陆邻国是我构建国内循环的主要外部依托。这应当是一个基本的定位。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相比较地理上遥远的国家和地区，我周边邻国和地区与我国的交易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因此，通过充分利用地理邻近优势开展贸易，不仅可以节省资源、降低成本，而且还可以借此为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物质支撑。

二是主动打破传统的周边地缘政治单元界限，构建新的中外经济合作区。依据我国边缘地区的经济优势，结合邻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状况，打造新的地缘经济单元区，通过推进一体化进程，形成不同的内外经济混合区。

三是努力将我与周边国家合作的经济带打造成“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与缓和同美西方国家紧张关系的“缓冲带”。我们在重构地理单元时，不能仅仅以经济为单一考量，还要考虑其地缘政治、地缘军事甚至地缘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不仅要努力使得这种新构建起来的经济合作区具有更大的活力和可持续力，而且要努力使其能够更长久地为我外交政策和战略服务。

（三）关于范式与范式创新

范式（paradigm）概念最初由美国人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框架，同时还包括一批学者，他们不仅接受和信奉这种理论体系，而且还在研究过程中使用该理论体系中提倡的理论观点、法则、定律以及工作方法来研究其感兴趣的问题。因此，范式是理论和信奉该理论之学者的统一体。例如，美国国关学界中的现实主义（realism）、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等主要范式，

其中前三个是美国国关理论建构的“三座大山”，同时也是其主流范式。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国内国关学界的范式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一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二是借用西方的三大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是“中国学派”，主要包括道义现实主义路径、共生学派、关系学派和天下体系论。尽管各派各有特色，但缺陷也较明显，例如：道义现实主义实际上与西奥多·罗斯福的“胡萝卜加大棒”理论之间的区别不大；共生学派只讲美好共处，未能阐述如何实现这一前景；关系学派过于强调学理上的社会关系构建，实用性较弱一些；天下体系论实际上是将中国古代的“封贡体系”扩大到了整个世界，但不能令人信服地讲明这一目标如何才能实现。事实上，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国家的政策远远地将理论研究和创新甩在了后面，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与实践，等等，实际上都是出自职能部门或政策性智库，而不是中国国关理论界研究和创新的产物。这反映了我们的国关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的实际需要。

鉴于此，在范式创新方面，我们应当更加大胆一些，不要怕被扣上“中国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论”的帽子，毕竟，我们历史上有过“封贡体系”和相应的“东亚秩序”，且都是通过软实力构建起来的，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所以，只有在这种中国特色的理念下才能创新出真正有用的理论和范式，才能有自己的理论特色和棱角，才能构建起我们自己的“理论高山”。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运用*

余南平**

在区域国别研究上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科学方法？学界已经对此进行了广泛和充分的讨论。2018年4月，王辑思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提出：“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领域，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项目批准号：20DZA099）的阶段性成果。

** 余南平，上海市决策咨询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领军人物、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学科基础可以按空间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进行展开。”^①担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的历史学家钱乘旦先生，以欧洲为切入点和案例，较为全面与详尽地阐述了区域国别研究中应该具有“地理范围”和“研究内容”全覆盖的学术追求，跨学科、深入实地田野调查的科研方法，以及掌握研究对象语言基础的必要学术素养。^②暨南大学学者张云则根据国际关系研究的本体意义和研究问题导向提出了“理论、文化、治理和政策四个维度”。^③通过进一步综合其他学者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对于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一个基本共识是必须进行跨学科、多维度研究。但是根据国际关系研究议题的特点，在如何识别和应对复杂的区域和国别地缘政治变局问题上，特别是在对现实性、前瞻性强的“大战略”问题的判断上，^④是否还存在一个通用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指导区域国别研究？须认识到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理论体系与框架，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仍然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充分的现实解释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互动关系基本原理，对于判断区域国别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行为，有着高屋建瓴的诠释效用和研判指示作用。因此，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将有助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新学术范式的拓展。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应有的指导？这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超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范式解释的基础上进行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关

① 王辑思：“浅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澎湃新闻，2020年10月3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826941

② 钱乘旦、胡莉：“区域与国别研究视野下的‘欧洲研究’——关于欧洲研究发展方向的讨论”，《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8-150页。

③ 张云：“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第85-95页。

④ 对于如何进行有效的国际关系领域战略分析，国内学者时殷弘在为美国“大战略”和冷战史研究权威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里程碑式的史书”《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撰写的“导读”中有精辟的论述。详见[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北京：商务印书馆，时殷弘译，2019年，第v-xiv页。

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最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马克思从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工和财富占有视角看待生产力，认为“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至变成机器”^①；“抬高人民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②马克思还从异化劳动理论探究生产关系，人和自己的劳动活动、劳动产品、人类本质相异化，从而出现人与人相异化，占有这些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的人就是资本家，进而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同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分析：“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③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意识到生产者主体，即人的作用，并认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④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且“人类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⑤，进而揭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⑥在标识唯物史观成熟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包含众多经济学要素讨论，其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典概述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能动的反作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迁，每一次社会形态的变化都和生产力的提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② 同上，第175-176页。

③ 同上，第532-533页。

④ 同上，第655页。

⑤ 同上，第613页。

⑥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升有着直接关联，生产力的提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全新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过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这些主动与被动、基础与关系结构的解释，对于认识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均有指导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所创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今天对于解释区域、国际互动与国别问题演化，较之其他流行理论都拥有更高级、更深层的洞察力。举例而言，在19世纪的国际经济学流派中，以德国历史学派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非主流的“国民经济学”，向以英国亚当·斯密为典型代表的主流“开放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学流派发起了争论和挑战。而这种理论认识分歧的存在，如果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特别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层面上看，英国强大的海外殖民地市场与帝国本土高效生产体系形成的“价值链闭环”，促使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意识到需要开放的全球市场与全球贸易；而德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则更需要经济基础积累而进行一定程度的产业保护。因此，斯密与李斯特之争，在现象上看是理论与研究方法论本身正确性的讨论，而本质上是全球霸权强国与崛起后发国家的话语体系之争，同时更是在物质决定意识作用下，一种观念性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差异化表达。同样，在今天全球化时代，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生产关系”一般意义上的三个基本内容，即物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地位、劳动产品分配关系，来对照今天全球化时代全球价值链内涵的特征，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所拥有物质生产资料的不同），如土地、原材料、资本、人力等，使得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上、中、下游的不同位置，承担高端或低端的不同角色（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地位），最终创造了不同的增加价值（劳动产品分配）。而这些“价值总和”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在当今经合组织增加值贸易数据库（TiVA）中就直接表现为“百万美元”形式的统计指标（价值）。而这样也就为区域和国别的问题找到了经济学领域实证主义要求下“科学研究”的基点，并能够解释当下区域总体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特点和区域内国家间互动的逻辑，乃至国家行为体的基准行为模式。

总结而言，如果在区域国别研究中仅考虑和运用一般的传统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社会学在“现象”与社会“横切面”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和“研

研究范式”，而无视甚至放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具有通用解释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不仅无助于对国际关系变化的本质把握，同时更容易在细节的论证上落入“数学模型自我构建”和“数据堆砌”的泥淖，抑或沉浸于个案描述和分析中夹带的自我价值观解释和文化抽象性描述。而这些均是区域国别研究中要谨慎对待并加以规避的。因此，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法的现代性和时代性理解与运用，不仅要求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体系构建需要有足够的提炼，同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问题综合研究，更是要回归、提炼、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髓，进而对国际“大战略”形成的内在战略动因、战略行动能力、战略编码构成和战略行动结果，在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思维体系的基础上，加以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

学术期刊在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作用与优势

石晨霞*

当前，随着我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对外交往的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海外利益也持续拓展，加上“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对国别与区域的研究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在此背景下，近几年全国很多高校、研究机构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学科特色建立了诸多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积极回应国家需要。与此同时，作为推动和引领学科发展的重要平台，各类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术期刊也积极作为，为相关研究成果的展示与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另外，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和深化，也使相应的学术期刊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从目前国内国际关系学科中各类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期刊的数量来看，已经占到了总数的一半左右，研究的区域基本覆盖了世界主要地区和一些主要国家。近年来还新创刊了一些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包括《当代美国评论》《区域国别研究学刊》《区域与全球发展》等。这些既有的和新创的学术期刊共同助力我国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

* 石晨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国际展望》责任编辑。

（一）学术期刊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的作用

首先，展示和传播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学术期刊首要和直接的作用是展示和传播学术界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这是学术期刊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体现。因此，对于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的学术期刊而言，其首要的作用也是及时将学术界、优秀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期刊的平台展示出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读者和决策者提供新的知识和方法。另外，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期刊的电子化也迅速推进，并借助一些新媒体、自媒体，使期刊内容的传播效率空前提高，进而有效扩大了其传播范围和影响范围，这也推动了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新知识、新论断、新方法的传播和积累。

其次，发现优秀学者、培育学术新人。学术期刊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桥梁或中介，它是沟通研究者和读者之间的渠道，也是连接知识生产者与知识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当然，在学术界，研究者或知识的生产者往往同时也是读者和知识的消费者，这两个群体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景和阶段可以互换。正是基于这种功能，学术期刊需要不断寻找优秀的研究者来匹配相应的研究议题，让某一领域最专业的研究者来研究其最擅长的问题，并将之展示出来。这个过程是期刊的主动作为，其需要掌握各研究领域学者的情况和研究议题的内容，从而实现最优匹配，这样才能保障研究成果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而实现最优匹配的过程也是期刊或期刊人发现、挖掘优秀学者的过程。另外，学者的成长都有一个过程，期刊在其中也具有积极的作用，比如学术期刊往往都比较重视培育和扩大作者群，这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青年学者群的培育，而这些做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年轻学者的学术研究。

再次，推动和引领学科发展。学术期刊的另一项重要使命，是通过有针对性的选题策划来组织和推动一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前沿性并能回应社会需求的研究成果的出现。另外，学术期刊也往往会通过举行学术研讨会来将相关领域的学者集中起来，对某一议题进行讨论，从而在不断交流中推进研究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在此基础上推动新的研究成果出现。这些活动和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能够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二）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期刊的优势和特点

与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综合性期刊相比，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有其自身的

优势和特点。

首先，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往往具有持续性和系统性。这也源于其刊物定位与特点，长期聚焦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能够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持续进行学术积累。

其次，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的作者群相对比较稳定。稳定的作者群是学术期刊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专业性决定了这类期刊作者群的稳定性。当然，这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综合性期刊也会与国别区域研究期刊在稿源上产生竞争，因为好的国别或区域研究成果也是综合性期刊所需要的，这无疑会使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的优质稿源受到一定影响。

再次，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具有鲜明的特色。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具有鲜明的定位和特色是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与综合性期刊相比，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的刊物定位、刊物特色始终是非常明确的，在此基础上，这些期刊可以在具体的领域中持续推进深入细致的研究，进而逐渐确立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成为某一国别或区域研究的主要阵地。

（三）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期刊的作用

结合当前国家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需要、这一学科发展的特点以及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期刊的现状，未来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刊物的建设。

首先，坚持国别与区域特色。目前，随着各类学术期刊之间竞争的加剧，一些区域研究期刊的区域特色有所弱化，日益呈现出更加综合性的特点。这既有稿源的因素，也有各种评价指标的问题，使期刊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自身的区域特色。事实上，期刊的特色与独特定位是其长远发展的基础，坚持自身的特色是重要且必要的。这需要平衡好长期发展与短期目标的关系、期刊评价指标与研究现实的矛盾等。因此，引导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坚持办刊特色、在自身的领域深耕细作，是繁荣和发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对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的评价指标有必要进行适度调整，这也是避免其偏离自身特色的重要保障。

其次，学术期刊要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强调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这也对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期

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既要重视从多学科、跨学科的角度来组织稿件、培育作者，又要围绕某一国别或区域进行综合、全面、持续、深入的研究，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另外，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现状来看，基础研究仍显薄弱，因此学术期刊应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使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适度平衡，不能完全倒向政策研究。

再次，引导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均衡化发展。从目前国别与区域研究期刊的发文情况来看，对大国或重点国家、热点国家、热点地区的政策性研究相对较多，比如对美国、欧洲主要国家、日本、俄罗斯等的国别研究比较多。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这也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是学科发展的主要着力点。但是随着我国对外交往范围和海外利益的扩展，与一些中小国家的交往与合作日益频繁，因此加强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显得十分迫切，而且从学科的全面均衡发展来看，也需要平衡好大国研究与小国研究的关系，平衡好热点问题与冷门领域的关系。与此相应，学术期刊也需要培育多样化、多层次、均衡的作者群，这样才能引导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均衡化发展。

百年变局中要更加重视周边地区

王 健*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变局中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应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周边地区研究。

从地缘政治的历史发展来看，大国崛起和稳固都离不开周边战略支撑。例如，美国崛起前，就通过争夺巴拿马运河开凿权、武装干涉古巴独立运动、插手委内瑞拉危机等，全力经营周边。苏联在二战后也十分重视东欧地区的屏障作用。从全球化发展趋势看，以2007年为界，逐渐由“快速”转为“慢速”，全球贸易额年均增速由高于实际GDP年均增速2.1倍转为低于实际GDP增速，而“慢”下来的全球化一个比较显著的趋势就是地区化。2013—2017年区域内贸易与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之比增加了2.7%，邻国市场效应日益明

*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显，例如，2020年中国和东盟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又如，亚洲区域内FDI占比达到了51.7%，表明亚洲资金更青睐亚洲内部市场。同时，从全球价值链扩大来看，在2011-2013年达到顶峰，增加值部分占到全球贸易额的四分之三，但近年来不再扩大。另外，中美关系紧张以及新冠疫情，使得“脱钩”成为一种战略安全考虑，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越来越地区化、在地化。从科技发展的态势来看，一些新的技术和创新也有可能进一步推动地区化发展，例如，机器人将减小人工成本在产业链布局中的影响，3D打印有助于提高生产能力，新能源的发展使得对地缘外部依赖降低，而定制化的生产更加集聚消费地。因此，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和平崛起必须首先经营好周边地区，而中国周边环境不仅复杂程度是以往崛起大国中罕见的，还是大国博弈的前沿。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结构关系可能会进入一个重塑期。

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周边外交，首先需加强针对周边区域和国家的研究。最近几年，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等积极推动“周边学”研究，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一些高校还专门建立了研究周边的机构，仅以上海为例，有复旦大学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的周边国家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今后要进一步聚焦，并发挥各地的地缘、文化、语言优势，深耕细作，培养出一批精通当地语言、熟悉历史文化、了解政治经济、拥有人脉网络的真正国别专家。

其次，要认真总结历史上我国经营周边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历史上的“封贡体系”，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周边安全、推进周边经济文化发展的功用，而且当时中国“以大事小”“以礼相待”。又如，明代前期的统治者对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种不干涉的外交政策，即所谓“臣而不治”，力图避免兵戎相见的情形。在这一外交方略的指导下，明代前期与绝大部分周边国家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为明初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在周边外交中率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点带面，通过与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达成相关协议，基本解决了与周边国家的华侨华人问题和边境划界问题。冷战结束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从相互信任措施开始，

不仅解决了边界问题，还由此创建了周边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

再次，要加强和深化地区政治和安全机制建设，为周边合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区域环境。政治、安全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短板”，这不但制约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提升，还为地区外势力特别是美国插手周边局势、牵制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离岸平衡切入点。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抓住RCEP签署与合作抗疫的时机，以经促政，以非传统安全促传统安全合作。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爆发，都曾是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的转机和动力。目前，我们要从战略高度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进深发展，特别是从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增强安全合作功能；稳定以东盟为中心的系列峰会机制，进一步充实传统的“东盟10+3”“东盟10+1”机制，并体现更大的安全合作开放性；进一步扩展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功能，推动亚信会议机制进一步完善；进一步管控好周边安全热点与涉华主权争端，在地区稳定与主权利益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第四，将周边地区打造成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地区，构建产业链合作体系。中央明确提出，在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建设要努力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产业发展，而产业链的延伸、转型和升级大多需要依托一定的区域，通过密切的区域经济合作来达成。数据表明，亚太价值链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生产链条最宽、参与国家最多、贸易额最大和分工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价值链体系。2019年亚洲制造业GDP超过7.1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50%以上，其中中国为4.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58.3%），日本为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14.7%），韩国为5000亿美元（占亚洲的6.3%）。特别是随着RCEP的签署，由于15个国家之间得以采用相同的原产地规则，将显著降低供应链延展至该区域的成本，有助于产业链在区域内部相对稳定而有序地转移，中国应该抓住机会，以产业集群为导向，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率先构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依托、以中国为主导的产业链。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中东外交与中东研究推进刍议

余建华*

两千年前的丝绸之路就已架起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和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桥梁。1949年新中国成立，揭开了中国与中东友好合作历史的新篇章，尤其是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开启了新中国的中东外交。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中东外交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1世纪以来，中东成为中国战略大周边的重要板块，中国中东外交态势进一步转向“有所作为”。而作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地区国别研究组成部分，中国的中东研究也是伴随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跌宕起伏。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我国的中东研究迅速起步，其中中东政治研究出现短暂的“繁荣”。随后因“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国初创不久的中东研究陷于停滞。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与学术探索“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我国的中东研究也迎来了可喜的恢复与初步发展。21世纪以来，冷战后的中东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义不断增强，我国的中东研究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为：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丰硕，人才培养效果显著，智库作用得以发挥，国内外学术交流活跃，等等。

而在当今，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错综复杂的深刻变化。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则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进一步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处于一个从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历程演进的新发展阶段，需要用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在外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仍在延续，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深入人心，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国际环境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强，人类仍然面临一系列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现实与潜在的严峻挑战。至于中东地区，正处于世界与地区两个大变局叠加激荡的动荡转型变

* 余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革进程。一方面，伴随外部大国美俄欧在中东力量消长变化，地区内部诸强围绕填补“后美国时代”权力真空，展开纵横捭阖的地缘政治角力，中东地区秩序处于从失衡到重构的动荡转型中，新老热点跌宕起伏，局势走向波谲云诡。另一方面，当今中东多国依然陷于“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政治乱局长波之中，在全球经济疲软、世界能源市场转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不少中东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转型中社会政治尤其是民生治理的结构性顽疾痼症凸显，国家治理使命艰巨，经济发展成为摆脱国家困境的根本出路。

由此，在新发展格局下，我们肩负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使命。中国外交不仅要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包括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还要服务于推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就中国中东外交而言，一方面，这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全方位外交格局的重要一环，综合融汇了承前启后的发展中国家外交、大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多边和多领域外交诸多丰富内涵，必须服务于国家重大核心利益，需要中东国家在支持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上继续发挥战略依托作用，成为中国有效防范“三股恶势力”渗透、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周边屏障，成为落实中国统筹国内外市场与资源、保障能源战略安全、促进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国际场所。与此同时，经济与民生问题已成为制约中东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发展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总钥匙。中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的交汇地带与重点地区，共谋发展的目标决定中国与中东国家前所未有地相互接近与务实合作的前景。这些年来，中东诸国成为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践的重要伙伴，未来“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既要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与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又要符合世界百年大变局与中东形势发展现实。另一方面，作为成长中的全球性负责任大国，中国必须在中东这样的全球重要地缘战略板块积极作为，不仅将其作为服务于中美关系大局的重要国际舞台，而且要有建设性的使命担当，从总体超脱、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将中国中东外交作

为具有自身特色的新时代大国外交的区域实践与探索。因此，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需要保持与弘扬自身优势特色，有自己的选择、原则、重点和行为方式，量力而行，顺势而为，包括在中东国际事务与地区热点的妥善处理与灵活应对。

相应地，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中东研究，既要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中东的实践，又要与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相协调。从推进中国中东研究更宽视野、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建设而言，当下中国的中东研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其一，从巴勒斯坦争端到叙利亚危机，中东一系列新老热点问题由来盘根错节、内涵错综复杂，关涉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生态、民族、宗教、安全与国际关系多领域，需要借鉴年鉴学派的启迪，开展多学科整合研究，尤其是将世界史与国际问题研究有机结合，重视长时段、中时段考察。其二，中东不仅是世界古代东西方文明的起源发祥地，还是当代多元文明结合体，不仅要着力推进对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亚述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奥斯曼-土耳其文明和犹太文明等中东古今文明体的考察，而且要重视这些文明体与更大范围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或地域意义上的地中海文明、印度洋文明和非洲文明之间交融碰撞的互动研究。这有助于更好把握当下与未来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转型与重构。其三，要全面开展中东民族国家建设研究。民族国家仍然是中东国际体系的最主要行为体，一战后百年来现代中东民族国家渐次独立后，始终没有跳出民族国家建设坎坷磨难的困境。相当意义上，十年来迄今未了的中东变局，乃是中东人民期望摆脱世界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滞后与边缘这一不利地位的困境突围。中东国家需要有效把握发展这一解决一切问题根源的钥匙。因此要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做好中东社会文化的考察，从经济发展、民生建设、威权政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到民族宗教与部落宗派问题等，这也有利于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治国理政的交流互鉴。

当然，中东研究还要坚持正确理论的引领、得当研究方法的运用，努力突破语言关，有效掌握各种相关翔实资料，理论联系实际，弘扬求真务实与经世致用的传统，积极开展多部门多层次国内外交流调研，更好地服务新发展格局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欧盟近年来对华政策转变的研究方法探讨

门 镜*

中欧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组重要双边关系。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欧在 2003 年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使双边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但是，近期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欧盟政策的不断转变，中欧关系遭遇严重挑战。本文尝试用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欧盟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从而在对欧关系中争取主动和积极应对。

首先，现实主义的解读。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出发，欧盟对华的政策行为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主义特点。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行为者都必须自助。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来源于无政府状态下行为者的力量分配。^①而且，这些行为者之间缺乏信任，在竞争中形成彼此的地位。他们对自己在系统中的位置非常敏感，担忧相互依存的关系，强调独立的重要性。欧盟虽然已经与中国交往合作超过 45 年，但由于彼此之间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欧盟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尤其是近年来，欧盟的政治一体化遇到重大挑战，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再加上新冠病毒的肆虐，欧盟经历了各种危机，至今尚未摆脱困境。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对外投资大量增加，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债危机客观上增加了中国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一带一路”进一步拉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虽然中国是新冠疫情最早的受害者，但全国人民上下同心，很快便遏制住了疫情，恢复了生产和生活秩序，与境外的混乱和无措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和坚持自己发展道路的信心，使欧盟感到压力和担心。欧盟原本希望通过把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而改变中国的体制，但事与愿违。在这种情况下，欧盟选择了现实主义的竞争政策对抗中国。在经济上，限制中国对欧盟高科技企业的投资，限制华为在欧盟各国参与 5G 项目的推动，大幅增加在技术研发领域的预算，削减与中国在一些重要领域的产品合作，试图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从而限制中国的发展空间，

* 门镜，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①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3, Vol.18, No.2, p.97.

与中国争夺技术领域的主导权。欧盟强调地缘政治竞争，与美、日、澳、印等国家联手，逐步从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转向全面竞争。

第二，制度主义的解读。与此同时，欧盟又具有一些自由主义行为者的典型特征，尤其是对制度作用的认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行制度，认为制度安排是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独立变量。^①制度提出了国际体系中行为者相互认可的行为原则。它的合法地位要求行为者在其行为中考虑制度上的限制。与现实主义以战争冲突为解决方式的特点不同，新自由主义推动制度的建立和作用，希望通过制度约束增加透明度，从而避免战争。欧盟作为一个地区性组织，是多边主义和机制安排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欧盟一体化以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规范，欧盟不可能走到今天。在欧盟对外的双边关系中，欧盟要求对方遵循欧盟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试图用对自己具有保护力的规则条款约束合作方的行为。在国际合作中，欧盟以其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为由，以多边主义为工作方法，要求其他国家配合，以便推广欧盟的价值观，实现自身的利益，并且在政治上获得国际影响力，在经济上获得更大的市场。但是，符合欧盟利益的制度并不见得符合其他方的利益。过去欧盟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也面临着改革的需要。欧盟近几年以维护市场公平、对等开放、增加透明度、加强法制、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名义制定新的战略和法规，试图给中国方面施压，通过制度安排迫使中国接受欧盟开出的各种条件。自由主义理论还提到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兵戎相见。^②欧盟在其对华关系的文件中明确与中国是体制性竞争对手的同时，增加了与自身价值观相同国家的各方面合作，并试图以此在政治和经济上抗衡中国的崛起。

第三，社会建构理论的解读。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和物质结构的影响，取决于国家想要什么。行为者之间对彼此

①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2.

②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Christine Huang,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Majorities say China has handled COVID-19 outbreak poorly”, Pew Research Centre, Oct.6,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

的看法和期望，而不是彼此间能力的分配，形成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哪种无政府状态将在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取决于出现哪些特定身份和国家利益。行为者之间“发信号、解读和回应的过程完成了‘社会行为’，并开始了行为主体间相互认知的过程。”^①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同时，建构主义理论还指出，行为者的身份认同是不断变化的、主观性的、与其他行为者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②在欧盟对华政策发生变化时，欧盟成员国的对华认知也变得越来越负面。皮尤研究中心 2020 年底发布的最新问卷调查，反映了欧盟主要成员国对华认知态度的变化，令人关注。其中，德国对中国的好感度从 2002 年的 46% 下降到 2020 年的 25%，法国对中国的好感度从 2002 年的 58% 下降到 2020 年的 26%，英国对中国的好感度从 2002 年的 65% 下降到 2020 年的 22%。同时，德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从 2002 年的 37% 上升到 2020 年的 71%，法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从 2002 年的 42% 上升到 2020 年的 70%，英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从 2002 年的 16% 上升到 2020 年的 74%。欧盟主要国家对中国认知的变化来自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观判断，表现出对中国实力日益上升的担心，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猜忌。最近欧盟与中国之间因为人权事务的制裁与反制裁，使双方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张，欧盟越来越强硬。

中国与欧盟之间就“一带一路”倡议的互动也可以用社会建构理论比较清楚地解读。当 2015 年中方首先提出与容克计划对接、双方合作建立互联互通平台的时候，欧盟方面不太清楚“一带一路”的具体内容，原则上表示愿意合作。但随着欧盟对“一带一路”的进一步了解，越来越担心“一带一路”的构想与自身的互联互通理念不符，既在价值观上不同，也在实际利益方面有冲突。经过几次接触和互动，欧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希望以此独立于中方的“一带一路”设计，为欧亚互联互通的发展打上欧盟标签。

①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06.

② Peter Katzenste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4.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解读欧盟对华政策的近期变化，只是一个粗浅的尝试，目的在于理清欧盟对华政策的发展脉络，找出欧盟政策调整的原因，更好地估量欧盟政策变化给双边关系带来的影响，并从长远的角度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方向，化被动为主动。

地区一体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尝试 ——以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实践探索为例

臧术美*

从十几年前开始，个人就对国际关系理论与范式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欧洲一体化主流理论之间的论争、混合与超越进行了深入探讨。^①虽然这些主流理论之间存在相互渗透和借鉴，但总体而言，每一派理论都是各自为营、无法完全解释欧洲一体化这样复杂的现象，而个人对欧洲一体化的疑问（欧洲一体化的本质与未来是什么），也终究没有能够获得透彻明了的解答。于是，抱着这个疑问，又选取了欧盟地区政策这一重要而独特的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以期能够从实践层面进一步解答自己的困惑。^②上述这些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研究，最终汇总到笔者2020年12月出版的专著《欧盟地区政策：改革、效应与治理》当中（以下简称“专著”）。^③在前后持续十多年的研究进程中，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正好跟本次会议的主题——方法与范式的讨论紧密相关，那就是“跨学科方法”的使用。

笔者对“跨学科方法”的感悟，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源于对现有理论与方法中“跨学科方法”的观察，另一个是个人作为研究实践者对“跨学科”方法的具体运用。

从观察者的角度看，举两个例子：首先，笔者注意到欧洲一体化主流理

* 臧术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① 臧术美：《欧洲一体化主流理论的论争、混合与超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

② 博士论文法语版，Zang Shumei, *la Politique Régionale de l'Union européenne: Niveaux, Outils et Exemplarité?* Thèse,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Lyon (ENS Lyon); 博士论文中文版，臧术美：《欧盟地区政策改革与效应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

③ 臧术美：《欧盟地区政策：改革、效应与治理》，北京：时事出版社，2020年。

论之间，既有论争，又有混合。欧洲一体化理论经历了三大论战：20世纪50-60年代联邦主义和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的论战，20世纪60-70年代新功能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借鉴了理性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论战，以及20世纪80-90年代至今理性主义阵营（解释性理论、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批判理论）阵营的论战。可以看到，论战的阵营之间，不断吸取对方的优点完善自身，体现出大量跨学科、跨范式方法的运用。其次，笔者在对欧盟地区政策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研究的时候，发现跨学科方法的使用也较为常见，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就体现出典型的跨学科特色。

从研究实践者的角度来讲，笔者的研究也尝试运用了许多“跨学科”的方法，包含历史学、（区域）经济学、人文地理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

首先，笔者在专著第一部分着重探讨了欧洲一体化“深化”与“扩大”之间的关系，主要运用的就是历史学（比如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长时段”）的视角。其次，专著第二部分在探讨欧盟地区政策的经济与社会效应时，主要采用（区域）经济学的方法，一方面借用了欧盟官方评估所使用的三种模型（新古典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新地理经济学），另一方面对非官方的学者群体所使用的工具与评估结果进行了梳理。随后，专著第二部分还借用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对欧盟地区政策的地域效应进行了研究。^①最后，在专著第三部分对欧盟地区政策的制度效应进行了详细探讨，主要从“地区化”进程（西欧与东欧比较）、“欧洲化”进程与“多层级治理”三个角度展开。对“多层级治理”的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国内政治方法”与“比较政治学”。与此同时，笔者也曾经将这一“多层级”方法运用到“16+1”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的研究中，并尝试提出了“中欧多层级合作机制”这一概念。^②针对此次会议的主题“区域与国别研究”，想要跟各位同行请教和

① 也可以参考臧术美：“欧盟地区政策经济、社会与地域效应研究”，《德国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臧术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一种多层级合作机制探析”，《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探讨的是，低于国家层面的“次区域”和“地方”层级作为研究对象的地位是否需要进一步提高。

结合上述研究实践，笔者对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提出以下几点感悟和思考。

首先，必要性。鉴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跨学科”方法的使用是必要的。欧洲一体化本身是极为复杂的过程，正如法国地理学家维奥莱特·雷伊（Violette Rey）在笔者专著序言中所提到的，“欧洲建设是一个不断在摸索中前进、永远无法完成、充满变化的创造性过程”。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就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学问，其研究对象也是极为复杂多变的，因此，需要大量“跨学科”方法的使用。

其次，可能性。“跨学科”方法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和研究者个人的学科背景和学术素养相关，没有统一的模式。

第三，利弊与困难。既要看到“跨学科”方法的使用对于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作用，也不能盲目和刻意使用，要注意到“学科”是“跨学科”的基础。只有研究者在一定的学科内部经过长时间的熏染，掌握了此学科的核心方法和理念之后，才有可能谈得上真正的“跨学科”。

第四，“跨学科”方法的使用，应始终在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导下进行。可以采用“一句话表述问题”的方法来检验，即，请研究者只用一句话描绘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如果做不到，可能表明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

最后，法国“跨学科”方法的启示。笔者在法国里昂高师攻读博士学位时，对法国学界“跨学科”方法的使用印象深刻。比如里昂高师（ENS Lyon）的Triangle实验室就是由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三大学科的学者联合设立的，而该校的东亚研究中心（IAO），在其日常运作和学术实践中也处处体现着鲜明的跨学科特点。正如法国著名学者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曾经提出的“复杂思维范式”（complexity）^①和“综合性方法”，就是“跨学科”方法的典型体现。我们可以广泛借鉴西方学术界现有的跨学科研究的经验和教训。

① [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Abstract】 In May 2021,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Journal of Russian Studies*, together with others including *the Global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Deutschland-Studien* held an academic seminar entitled “Methodology and Paradigm Innovation for Regional and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e select manuscripts of some experts to form this proceeding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speeches from general theories to country-specific research cases). Currently country-specific and regional stud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s things in China have alway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how to rationally grasp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utside world. Contemporary China is transitioning from “China of China” and “China of Asia”, described by Liang Qichao, to “China of the world”. Now it might be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at Chines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s are trying to develop a truly global vision (even including the North and South Pole, the outer space). In this process, “China of the world” urgently needs to establish a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system which can cover all geographic spaces of the world. Meanwhile, there is also an increasingly urgent need to “tell the world story well” according to China’s realities based on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The further a rising China is participating in world affairs, the greater the needs for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regions of the world will b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national knowledge system”, country-specific and regional studies is duty-bound to provide related knowledge reserves.

【Key Words】 Regional and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Dual Circulation, National Knowledge System

【Аннотация】 В мае 2021 года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Шанхай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едакция журнала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и редакционны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журналов «Глобальный обзо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наблюд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Германии» совместно провел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семинар по теме «Методы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инновации парадигм в рамках новых моделей развития». Мы выбрали рукописи некоторых выступавших экспертов, чтобы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для читателей данный выпуск письменных выступлений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х от общих теорий д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о конкретным странам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выступлений). Текущ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тран и регионов имею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т.к. многое в Китае всегда было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о с тем, как рационально понять свои отношения с внешним миром. Нынешний Китай движется от «Китая Китая» и «Китая Азии», описанных Лян Цичао, к «Китаю мира». Возможно, это первый случай в истории, когда кита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элита попыталась создать поистине глобальное видение Китая (включая Северный и Южный полюс, космос и т. д.). В этом процессе «мировой Китай» срочно нуждается в создании систем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знаний, которая могла бы охватить вс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ё более остр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рассказать историю о мире» Китаем на основе «рассказов о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ем глубже становится участие Китая в мире, тем больше возникает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в интересе к и понимании различ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мира. Как важная час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знаний» Кита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тран и регионов обязаны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резервы знаний для вышеупомяну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 страно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двойной цикл,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знаний

(责任编辑 崔 珩)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1年第3期(总第229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公开发行

ISSN 1009-721X



定价：30.00元